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

辛普森 (Christopher Simpson) 著

王维佳 刘扬 李杰京 译 (1945-196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HORAE

本书基于公开文献与美国解密档案，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梳理了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过程。

“二战”后，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部门、军方、情报机构和重要的基金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上架建议：传播研究

ISBN 978-7-5675-6001-1



9 787567 560017 >

定价：45.00元

www.ecnupress.com.cn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著

王维佳 刘扬 李杰琼 译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美)辛普森著;王维佳,刘扬,李杰琼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001-7

I. ①胁… II. ①辛…②王…③刘…④李… III. ①大众传播—传播学—研究—美国

IV. ①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025 号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FIRST EDITION

by Christopher Simpson

Copyright © 1994 by Christopher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151 号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主 编 赵月枝 吕新雨

著 者 (美)辛普森

译 者 王维佳 刘 扬 李杰琼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01-7/G·10017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冷战期间，杜鲁门总统公开进行的宣传攻势“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进行的隐蔽宣传行动形成了一场总体的心理宣传战。其中，美国之音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图是1948年3月18日，苏联裔的广播员Victor Franzusoff正在通过美国之音向苏联方播送当天节目。

“批判传播学”编委

丛书总顾问：童兵

丛书编委（排名不分先后，以中文首字笔划为序）：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

冯建三

吉列尔莫·马斯特里尼（Guillermo Mastrini，阿根廷）

孙皖宁（澳大利亚）

邱林川

林春（英国）

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美国）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英国）

胡正荣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

特里斯当·马特拉（Tristan Mattelart，法国）

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斯洛文尼亚）

童世骏

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美国）



W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资助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

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

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2013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

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中译本序言

知识的积累与演进是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证的关键依据。与此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早已成为现代学术事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科学精神,这些专业伦理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并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然而,当人们片面强调现代知识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视而不见时,这些崇高的伦理却可能沦为矫饰霸权的意识形态,走向“学术自由”的反面。

《胁迫之术》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指,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和传播学科的构建离不开冷战时期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本书作者,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二战后几十年间,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如何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在辛普森的著作中,传播学领域众多耳熟能详的顶级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以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工具性角色出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知识分子的学术圈中展现独立、客观、科学、进步的面貌。在核心学术刊物和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只需要把心理战项目的研究报告裁剪

打磨成科学研究论文，就可以树立一座座传播研究的里程碑。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奠定了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方向，而且成为日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现代化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权力对学科的规制还不仅仅体现在引导、资助等正向手段上。在冷战高潮时期，警察制度、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联袂配合，“积极压制那些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传播学观念，特别是那些他们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思想”（见本书第9页）。当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传播学者都曾经历过这段艰辛岁月，恰如作者所言“对传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非正统分析可能会招致职业共同体的学术驱逐、联邦调查局的恶意审查、媒体的攻击，甚至是暴力袭击”（见本书第9页）。

在同情这些学者尴尬处境的同时，我们也该警醒，主流传播观念的形成，并非线性进化的结果，它离不开这段外部权力对多样性思想进行选择 and 压制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正是那些长期将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当成正统的科学学术史、思想史来研读的学者们的盲点。

当然，建构学科正统性和学术独立性的神话本身就是权力规制的内在需要。如果缺少了正统性和独立性的认定，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不会轻易将这些心理战成果奉为真经，恐怕美国主流传播学界内部也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机。那么，当时传播学科的领军人物是如何将“冷战斗士”和“进步学人”的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装置，是那种处于文明秩序制高点的迷之自信，那种宗教热忱一般的普世责任感，那种带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要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精英的行为动机，这套观念装置可能比国家资助所塑造的表面风光和单纯而抽象的“爱国热情”更为重要。它是主流传播学者为自己学术事业创造合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国很多冷战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展示了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对于上述意识形态因素的挖掘还显得比较薄弱，多数也不太涉及这些政策与重要国际历史背景的关联。《胁迫之术》一书更多聚焦于心理战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上，大量的证据材料有助于我们廓清传播学兴起的具体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关系和情境，并不能停留在人道主

义的层面上进行指责和质问,还须对这套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形成的历史和政治逻辑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冷战社会科学的兴起看成是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帝国主义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自主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莱辛格称为“至关重要的核心”(The Vital Center)的美国文化政治精英们承担的不仅是“国家”的使命,而是所谓“文明”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要在暗中施行强力手段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为了在伊朗、埃及、朝鲜、菲律宾、危地马拉和越南等众多地区遏制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国家冷战机器对各种颠覆手段和“统治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张。心理战工程及其资助下的众多传播学项目聚焦于说服效果、军队士气、态度改变、刑讯审问等“胁迫技术”的研究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和满足。

与此相伴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在“发展”和“现代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了基础。冷战社会科学所推行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念在政治内涵上并不是20世纪的创造发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和帝国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延续和改良。这些观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机时以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登场,与各种革命理论奋力抗争,并在之后的历史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

就这样，美国社会科学家把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必要手段，而后者又给前者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合法性。离开这种认知一致性的构造，我们就无法理解冷战时期的传播学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从事“胁迫之术”的研究，并将其当成一项科学进步事业来看待。

回到这段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更能体会，当“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句名言从一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它所表达的真实政治含义是什么。与披着主权国家外衣，行使维护“帝国文明秩序”强权的“军事—科技”机器刚好相反，这里的“祖国”恰是对一种反霸权集体意识的召唤，是追求平等的知识分子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种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据地。“科学家有祖国”不是对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归属的静态承认，而是对胁迫性学术秩序的告别与否定！

当这个意义上的“祖国”退化为“国家利益”、“国际一流”、“国际高水平”等被挖空了政治含义的概念空壳，当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唯欧美主流学术圈马首是瞻，当各种冷战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量成为认定学术成果质量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那种对知识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如今，压制与反抗的年代终究远去，全球学术政治的等级体系得以重建，并在后危机时代掩盖了曾经的狰狞面目，展现着它一定程度上的温和与包容。

带着对美国战略传播工程研究的共同兴趣和揭示主流传播学正统性神话的探索意愿，刘扬、李杰琼和我三人合作完成了本书的翻译。作为后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我们几位译者都经历过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洗礼，由此也期待《胁迫之术》的出版能够给更多中国传播学界的朋友提供一个反思学术自主性的机缘。在本书翻译和校译的过程中，加拿大传播学者赵月枝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的吴畅畅老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翟秀凤、方晓恬和人民日报社的殷鹏等朋友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维佳

201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中译本序言(王维佳).....	1
第一章 定义心理战.....	1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早期的现代传播研究	15
第三章 “社会科学者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33
第四章 学界的倡导	44
第五章 政府的前哨	56
第六章 “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	71
第七章 主导研究范式的国际化和强化.....	108
第八章 心理战的遗产.....	123
附录:斯图亚特·多德“里维尔相关论文”系列清单	137
研究文献概览.....	142

第一章 定义心理战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传播研究是一个不那么重要，却又十分有趣的分支。这个相对较新的专业在 1950 年到 1955 年间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形成了完备的学院和课程体系，并能够独立授予博士学位。如今，这个学科承担着培养新闻记者、公关和广告从业者等相关专业技能人才的任务。在时下的美国，这些人才可被称为“意识形态工人”。^①

在大众传播研究形成一个独立学术领域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心理战项目起到了重要扶持作用，深深影响了学科带头人的选择。在传播学众多研究范式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决定了哪种研究范式可以得到最多的垂青，进而获得繁荣的发展前景和繁复细致的研究。国家虽然不会直接决定专家们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它确实对该学科领域权威人士和权威声音的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书有三项任务：首先是勾勒 1945 至 1960 年间美国心理战的历史脉络，并探讨这项传播事业的基本理论、行动和管理结构；其次是考察那些著名的大众传播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心理战事业的贡献；最后，还将检视这些心理战项目，是如何影响传播研究领域对于传播和科学研究的普

^① 有关“意识形态工人”的问题，如今不计其数的大众传播机构在招募广播电视记者、报纸杂志编辑、作家、各种广告专家、公关人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称之为“大众传播”专家）时，都对拥有大众传播学专业高等学位具有一定的要求。参见 W. W. Schwed, “Hiring, Promotion, Salary, Longevity Trends Charted at Daili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October 1981); Lee Becker, 3. W. Fruit, and S. L. Caudill, *The Training and Hiring of Journalists* (Norwood, NJ: Ablex, 1987)。

遍理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行动常常与大型广告主、媒体公司的商业野心、高校管理者和教授们的创业欲望交织重合。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等军事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大幅资助了战后一代的传播学者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和其他相关的课题。特别是其中的说服研究，还为现代广告和动员技术奠定了科学基础。这些政府资助的传播研究，单靠私人财力根本不可能完成，更不用说政府还可以调用大批军队士兵充当研究和实验对象。^①

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传播研究机构中，至少有六家事实上是政府心理战工程的附属物。多年以来，政府资金（经常未向公众公开）占很多研究机构年度预算的75%以上，例如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以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以及以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为代表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等，都是这样的机构。^②

① Albert Biderman and Elizabeth Crawfor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② 有关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参见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69, 275—76, 506—7 notes 37 and 42.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有关坎特里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社会学研究院，参见 John Crewdson and Joseph Treaster, “The CIA’s 3-Decade Effort to Mold the World’s View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6, and 27, 1977, with discussion of Cantril and the IISR on December 26. 坎特里尔的译本中隐瞒了资金的真实来源，参见 Hadley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有关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参见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Description*, (Cambridge: MIT, July 195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Report of a Country Team Seminar, June 11 – July 13, 1962*; (Washington, DC: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1962); 以及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for Governments,” *Background 10*, no. 2 (August 1966): 111—22。其他大众传播研究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政府心理战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全国舆论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现在更名为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下文将详细讨论。

美国国务院还秘密地(同时也显然是非法地)资助了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有关美国大众舆论的研究,以此作为他们对美国国会进行冷战游说行动的一部分。这笔资助使国家舆论研究中心开展的所谓“私人的”、“独立的”调查研究首次具备财务可行性。^①另一个例子是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社会科学研究所(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关于酷刑折磨(这是最合适的说法)战犯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严刑审问俘虏的行为只是被简单理解为社会心理学原理在传播学中的一项简单应用。^②总体上,如果没有美国军队、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的长期资金注入和方向指引,传播研究很难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状况。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知识社会学研究。它审视“知识”生产(此时特指有关传播和意识胁迫的知识生产)与某一特定时期社会政治条件之间的关系。类似的研究通常是:首先揭示在发达工业社会某个阶段中,大众传播所具有的褊狭和野蛮的特质,而后再通过详细讨论,重新界定什么是传播。与此不同,本书认为,传播有时就像一个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那些受到资助的学术研究会把世界说成他们想象中的模样,然后再努力把这种世界观制度化,以此替代敌对的观念。

我之所以聚焦于美国政府心理战项目在传播研究中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该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已经大体上被遗忘或者压制。

^① 1957年,美国国务院签订秘密资助的合约详情被公开之后,还一度产生了丑闻,参见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Opinion Polls, 85th Cong., 1st sess., June-July 1957(Washington, DC: GPO, 1957)。

^② Albert Biderman, "Social-Psychological Need and 'Involuntary' Behavior as Illustrated by Compliance in Interrogation," *Sociometry* 23, no. 2 (June 1960): 120-47; Louis Gottschalk, *The Use of Drugs in Information-Seeking Interviews*,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port 322, December 1958,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11,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以及 Albert Biderman, Barbara Heller, and Paula Epstein,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Captivity Behavior*,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port 339-1, February 1961,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14, also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彼得曼声称,人类生态基金(据称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基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和美国空军 AF49(638)727 号合约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资金来源。有关人类生态基金和相关人类生态社会调查机构对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更多情况,参见 John Marks,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CIA and Mind Control*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p. 147-63。

然而，本书既无意成就一部大众传播研究的完整历史，也非梳理各种塑造大众传播研究的力量。它只是提供一种看待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路径而已。除了心理战项目，至少还有两股重要的力量深刻影响了现代传播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发展；另一个则是为私人公司服务的商业研究。对于前者，高校学者们已经写了很多著作，而且还将持续开展这项工作。^① 然而对于后者，多数学者却很少就商业研究对传播学发展的影响展开实质性讨论，尽管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都曾谈到商业项目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②

追问联邦政府的资助与传播研究学术范式形成之间有哪些关联，将展现很多特别棘手的问题。证据显示，从1945年开始，至少到1960年代，心理战项目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焦点，一段时期还曾成为相关研究的核心领域。但是，这种对心理战问题的强烈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传播研究中各种假设和给定知识的外部框架？

当然，研究基金自身并不能创造一个持续性的学术潮流。^③ 但是，资金的支持却可以保障某一套被赞许的学术范式顺利地展现其理论观点、打磨其学术体系、发展其知识框架，由此确立其相对于其他另类学术建构尝试的竞争优势地位。

美国军方、宣传机构和情报机构所赞许的大众传播学研究路径，既为传播“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套解释(至少是在这些机构使命所关照的范围内)，也为检验传播现象提供了一整套手段工具。一言以蔽之，他们将大众传播视为一种说服和统领目标群体的工具。他们理解

① Jesse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harles Berger and Steven Chaffee(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CA: Sage, 1987, pp. 20—98.

② Robert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p. 504—5, 主要讨论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 也可参见 Theodore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43; 以及 Willard Rowland, *The Politics of TV Viol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3)。

③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10.

的传播不过是一个信息传送通道,一旦你掌握了所需的技巧,其中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被用来达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者军事的目的。传播学的学术承包商们说服他们的客户:就像早期的科学研究为青霉素、电灯和原子弹的发明所做的一样,那些对大众传播构成要素的科学剖析和测量将催生社会管理领域更加强大的新工具。联邦政府的主顾们也同样相信,对受众和传播效果的分析将有助于提升正在进行的宣传和情报项目。^①

富有创业精神的学者们为支配性传播活动的实际运行设计了科学的手段,他们模仿自然科学中看起来已经非常成功的一套方案:将复杂现象简化成具体要素的实证方法;强调对变化作出数量化的描述;宣称对科学“事实”保持“客观”的视角。按照史蒂文·查菲(Steven Chaffee)和约翰·霍克海默(John Hochheimer)的说法,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理解的大众传播总是保持一种“从顶端和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视角,而不是从系统

^①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关政治、经济领域的文本,参见 Albert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The Basis of Allocation to Social Scientific Work," paper presented to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69, now at BSSR Archives, series V, box 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Albert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Paper Money: Trends of Research Sponsorship" in *American Sociology Journals*, 1st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Paris), 9, no. 1 (February 1970): 51—77; Elisabeth Crawford and Gene Lyons, "Foreign Area Research: A Background State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0 (June 1967): 3—7; Elisabeth Crawford and Albert Biderman,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Wiley, 1969); James McCartney, "On Being Scientific: Changing Styles of Presentat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st* (February 1970): 30—35;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for Governments"; Gene M. Lyons, *The Uneasy Partnership: Social Science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The Use of Social Research in Federal Domestic Programs*, 4 vols., 90th Cong. 1st sess. January-December 1967 (Washington, DC: GPO, 1967)。更多最新分析,参见 Richard Nathan, *Social Science in Government: Uses and Misu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and Otto Larsen, *Milestones and Millstones: Social Science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45—199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2)。更多批判性文本参见 Ralph Beals, *Politics of Social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1969);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James Everett Katz,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1975);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The Use and Abuse of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71); Irene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5)。

的底层和边缘出发的视角”。^①

相比于常规战争的极端残忍和耗费巨大,有效地说服和宣传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更加理性的征服方式。它们的支持者认为,说服性的大众传播可以在避免增加伤亡的情况下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可以鼓励那些走投无路的敌人投降,而不是激战到死。同样,那些掌握了传播技巧的人,可以通过提升士气、增强对兵力的指挥和控制而获得明显的军事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安全机构将宣传和心理战看作一种能够让美国政府在兵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增强影响力、成本低廉的工具。中央情报局在东欧的电台广播就是一个例证,就像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这位美国心理战的长期支持者所说的,它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最便宜、最安全、最有效的工具”。^②

考察心理战在传播学研究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必须将其置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治发展背景中。这一时期,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激进运动,他们开始探寻贫困问题、依附性问题和深度腐败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美国心理战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挫败这些激进运动的自信心。正如后面几章所要讨论的,在伊朗、埃及、朝鲜、菲律宾、危地马拉和越南等国发生的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所关注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敌人是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而不是伊朗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菲律宾的游击队。直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一直用非常残暴的方式统治着苏联。而很多西方人将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美国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带不断地发生冲突。苏联也针对美国建立了一套庞大、精细而复杂的宣传战工程。很多西方观察家推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世界革命的教

^① Steven Chaffee and John Hochheimer, “The Beginning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rigins of the ‘Limited Effects’ Model,” in Michael Gurevitch and Mark Levy (eds.), *Mass Communications Yearbook*, Vol. 5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5), pp. 75—104, quote on p. 77.

^② 引用自 John Hughes, “‘Free Radio’ for Chin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0, 1992.

义式承诺和共产主义者在劳工运动、反殖民运动中的积极性，都证明了莫斯科正在控制着一个全力运转的、世界范围的革命阴谋计划。1949年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以及随后的朝鲜战争被很多人看作是苏联下决心“夺取全世界”的警告。

苏联一方对国际竞争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扩张性的帝国。美国已经将西欧和前欧洲殖民地吸纳进了一个围绕美元构建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美国将苏联隔绝在国际体系之外，严格地限制其贸易，并正在从事着秘密颠覆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行动。美国公开地干预朝鲜战争而且秘密资助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政变。苏联指出，美国曾两次对平民大众动用原子弹，而且不断威胁要向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发动核打击。

在这种情形下，众多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将美国的心理战项目看作是一种文明的、相对和平的管理国际冲突的手段。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全面战争。正如伊蒂埃尔·德索拉·普尔所言，社会科学家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积极参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未来的士大夫们”（普尔对决策精英的尊称）“如果要采取高明、人道的行动，而不是野蛮、愚蠢、官僚式的行动，那么他们需要一种科学方法来预估他们行动的后果”。他接着说：“未来人道治理的唯一希望就是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运用社会科学成果。”^①

在现实效果上，美国和苏联的心理战项目让双方的冲突预期不断升级。在两国激烈争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一点尤其明显。而在舆论修辞上，两国都声称自己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是应对外国阴谋颠覆的防御性手段，而对方阵营组织的研究项目则是对战争进攻的积极准备。

从根本上说，心理战是一种帝国管理的工具，而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被用于确保第三世界和欧洲国家中的本土民主力量不会过多偏离美国安全机构的立场。其首要功能是压制和曲解人民大众中非官方的传播活动，其中也包括美国国内挑战帝国思想与权威的异见分子。在实践中，现代心理战和宣传手段很少作为暴力的替代手段

^①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for Governments."

被使用。相反，它们正是恃强凌弱的战略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思路中，胁迫和操纵被冠以“传播”之名，挤压其他的、理解传播之真意的机会。心理战的问题不能单纯从某一个机构或某一个国家的角度去分析，而应该将之视作维持严酷的全球南北方等级关系的工具。

最终，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在传播概念的系统构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概念界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传播学研究。当然，美国传播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商业基础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即便如此，冷战时期的心理战研究毕竟对大规模的传播研究项目提供了广泛的、有选择性的资助。这些研究致力于探索传播作为一种支配工具的可能性，并为此做出了大量的设计、实验和成果发表工作。它们帮助学者构筑了一个具有内部共识的人际网络，这些学术圈的内部人士乐于控制学科研究领域的各种关键权力，例如学术发表体制的方方面面，学者晋升和教职分配的决策权等等。由此，这些研究项目排挤掉了竞争对手，对当今主流传播研究范式的大获全胜贡献良多。

1945年到1960年间，美国国防部、情报署、中央情报局等联邦机构为美国所有大规模传播研究项目提供了绝大部分资助。^①除了那些关于心理战项目的高度机密尚无法知晓，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获知，在1950年代早期，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至少为相关活动提供10亿美金的资助。^②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政府每年向大学和智库拨款700万到

^①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deral Funds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GPO, 1953), pp. 35—48;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Behavioral Science,” special issue of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7, no. 9 (May 1964), William Ellis (study director).

^② James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New York: John Day, 1953), p. 188. 一些不够完整但足以支撑论据的数据，可参见 Comptrolle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U. S. Government Monies Provided to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Washington, DC: GPO, 1972), with a classified annex obtained via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Sig Mi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Larry D. Collins, “The Free Europe Committee: American Weapon of the Cold War,” Ph. D. diss., Carlton University, 1975, Canadian Thesison Microfilm Service call no. TC20090; James R. Price, *Radio Free Europe: A Survey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ocument No. JX 1710 U. S. B, March 1972); 以及 Joseph Whelan, *Radio Liberty: A Study of Its Origins, Structure, Policy, Programming and Effectiven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72)。

1300 万美金,用于与传播问题相关的社会心理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外国传播系统的人类学研究、海外受众和外国公众舆论调查等。这些研究项目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大众传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做出了贡献。^① 卡内基集团(Carnegie Corpor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等主要的基金组织是当时大型传播研究项目经费的二手资金来源。这些组织紧密地配合美国政府在宣传工程、情报工程所需的大众传播研究项目中进行资金的配置和分发。^②

心理战项目当然需要表面的科学准确性和学术完整性,但在核心目标上,它们是服务于狭义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应用研究,必将为此削足适履。政府机构为操纵国内外的目标群体而寻求科学的调查数据。因此,当大规模传播研究并没有太多资金支持的时候,他们十分乐意出手相助。

更有甚者,政府中某些握有实权的部门,例如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国内安全机构,积极压制那些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传播学观念,特别是那些他们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思想。由于冷战时期的严苛环境,加之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以及学者中被秘密资助的意识形态阵营所展现出的强势姿态(后面的章节会对以上几个方面分别讨论),对传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非正统分析可能会招致职业共同体的学术驱逐、联邦调查局的恶意审查、媒体的攻击,甚至是暴力袭击。^③ 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一旦被解释为对美国体制持批评意见,通常会带来严重的职业危机。即使今天,也常常如此。

如今被界定为美国主流大众传播的学科,其研究重镇得以存续的关键就是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心理战项目还是许多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学术生涯的支柱。事实上,“奠基人”被选择和指认的过程,就是心理战项目的科学资助源源不断地供给特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过程。如今,丹尼

①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deral Funds for Science, an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②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pp. 20—26. 有关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集团所发挥作用的具体讨论,详见第四章。

③ See, for example, Paul Lazarsfeld and Wagner Thielens, *The Academic Mind: Social Scientists in a Time of Crisis*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or Ellen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Mc Carthivism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尔·勒纳(D.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被看作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之作,这是一部保持政治中立的科学性著作。然而,事实上,勒纳著作的构想、写作和推广却服务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高级宣传项目的特定目标。^①

美国在1945年到1960年之间的心理战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通过它可以观察强势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如何转换成学术界“广为接受的常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这个故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尝试塑造国内外目标人群的共识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成败;二是在这一过程中被雇佣的社会科学家们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达成了共识。有意味的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塑造科学家共识的效果要好于塑造公众共识的效果。对心理战项目进行研究的部分目的,是要观察权力精英们如何推动变革,怎样在新的范式下重塑自身,并努力去塑造公众自以为是自觉的意识,尽管这项工程的推进并不总是顺利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心理战”呢?根据威廉·多尔蒂(W. Daugherty)的研究,这个词最早在英语中使用,是在1941年一份关于纳粹宣传、第五纵队和欧战早期恐怖行动的文献中。^②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二战时期延伸了这个概念,用它指代广义上处理各种战争问题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应用手段,其中包括战争前线的宣传、针对友邦力量的思想改造,以及在国内提升士气和纪律性的手段。^③

二战以来,美国军方和北约的各种手册通常将“心理战”或“心理行动”界定为不同的战术,如宣传、隐蔽行动、游击战,以及最近的公共外交。^④共产党的理论家则经常将其指称为“动员与宣传”等相类似的行

① Daniel Lerner with Lucille Pevs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② William Daugherty and Morris Janowitz (eds.),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for U. S. Army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1958), p. 12; 参考书目是 Ladislav Farago, *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New York: Putnam, 1941)。

③ Daugherty and Janowitz,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12—35.

④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Military Agency for Standardization, NATO Glossary of Terms and Definitions for Military Use (unclassified) (Belgium: NATO, 1976), pp. 2—206 and Appendix J-1; 有关“公共外交”,参见 Robert Parry and Peter Kornbluh, “Iran-Contra’s Untold Story,” *Foreign Policy* 72 (Fall 1988): 3—30。

动,并将其看作是与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等更大范畴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①英国与纳粹德国在这一领域的战略战术历史上被分别叫作“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②和“世界观之战”(Weltanschauungskrieg)。^③所有这些关于心理战的概念化运用都明确地将大众传播与暴力手段(谋杀、破坏、暗杀、暴动、反暴动等等)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达到意识形态目标、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的工具。这些相互重叠的概念系统常常为各自的发展提供支援,它们分享着特定社会系统的各种文化政治假设,正是这个社会系统催生了这些战略技巧。

在当前的语境下,对心理战最恰当的理解是为了达到资助者(主要是政府或政治行动方)的意识形态目标、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而探索目标受众文化心理属性和传播系统的一套战略战术。换句话说,心理战是大众传播理论在现代社会冲突中的应用。它关注暴力和一般传播手段在达成政治军事目标过程中的综合运用。

美国政府关于心理战的全面解读可以在美国军方冷战早期的战争计划中找到。这个军方的定义从出台之日起(1948年年初)就被定位为最高机密,40多年中一直是官方的秘密文献。直到1980年代晚期,我通过档案解密法的申请,才得以获取早期心理战计划的一系列记录。其中的一份文献中有这样的内容:

心理战不同于正统的军事行动,它使用一切道德的和物理的手段,以达到:

1. 摧毁敌人战斗的意愿和能力。

^① V. 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rpt.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pp. 199—211; Mao Tse Tung (Mao Zedong), *Mao Tse 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pp. 1—44, 142—62.

^② 例如,二战期间,英国主要的心理战研究机构被称为政治战执行机构,参见 Robert H. Bruce Lockhardt, "Political Warfare,"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London) (May 1950); Harold D. Lasswel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Daniel Lerner (ed.) *Propaganda in War and Crisi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51), pp. 261—66.

^③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lated by John Chamberlain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39);也可参见 Arno Mayer,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The Final Solu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8), pp. 95—103.

2. 剥夺他从盟友和中立方获得的支援。

3. 增强我方军队和盟友获取胜利的意志。

心理战使用任何可以影响敌人思想的武器。这些武器被界定为心理的,并不是因为武器本身的属性,而只因为它们产生的效果。因此,各种公开宣传(白色宣传)、秘密宣传(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各种破坏行动、颠覆行动、特别行动、游击战、间谍活动,不管它是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还是种族性的压迫手段,都可以作为有效的武器。它们的有效性在于可以在敌人心理上制造各种纠纷、猜疑、恐惧和绝望,而不在于它是否来源于宣传机构和心理战机构的策动。

这一段落中提到的“特别行动”在另一份文献中有明确的界定:

那些由盟友或友好力量执行的,深入敌后的对抗行动……(它们)包括心理战(黑色的)、秘密行动、颠覆、破坏和其他多种多样的行动,例如暗杀、目标捉捕和援救坠落飞行员等。^①

军方文献接着总结了上述提及的几种说服技巧,包括三个基本概念:“白色宣传”、“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白色宣传”,按照军方说法,“强调简洁、直白和不断重复”。它需要被包装成受众所理解的真理性、平衡性和事实性的信息。美国公开承认通过“美国之音”等媒体途径对这类信息进行宣传推广。“黑色宣传”则相反,它“强调烦扰、混淆和恐怖”。^②“黑色宣传”的计策包括伪造敌人文件并将它们分发给目标受众,以此降低敌对方的公信力。美国政府官方否认执行“黑色宣传”。但事实上它一直是美国国内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灰色宣传”,正如字面含义,介于“白色宣传”和“黑色宣传”之间,主要包括在宣称独立于美国政府的新闻

^①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JSPC 862/3 (originally top secret, now declassified), August 2, 1948, Appendix “C,” P&O 352 TS (section I, case 1), RG 319,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② 同上,重点参见原著。

媒体中散布有天敌人的错误信息。^①

同一时期,其他美国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强调了美国当时心理战策略的其他三个特征:以“貌似合理的推诿”让美国政府否认发动“黑色宣传”的责任,而事实上这些宣传活动都来自于美国策动;^②有意将中立国极端化地归属于“支持美国”或“反对美国”的阵营;^③秘密地将美国公众与外国公众一起作为心理行动的目标。^④

在本书中,心理战或心理行动的内涵就包含在美国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指定的范畴中。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在美国的概念中,心理战一贯调用多种多样的暴力手段,包括游击战、暗杀、破坏,以及更常见的,对附属国那些残忍独裁政权的支持。第二,心理战还包括各种媒体宣传工作,范围从公开的白色宣传新闻报道,到秘密的黑色宣传。第三,美国的心理战不仅仅针对“敌人”,也包括美国和盟国的人民大众。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首先讨论 1945 年之前的美国心理战运行,特别是哈罗德·拉斯韦尔、沃尔特·李普曼等著名传播理论家的思想和行动,以及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各种开拓性传播学研究。随后,我将描述在二战时期出现的、一批受雇于美国心理战项目的传播学者如何构建了学术圈的非正式社会网络。

转到战后时期,我将追寻心理战工程和传播学研究在冷战岁月中相互依赖的发展轨迹。我将特别关注这一时期的《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POQ*)(一本长期被认为最负盛名的主流传播学期刊)。这本刊物可以被看作心理战项目影响传播学学术概念的晴雨表,它界定了传播“是什么”,将成为什么样,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去研究

①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General Staff, *Psychological Warfare Study for Guida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重点参见原著。

②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10/2;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 (originally top secret, now declassified), June 15, 1948, RG 273,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③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General Staff, *Psychological Warfare Study for Guida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④ 同上,有关同一现象的最新实例,参见 Parry and Kornbluh, “Iran-Contra’s Untold Story”。

传播。

在最后的章节中，我将评估 1945 年到 1960 年间，美国政府心理战工程带给社会科学界的遗产，并提出一些观点，分析这些项目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传播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学术担当的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早期的现代传播研究

心理战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把一些老把戏改头换面重装上阵。在一些历史悠久的文明中,人们早把符号、面具、图腾等作为权力的工具。^①如在公元前5世纪,^②中国军事思想家孙子就曾描述如何在战争与统治中应用较为复杂的“心理”策略。在我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上,北美土著在欧洲殖民人入侵前,^③就有借助符号和仪式来凝聚部族士气、间或恐吓外敌的古老传统。同样,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在反抗英格兰统治、^④对墨西哥战争、^⑤美国内战,^⑥乃至经年累月与土著居民争夺大陆控制权的过程中,面向不同受众不断展开宣传,采取游击战甚至恐怖行动。

① Margaret Mead, "Continuities in Communication from Early Man to Modern Times," in Harol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and Hans Speier (eds.),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3 vol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0), Vol. 1, pp. 21—49.

② Sun Tzu, *The Art of War*, translated by Samuel Griffit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3—84。参见《孙子兵法》。

③ Josephina Oliva de Coll, *Resistencia Indigena ante la Conquista*, 4th ed. (Mexico City: Siglo Vientiuno Editores, 1983).

④ L. H. Butterfiel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1776: The Jefferson-Franklin Plan," in William Daugherty and Morris Janowitz (eds.)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for U. S. Army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1958), pp. 62—72.

⑤ M. Andrews,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the Mexican War," in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72—73.

⑥ Morris Janowitz,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pp. 73—79, and B. J. Hendrick, "Propaganda of the Confederacy," pp. 79—84, both in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才将其制度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战。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委派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统率由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国务卿等精英组成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曾写道，克里尔的新职“相当于任命了单独负责宣传的内阁部长……主抓从国内到国外宣传工作的方方面面”。^① 威尔逊总统任上在美国心理战行动中发挥了令人震惊的重要作用。他审阅克里尔所制定的行动计划，甚至在宣传小册子投放前审看小样。^② 与此同时，陆军部在总参谋部下情报分部内建立了一个小型心理战机构，并在美国赴欧远征军司令部下建立了一个同级的宣传机构。^③

一战后，心理战建制化的努力几乎都消散了。1918年，同盟国刚刚取得胜利，陆军部便取消了心理战和宣传机构。1919年，克里尔委员会也解散了。此后20年间，美国都没有正式的海外宣传协调机构。1941年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总参谋部内只剩下一位有心理战经验的军官。^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心理战项目却对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孕育中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⑤使用“政治传播策略”、“受众心理”和“符号控制”等大量概念，对交战国的宣传活动进行了说服传播方面的案例分析。与之类似，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两部重要著作——1922年的《舆论》^⑥和1925年的《幻影公众》^⑦大部分是基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

① Harol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1927; rpt.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p. 14—26, quote on p. 18. 内容可参见中译本《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 p. xxxi.

③ Alfred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Its Origi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

④ 同上。

⑤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p. xxxii.

⑥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译注]内容可参见中译本《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 201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⑦ Walter Lippmann, *The Phantom Publ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5). [译注]内容可参见中译本《幻影公众》(林牧茵译), 201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战中的经验写成。他曾是美国远征军宣传部门传单的主要编写者，并在威尔逊总统为支持美国赴巴黎谈判团而成立的准情报机构中担任顾问委员。^①

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的书都探讨了大众传播给西方工业社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影 响，揭示了大众传播与民主国家所宣扬价值之间存在着复杂且时常矛盾的关系。他们认为新的传播和交通技术唤醒了大量被剥夺权力的民众，让他们看到了工厂或乡村以外的世界。但是 19 世纪传统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却仍制约着他们的生活。在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看来，这是一种隐形的力量，引发了一系列革命，包括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一战末席卷欧洲与美国的工人反抗浪潮。

李普曼的职业生涯具有代表性：作为知识分子，他在战时参与制定心理战策略，战后又将战时经验与社会科学整合在一起。二战之后，“李普曼现象”则更为普遍。他最具影响力的概念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一概念认为，新的传播和交通技术创造了一个“我们在政治上必须要应对的，却触不到、看不见、不可知的世界”。刻板印象是这个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图景”，“作用于群体或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人”。^② 在李普曼看来，这个新世界十分复杂而且会迅速到来，同时出于政治目的对刻板印象进行掌控看似轻松，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专家机构让决策者看到新世界隐而未现的事实，即便代议制政府是经选举产生，也无法顺利运作。”^③ 反之，就要像李普曼所说的那样，决策者为了社会效率与更大的利益，有责任修复“破损的舆论机构”。李普曼在战时作为宣传家和情报专家的经历为这些首次出现在《舆论》一书中的概念做了注释。

李普曼的国内治理和国际关系策略中，核心是针对被剥夺权利者进行说服传播。他把大众传播看作现代危机的主要源头和进行管理的必备

①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p. xxxii; D. Steven Blum, Walter Lippman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49—64. [译注]内容可参见中译本《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 2003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p. 29. [译注]内容可参见中译本《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 201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同上 pp. 31, 32。

工具。他认为，社会科学为管理原本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工具。因为当时工业社会管理还主要依靠枪杆子与警棍，所以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称颂李普曼提议的开明与人道。^①

拉斯韦尔发展了李普曼的观点，在表述上更为油滑。他强调对说服力媒介的使用，同时有选择地使用暗杀、暴力或其他胁迫方法，将这些作为与被剥夺权力民众“交流”并操控他们的手段。相对于暴力手段，他更提倡使用说服或精确暴力等所谓“科学”的方法。他在1933年写道，“宣传已经成为重要的大众动员工具，较暴力、贿赂和其他控制技术来说更为经济。”接着他又补充说，“成功的社会与政治管理往往依赖宣传与暴力或非暴力的胁迫、经济利诱（含贿赂）、外交谈判等其他手段的综合应用。”^②“宣传一定要与情报和间谍工作搭配使用。后者可以为宣传家提供所需材料、报告宣传工作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说明，宣传可以与外交、军事以及经济施压一起有效运用。”^③

拉斯韦尔认为传播与社会秩序紧密联系。辩证地看，人类传播与各种社会秩序形态相互定义，划定彼此的边界；它们不能脱离彼此而孤立存在。从这个角度，传播可以被看作人类文化与意识的传递渠道和实质。

① 可参见李(J. M. Lee)所写书评, *Yale Review* 12(January 23, 1922): 418; 帕克(R. E. Park)所写书评,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8 (September 1922): 232; 福特(W. C. Ford)所写书评, *Atlantic* (June 1922); 或梅里厄姆(C. E. Merriam)所写书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January 1923): 210. 与以上形成对照, 约翰·杜威(John Dewey)写道, 李普曼的写作风格如此纯熟, “一个人读完此书, 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目前已著作中对民主最有力的控诉。” *New Republic* 30 (May 3, 1922): 286. 梅尔斯(W. S. Myers)评论道, 李普曼“是十足的宣传家。他的著作, 不管何种主题, 都体现出这一特征的影响”。55 *Bookmark* (June 1922): 418.

② Harold Lasswell, Ralph Casey, and Bruce Lannes Smith, *Propaganda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35; r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 43.

③ Harold Lasswell, “Propaganda,”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1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pp. 524—25. 还可参见 Harold Lasswel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21—40. 尽管对拉斯韦尔作为社会控制理论家的重要性早有认识, 但近期因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媒体的研究, 使这一点重新得到美国公众的注意。可参见 Noam Chomsk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Leiden, Netherlands: Johan Huizingalezing, 1977), pp. 9—10, and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in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与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的狭隘界定相比，“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和术语，在传统上都有更为丰富的含义。词源学家认为该词大约在14世纪才进入英语，源自拉丁文的 *com*（“一起”）和 *munia*（“职责”），意为“共同担责”。^①根据这个传统的定义，“传播”被视作在特定社会情境中（通过文化交往、仪式或交换等）与他人分享的过程，不同于现在被主要当作发号施令的媒介。“传播”一词词根应有之意还可见共同体（*community*）、公社（*commune*）和圣餐会（*communion*）等词。一个社会对“负担”的分配自然与另一个社会有很大区别，“分享”也无法保证“公平”。但是，传播中集体、互动属性与任何特定社会秩序属性间的辩证联系在不同社会中却都保持稳定。

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给出的狭隘的“传播”定义是基于等级化工业社会中的传播。说白了，他们认为传播的本质就是将一己之想法强加于他人，尤其是大众的有效工具。传播的工具化概念源于他们战时的所作所为和彼时日渐兴起的大众传播技术，到头来反映和体现了既存的社会秩序。

拉斯韦尔将社会传播简化为“谁对谁说了什么，产生什么效果”，几乎成为美国各个传播院系大门上的铭文。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有些条理的传播分析思路却被用滥了。拉斯韦尔和李普曼将传播视作控制，推动社会传播的实证研究迈出了关键一步。实证主义的传统就是将复杂而不可测量的现象拆解为各自分离的部分进行测量，再把结果一点一点组装起来，形成所谓对现象整体的客观理解。它最早被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中心引进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但是，这类新测量技术对象牙塔之外的社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举例而言，拉斯韦尔公式，因为契合了美国新型商业与政治力量的兴起，几乎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学家的常识。通过将传播简化为“谁说了什么”等等这般的拉斯韦尔模型，使与美国社会强权集团关系甚密的传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系统地割裂为几块，得以被度量。

拉斯韦尔模型及其衍生理论因有助于商品生产和服务而开始大显威力。不仅如此，它还排斥并常常抑制了有关社会传播是或可能是什么的其

^① Robert Barnhart (ed.), *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New York: Wilson, 1988), p. 195.

他说法。譬如，大众消费社会的建立和维系需要媒体有能力将大众的注意力售卖给广告主，用以促销产品和服务。要办成此事，媒体必须有办法测量“大众注意力”和相关指标，才能将其服务卖给潜在广告主。经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拉拉斯菲尔德、坎特里尔等人^①的引介，拉斯韦尔模式及各种新方法为测量媒体售卖给其客户服务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基础。

但在广告主看来，仅仅把产品和服务销售出去还不够。其在大众市场上的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变受众最初所持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特别是通过诱惑等手段改变他们与自己不同价值观的能力。例如，汽车经销商并非简单地将其产品当作交通工具进行销售，而是想让消费者通过拥有或使用其产品塑造其个人目标，展现自尊与价值。在大众消费社会，许多消费者不仅购买了商品，他们本身也实实在在成为了商品。

换句话说，早期的现代传播研究往往呈现出普通人悄无声息的状态，除了选择商品外，在任何情况下都默不作声，仿佛这才是传播本来的样子。像“百事一代”(Pepsi Generation)、“心动美国”(Heartbeat of America)和“我爱你对我做的一切”(I Love What You Do for Me)(举个近点的例子)^②等短语绝不是句简单的广告语，而是从广告主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测量大众媒体信息及其所引发反应的(所谓)能力，为更广泛的社会变迁提供了必要条件，让现代消费文化取代了既存社会形态。这一过程从始至终因充斥着种族灭绝等显而易见的暴力，从而让“现代”世界清除了根生土长的文化和人民。

美国传播研究主流范式的技术、知识与体系等都与现代消费社会，特别是媒体产业和大众市场经济部门相纠缠、共生。^③ 美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自身就说明，它绝非简单地观察媒体行为，而是要找出化解并压制与现行社会秩序相悖观点传播的妙法。

① Willard Rowland, *Politics of TV Viol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3), pp. 53—59.

② [译注]三条短语分别是百事可乐、雪弗兰汽车和丰田汽车的英文广告语。

③ 奈格特(Oskar Negt)下面著作中有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讨论的影响激发了我对此事的想法。“Mass Media: Tools of Domination or Instruments of Liberation? Aspec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ommunications Analysis,” *New German Critique*(Spring 1978): 61—79. 61ff.

显然,社会传播必须在互相矛盾的势力中左右平衡。没有社会秩序,“社区”压根就无法存在;或者换句话说,秩序决定了共同担责所应有的含义。拉斯韦尔和李普曼提倡的绝非是抽象的秩序,而是存在于美国及世界上其他由强势精英按自身更大利益而进行必要统治的国家内的具体秩序。美国式消费民主不过是为了维系精英权威而制造大众共识、相对良性的体系,以确保平民不会“误入歧途”。拉斯韦尔曾表示,知识传播:

不是将民众从无知与迷信中解脱出来,而是要改变无知与迷信的本质,同时以宣传作为主要手段,推动建立和发展全新的控制技术……(一个宣传者)观念里的人不是照本宣科的民主观念中那种能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最佳判断的个体。当代的宣传者就像心理学者一样,应该能够发现,人们通常对自身利益很难做出准确判题……(当权者)必须培养一种敏感,一旦合适的时机到来,能够将潜在的快速动员力量汇集起来……(宣传者)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的鼓动者。^①

拉斯韦尔和李普曼意在建立相对宽容、多元的社会,但要由精英统治,规避民主制度的弱点,成为现代版的“位高责重”(noblesse oblige)。但是纳粹“时代精神”运动也将传播作为潜在的统治工具加以运用,却超出二人所能认可的范围。上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知识分子在传播研究的多个领域充当工具,一些人创造出行之有效的研究技术,另一些人奋起反击,以回应外国为反制纳粹无比成功的宣传而进行的传播研究。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通过广播、电影及其他媒介形式进行社会操控已广为人知。^②在更加学术的层面上,1939年,年轻而聪明的秘密特务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建立了一个更为学术化的、名为“德意

^① Chomsk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pp. 9—10.

^② Joseph Goebbels, *Goebbels-Reden, 1932—1945*, 2 vols. (Dusseldorf: Drost, 1972); and Joseph Goebbels *Tagebuecker von Joseph Goebbels, Saem-tliche Fragments*, 4 vols., edited by Elke Froehlich (Munich: K. G. Saur, 1987). 有关戈培尔领导的公共启蒙与宣传部的缩微影片集,可至美国国家档案馆查询德国记录系列22号,帝国公共启蒙与宣传部记录。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1960。

志生活”的研究中心，应用民意调查等新手段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为“谁对谁说了什么，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找到答案。他获得全面成功，以致在“德意志生活”的表现为他日后成为党卫军特别行动 D 队司令铺垫了基础，他组织杀害了 9 万人，其中多数是犹太妇女和儿童。^① 奥伦多夫主要的资助者和指导者是党卫军内重要的智囊、柏林大学国家研究院的莱因哈德·霍恩(Reinhard Hoehn)博士。在战后，霍恩博士仍是德国有关舆论与政府问题最重要的专家之一。^② 其他几位德国大众传播与舆论研究专家对纳粹的宣传和民意监控项目也都有贡献。他们中最为出名的要数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她的职业生涯始于戈培尔办的学术期刊《帝国》(*Das Reich*)，如今她显然已是欧洲最具名气的传播理论家之一。^③

“世界观之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多项新型传播研究予

① L. D. Stokes, "The Sicherheitsdienst(SD) of the Reichsführer SS and German Public Opinion, 1939—1941," Ph. 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2; Aryeh Unger, "The Public Opinion Reports of the Nazi Party," POQ 29, no. 4 (Winter 1965—66): 565—82; Arthur Smith, Jr., "Life in Wartime Germany: Colonel Ohlendorf's Opinion Service," POQ 36, no. 1 (Spring 1972): 72; Heinz Boberach, "Chancen eines Umsturzes in Spiegel der 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in Juergen Schmaedeke and Peter Steinback (eds.),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Munich: Piper, 1989). For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captured reports from Ohlendorf's project, see Sicherheitspolizei des S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in U. S.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of captured German records No. T-71, reel 5.

② Carsten Klingemann, "Angewandte Soziolog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1999; *Zeit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January 1989): 25; Christoph Cobet (ed.), *Einführung in Fragen an die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nach Hitler, 1945—1950*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Christoph Cobet, 1988). For an examination of interlocking problems concerning German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the same period, which overlapped in certain respects with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e Mechthild Roessler, *Wissenschaft und Lebensraum: Geographische Ostforschung i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1990).

③ Chris Raymond, "Professor Is Accused of Promulgating Anti-Semitic Views as Journalist in Germany and U. S. in World War II,"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8, no. 16, December 11, 1991, P. A-10. For Noelle's own 1939 description of her relationship with Nazism, see Elisabeth Noelle, "Fragebogen zur Bearbeitung des Ausnahmeantrages für die Reichsschrifttumskammer," May 15, 1939,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Berlin Document Center.

以资助。那时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几乎没有任何投入,企业对此领域的资助也往往仅局限于专门的市场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主管盖里(Brett Gary)在报告中则表示^①,基金会管理者认为,大众传媒已成为现代社会里一种独特的强大力量。为此,基金会先后资助了一批重点项目,例如,拉斯韦尔在国会图书馆的内容分析研究,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l)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舆论研究及《公共舆论季刊》的创立与发行,道格拉斯·威普尔士(Douglas Waples)在芝加哥大学开展的阅报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广播研究室等。

战争临近,洛克菲勒基金会明显表现出对发掘“保卫民主”之策的兴趣,以防范苏联和轴心国宣传对国内数量庞大移民的影响。1939年,美国对纳粹德国开战的动议遭到国内保守派、宗教领袖和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基金会为此组织了一系列秘密研讨会,邀请顶尖传播学者共商如何巩固国内支持开战的舆论,为日渐成型的传播学领域提供了清晰的意识形态与方法论基础。^②

正是在这些研讨会中,拉斯韦尔得到基金会高管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器重,基金会的这些项目表面上宣称要引领美国社会的民主价值,但实际上其核心是通过操纵和欺骗制造大众共识。拉斯韦尔的理论似乎能够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他本人也因此在此后两年中获得了支持。换言之,美国社会中的精英(拉斯韦尔直言不讳地称之为“那些有钱资助研究的人”)可以通过系统操控大众共识以维系民主,抵御来自纳粹德国或苏联等威权国家的威胁。

参与讨论会的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前主任唐纳德·施莱辛格(Donald Slesinger)批评说,拉斯韦尔的主张不过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暗

^① Brett Gary,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Imperatives of War 1939—1945," Research Reports from 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North Tarrytown, NY, Spring 1991), p. 3; and Brett Gary, "American 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Propagand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2. Gary's work is the first thorough study, so far as I am aware,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crystallizing paradigms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② John Marshall (ed.), "Needed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1940), folder 2677, box 224, Rockefeller Archives, Pocantico Hills, NY, cited in Gary, American Liberalism.

地里接受了新威权主义的目标与方法。他说：“我们（研讨会参与者）不假思索、心甘情愿地牺牲真理与活生生的个体，让大众接受战争刺激并产生所预期的反应。我们名义上反抗以暴力实施独裁，实际却助长了以操控实施独裁。”^①施莱辛格的观点得到其他与会者和约瑟夫·威利茨（Joseph Willits）等基金会成员的支持。威利茨直言拉斯韦尔的论点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威权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尽管存在这些不同意见，但是日益迫近的战争带来的社会分化却支持了拉斯韦尔，最终让他获得新的基金会支持，扩充了研究人马。施莱辛格则境遇迥异，被排除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讨会之外，并很快在学界传播专家群体中失去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心理战借应用传播研究兴起，变为希望的田野。战争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传播研究者和心理学家的人际、社会、学术网络得以形成，在战后美国社会学发展或“社会建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心理战更详细的探讨自然不在本书的范围，对此已有大量文献，本书将在结尾会予以简要地介绍。但本章会提及几个人物和概念，因为他们在1945年后的心理战和传播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研究，“心理战”一词1941年才进入英文，是对纳粹德国 *Weltanschauungskrieg*（直译为“世界观之战”）一词的翻译变体，指有目的、科学地使用宣传、恐吓、政府压力等手段确保压倒敌方，取得意识形态的胜利。^② 人称“疯狂的比尔”的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当时刚刚担任新成立的情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主任，将纳粹的心理战策略视为许多美国版心理策略想法的重要来源，将其冠以新名后迅速在情报圈内推广开来。多诺万的心理战部门注定成为美军的独立部门，比肩陆海空三军。^③

① Gary, "American 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Propaganda."

② Ladislav Farago, *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New York: Putnam, 1941). For a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term, see William Daugherty, "Changing Concepts," in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 12.

③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p. 5—8, 23—37.

多诺万在美国第一个提出了较受公认的心理战理论。在他看来,和平时期宣传运动中“制造共识”的技术在公开的战争中依然有效。他相信,利于盟军的宣传对重组美国战时经济、赢取国内公众支持介入欧洲战争都至关重要。“第五纵队”可以被用来在海外搜集情报,影响轴心国控制下的百姓。他认为,采取破坏、颠覆、突袭和游击等“特别行动”,有助于在发动常规军事战争之前弱化目标。美军战争学院此方面专家艾尔弗雷德·帕多克(Alfred Paddock)上校曾写道,“多诺万的心理战包罗万象,他梦想的目标是将所有辅助手段结合在一起,支持常规军事行动,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战争手段’”。^①

多诺万曾是一名华尔街著名律师,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私交甚密。他曾游说罗斯福总统设立了中央级政府情报机构,负责国外情报搜集,对战争相关信息做整合分析,在境内外执行宣传与秘密行动。1941年7月,罗斯福创建了由他精心命名的信息协调办公室,交由多诺万主持。^②

但多诺万雄心勃勃的计划很快就在华盛顿的官僚争斗中触礁。1942年初,政府将“白色”(官方)宣传功能剥离给一个新的机构,最终成为战时情报局(OWI)。而多诺万将情报、秘密行动和“黑色”(不可告人)的宣传重组为更为机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该机构名义上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受军方领导。但军方与作为政府机构的战略情报局关系一直不和。多诺万也常利用他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抵制军方对影响日隆的战略情报局进行的种种限制。^③

不久之后,类似的新机构在军队其他部门蔓延开来,大多都来自于

①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 6.

② Anthony Cave Brown(ed.), *The Secret War Report of the OSS*(New York: Berkeley, 1976), pp. 42—63.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on the OSS. 关于该机构活动的概况,包括体制和领导团体的基本数据,参见 Richard Harris Smith, *OS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③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p. 7—14; and Edward Lilly,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and Its Predecessors: Foreign Policy Coordination 1938—1953,” in Gaetano Vincitorio(ed.), *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46.

新闻界或商界的军方外部人士提议创建。他们将“心理”技术看作能够破除军方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手段。如多诺万在华尔街的老同事、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在陆军参谋部 G2(情报)机构下设立了一个小型、高度机密的心理战室(今天麦克洛伊可能更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后来成为美国驻德国最高军事长官、大通银行董事会主席、华伦委员会成员等职务)。^① 麦克洛伊的心理战室后来几经改组,曾短暂地被置于战略情报局下,后又交由军方控制,重新命名不下两次。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协调美国心理战具体行动的高层跨部门委员会,其中就有美军在各战区设立的规模相对较小、听命于大本营司令官的心理战室。这些管理架构还不是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在欧洲战区,司令官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管辖下的心理战室迅速扩充为由 460 名男男女女组成的心理战室。^②

这些项目随战事结束也步入尾声,但它确定了美国社会科学与大众传播在战后的长期研究方向。像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一样,几乎所有在上世纪 50 年代兴起的科学团体,都有赖于其学者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从事对内对外宣传、盟军士气、国内外舆论等应用研究,参与战略情报局秘密行动,或利用新兴技术对报纸、杂志、广播、拦截邮件等进行分析并发掘有价值情报。

美国心理战专家在战争中的日常工作五花八门。德威特·普尔(De Witt Poole)是美国国务院反共宣传专家,战前他利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假期创立了《公共舆论季刊》,后来又成为战略情报局外籍人士分部的主管。该部门从美国本土移民社区中招募合适的特工,监控民意,并从外文出版物中分析、发掘情报。亚历山大·雷顿(Alexander Leighto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致力于发现日本文化的分裂性,为美国对亚洲广播提供借鉴。美国陆军的塞缪尔·斯

^① Kai Bird, *The Chairman: John J. McClo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②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p. 8—18; 更深入的讨论,参见 Daniel Lerner,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Day*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48)。

托弗(Samuel Stouffer)研究小组专攻美军部队的意识形态引导。哈德利·坎特里尔将调查研究法用于为美国北非登陆等行动做准备的秘密情报搜集工作。^①

战争期间,美国形成了六个从事心理战及相关研究的重镇。虽然其中一些在战争中经历了改名、重组,但基本可以归纳到以下六个机构中:(1)塞缪尔·斯托弗领导的美国陆军士气处研究小组;(2)埃尔姆·戴维斯(Elmer Davis)领导的战争情报办公室及其下属由埃尔默·威尔逊(Elmo Wilson)领导的调查处;(3)罗伯特·麦克洛尔(Robert McClure)准将领导下的美军心理战部队(PWD);(4)威廉·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5)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在农业部主管的调查项目处,为陆军、战争情报办公室、财政部等政府机构提供实地调查人员;(6)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国会图书馆的战时传播研究实验部。

数十位著名社会科学家通过这些机构参与战争,有时还同时参与两个或多个机构的战时项目。例如战争情报办公室雇用埃尔默·罗珀(Elmo Roper,罗珀调查机构)、伦纳德·杜伯(Leonard Doob,耶鲁大学)、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亚历山大·雷顿(Alexander Leighton,康奈尔大学)、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斯·斯皮尔(Hans Speier,兰德公司)、纳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兰德公司)、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Barrelet,哥伦比亚大学)、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哈佛大学)及其他人员^②(括号

① 有关普尔在《公共舆论季刊》建立中的作用可见 Harwood Childs, "The First Editor Looks Back," *POQ*, 21, no. 1 (Spring 1957): 7—13. On Poole's work at the Foreign Nationalities Branch of the OSS, see Anthony Cave Brown (ed.), *Secret War Report of the OSS* (New York: Berkley, 1976), chapter 2. On Leighton, see Alexander Leighton, *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utton, 1949). On Mead, see Carleton Mabee, "Margaret Mead and Behavioral Scientists in World War II: Problems of Responsibility, Truth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3 (January 1987). On Stouffer, see note 49 below. On Cantril, see Hadley Cantril, "Evaluating the Probable Reactions to the Landing in North Africa in 1942: A Case Study," *POQ*, 29, no. 3 (Fall 1965): 400—410.

② 有关罗珀、埃尔默·威尔逊以及罗珀组织的情况可见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71—72. 有关杜伯和莱特斯情况可见 Daniel Lerner (ed.), *Propaganda in War and Crisi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51), pp. vi—viii. 有关克拉克洪、雷顿、洛文塔尔和施拉姆的情况可见 Daugherty (转下页注)

中内容简要指出这些学者最为人熟知的隶属机构)。同时,战争情报办公室还为传播研究拓展对外联系,向拉扎斯菲尔德、坎特里尔、斯坦顿、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和农业部利克特团队进行咨询。^① 战争情报办公室还通过签订合同,为刚刚成立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提供大量的财政资助。^②

除了为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外,纳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还是拉斯韦尔国会图书馆项目的高级研究助理。与之情况相同的还有海因茨·奥劳(Heinz Eulau,斯坦福大学)。^③ 其他服务于拉斯韦尔项目的人还有埃尔文·詹尼斯(Irving Janis,耶鲁大学)和年轻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麻省理工学院)。后者早在战争结束前就与莱特斯开始对共产主义出版物进行系统内容分析。^④ 时至今日,拉斯韦尔的国会图书馆项目仍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真正系统内容分析的开山之作。^⑤

陆军心理战处的知名职员有威廉·S·佩里(William S. Pale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D·杰克逊(C. D. Jackson,《时代》、《生活》杂志)、W·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兰德公司、哥伦比亚大学)、扫罗·帕多佛(Saul Padover,社会研究新学派)、约翰·W·赖利(John W. Riley,

(接上页注)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xiii-xiv. 有关斯皮尔可见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21—24, p. 829. 有关巴雷特可见 Edward Barrett, *Truth Is Our Weap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53), pp. 31—32. 尽管巴雷特在自己出版的传记中予以回避,但他死后,美联社确认他是前情报战略局成员,可参见“Edward W. Barrett Dies; Starte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6, 1989. 有关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更多信息可见 Allan Winkler, *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Leonard Doob,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 no. 4 (August 1947): 649—67.

①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63, 172.

② 同上, p. 309.

③ 有关莱特斯和奥劳情况可参见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verett Rogers and Francis Balle (eds.), *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Norwood, NJ: Ablex, 1985), p. 205; and Harold Lasswell and Nathan Leites,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49), p. 298.

④ Nathan Leites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Respons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in Lasswell and Leites, *Language of Politics*, pp. 153, 334.

⑤ Roger Wimmer and Joseph Dominick, *Mass Media Research* (Belmont, CA: Wadsworth, 1987), p. 165. 内容可参见中译本《大众媒介研究导论(第7版)》(金兼斌等译), 200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格斯大学)、莫里斯·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密歇根大学)、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 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律师穆雷·格法因(Murray Gurfein, 后来成为简诺维兹的合著者)等。^①这些人中,戴维森、帕多佛、简诺维茨和格法因是战略情报局官员,被指派到心理战处,充分发挥他们在传播和德国社会心理方面的专长。^②后来致力于社会科学其他知名战略情报局的官员还包括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 威斯康辛大学)、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 哈佛大学)、沃尔特·朗格(Walter Langer, 威斯康辛大学)、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 Cater, 阿斯彭研究所),当然还有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新学院)。^③战争期间战略情报局在政府之外,通过签约付费的形式将社会科学研究安排给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的人类关系研究所和彼时尚在丹佛大学的国家民意研究中心。^④在每一个战时政府的传播和舆论研究中心,我们都能发现与之大体类似的一组社会科学家与学术承包商名单。^⑤

① 有关佩里、杰克逊、帕多瓦、赖利、简诺维兹、勒纳和格法因的情况可参见 Lerner, Sykewar, pp. 439—43。有关戴维森的情况可参见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 xii。有关希尔斯情况可参见 Lerner, *Propaganda in War*, p. viii。

② 有关戴维森和帕多瓦情况可参见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xii—xiii。有关格法因和简诺维兹可参见 Smith, 055, pp. 86, 217。

③ 有关朗格、卡特和马尔库塞情况可参见 Smith, OSS, pp. 17, 23, 25, 217。有关巴雷特情况可参见“Edward W. Barrett Dies; Starte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有关贝克尔和英克尔斯的情况可参见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xi—xii。有关战略情报局培训和行动中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所扮演角色的精彩回忆可参见 William Morgan, *The OSS and I* (New York: Norton, 1957)。

④ Robin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 (New York: Morrow, 1987), pp. 43—44, 79。

⑤ 有关斯托弗士气研究小组情况可参见 Samuel Stouffer, Arthur Lumsdaine, Marion Lumsdaine, Robin Williams, M. Brewster Smith, Irving Janis, Shirley Star, and Leonard Cottrell,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3—53; and John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as a Career Contingenc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7, no. 2(1984): 207—13。有关战略情报局情况可见 Barry 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52—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Bernard David Rifkind, “OSS and Franco-American Relations 1942—1945” Ph. D. 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3, pp. 318—336。有关太平洋战区的心理战行动可参见 Leighton, *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社会心理学家约翰·A·克劳森(John A. Clausen)曾是斯托弗研究小组的成员。他对以上这些人的社会联系的实际意义进行探究。80年代初,克劳森对其前同事在战后舆论研究、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职业情况进行系统研究。^① 27位前同事中,他找到25位填答问卷,其中24人回答说战时工作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对(他们)日后的职业选择有重要的作用”。克劳森引用心理学家纳森·麦克比(Nathan Maccoby)的回复说,“研究小组不仅建起了前同事的关系网,还为小组成员们开辟了通往战后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路径。我们是群幸运儿。”近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研究小组的经历“主要影响了他们战后十年间工作的方向与性质”。克劳森继续写道,“除了三位外,剩下的人都表示这段经历的影响非常重要……四分之三的人回答说,在小组的工作经历对其整个职业生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②

受访者认为这种持久的影响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战时经历让年轻学者可以与斯托弗、伦纳德·科特雷尔(Leonard Cottrell)、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等该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以及拉扎斯菲尔德、路易斯·古特曼(Louis Guttman)等民间顾问一同工作。陆军研究小组实际上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研究生院,“学生”们和经验老到的“教授”们在学术上明显彼此受益。

另一方面,据克劳森讲,共同的经历搭建起了一个职业联系网,几乎所有本次调查的受访者都认为该网络对他们日后职业非常重要。克劳森写道:

或许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同事中后来成为基金会高管的数量。查尔斯·多拉德(Charles Dollard)担任卡耐基基金会的主席。唐纳德·扬格(Donald Young)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主席位置上调任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主席,最终在那里又将伦纳德·科特雷尔招至麾下。利兰·德维尼(Leland DeVinney)从哈佛大学

^①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② 同上, p. 210.

转至洛克菲勒基金会。威廉·麦克匹克(William McPeak)……帮助建立福特基金会并担任副主席。帕克尔·W·莫尔丁(W. Parker Mauldin)担任人口委员会副主席。科学研究协会的莱尔·斯宾塞(Lyle Spencer)后来捐资成立基金会,目前已资助多项社会科学研究。^①

参与战争情报办公室宣传项目的前成员身上也体现出相似的社会效果。战争情报办公室海外事务主任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Barrett)指出,基于战争期间共同的从事心理战的经历,这些老同事关系网不断延伸,已大大超出了社会科学领域,他在1953年写道:

(这些人包括)时代、LOOK、《财富》等杂志和其他几份日报的出品人;《假日》(*Holiday*)、《宝冠》(*Coronet*)、《大观》(*Parade*)杂志和《丹佛邮报》、《新奥尔良时报》(*New Orleans Times-Piscayune*)等报纸主编;维京(Viking)、哈珀兄弟(Harper & Brothers)、法勒-斯特劳斯-扬(Farrar, Straus and Young)等出版集团的领袖;两位奥斯卡获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主席及十几个有线电视网的高管;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讲主笔;《读者文摘》国际版主编;至少六位大型广告机构合伙人;数十位知名社会科学家。^②

巴雷特本人也在1950至1952年间担任美国政府秘密心理战主管,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院长,并创办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③

当然,对这一关系网络的政治影响作出评价应当谨慎。赫伯特·马尔库塞从战时经历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显然与哈罗德·拉斯韦尔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中关系甚密、一同移居美国的同

①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p. 212.

② Barrett, Truth, p. 31fn.

③ "Edward W. Barrett Dies; Starte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事在后来冷战中围绕政治议题也爆发了激烈冲突。^①然而，战时从事心理战的共同经历，为社会科学的各位领头人结成默契联盟、宣扬其对社会的特别解读提供了基础，也为那些就若干大众传播重要概念达成共识的人结成紧密圈子提供了充分条件。他们将大众传播看作社会管理工具和社会斗争武器，并都表示了对定量研究效用的肯定，认为实验和准实验的效果研究、民意调查、定量内容分析是说明传播“是”什么以及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应用的有效路径。至少在某些伦理问题上，他们流露出共同的态度以及替政府进行社会应用研究的特质。克劳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至少斯托弗研究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心理战中建立了社交网络，为战后政府、基金会和专业团体之间建立内部联系开启了至关重要的大门。巴雷特有关心理战小组的评论也说明类似的情形。下一章将会就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战争期间，这些科学家一直受政府资助，史无前例地参与对人类研究的各类题目，形成了新的大型社会信息数据库，这些原材料成就了战后一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从业者。

^①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and 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 pp. 29ff. 内容可参见中译本《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 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章 “社会科学者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战结束、《凡尔赛条约》签订几个月后，美国关闭了所有宣传和对外情报部门。与之相反，二战后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将这些部门建制化，并帮助其获取更广泛的权力。该政策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认为社会科学对其完成使命至关重要。

同时，“心理战”一词的意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本章将对此进行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毫不含糊地向明确的敌人发动了一场清晰公开的战争，心理战为这场斗争做出了贡献。但战后的冲突却明显不同：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宣战；前线在哪儿，哪些领土具有争议，甚至敌人是谁都十分含糊。对如何打仗、为何打仗的问题，国际上各主要集团都在欺骗国内民众和外部世界。

在此情形下，“心理战”、“心理战行动”等概念都需要做出新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和掩饰。随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编造出来的理由为一国政府在海外采取秘密政治行动，乃至发动中等规模战争铺平了道路，同时回避了对其行为的一切监督和问责。美国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与多数美国普通民众一样，面对国家安全统治机器做出的各项决定，只能听之任之。

但也有例外。一些科学家在政府内部有关系，对如何改善美国在海外寻求利益的策略颇有心得。冷战的模糊性为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美国政府首次在和平时期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外国专业信息的积极购买者。这也表现为美国情报界的迅速壮大。

1945年11月上旬，战略情报局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

将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道,“在所有让战争顺利进展、和平如期而至的情报中,社会科学家做出了巨大贡献。”^①他坚信政治、经济、地理和心理因素对整个战后情报工作非常重要。他补充说:

美国政府应该尽其所能推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发展……如果我们缺少了社会科学家,所有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期间为政策制定者服务的国家情报机构将直接瘫痪……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国家在平时和战时的情报工作健康发展都不可或缺。^②

图 1:战略情报局对社会科学的应用

描述性情报:具体而无所不包的背景信息			
基本社会科学	战略调查		有关政策和行动的情报
	政府结构与权力◆■▲ 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		
政治学◆	社会结构◆■ 社会机制◆■		(例如)
经济学■	XX 数据◆■▲ 社会伦理与风俗◆●		战争
统计学▲	人口统计■▲●		进攻前沿特性
历史学●	健康与卫生■●		进口战略依赖
社会心理学◆	经济性质■▲	→	公众意志力
社会学■	自然资源■▲●		和平
人类学▲	制造业与工业■▲●		压力群体
地理学●	贸易和商业■▲●		贸易与货币管制
	金融■▲		潜在政府领导
	农业■▲●		
	国家意志◆■●◆▲		
	公众意志●◆▲		
	土壤与气候■▲●		
	公共事业■▲●		
	交通■▲●		

来源:战略服务办公室

① Senat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Hearings on Science Legislation(S. 1297), 79th Cong. 1st sess., October-November 1945, Part 4, pp. 899—902.

② 同上。

在参议院的记录中,马格鲁德曾引用一张图来阐明战略情报局领导人的立场,其中至少有两点启示(见图1)。他们认为战时与平时的行动形成了一个连续统,形势发生变化,采取的策略也不同,但是,情报界始终认为,技术上来讲,不管是处于战争还是其他任何时候,美国最好都通过控制敌对力量来获取利益。^①而马格鲁德则认为,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符合美国目标的共识固然很好,但是利用武力来实现国家目标的选项依然重要。此外,如图1所示,战略情报局坚信战后情报工作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用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是两者兼用。

尽管战略情报局负责人雄心勃勃,但1945年后,热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冷战转换,传播研究的建制化也逐渐起步。战略情报局主管多诺万虽然长期受罗斯福的眷顾,但却没有取得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和众多国会议员的信任。1945年年末,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将其大部分从事情报搜集和心理战的雇员转至国务院。^②

二战期间第二个重要的情报机构——战争情报办公室也因国会共和党议员抗议而解散。这些议员指出,该机构在美国国内利用宣传手段为罗斯福的施政唱赞歌,为他1944年再次当选提供了实质性支持。战争情报办公室在陆军和兵工厂内推动种族融合,成为罗斯福时代被政府广为宣传的进步典型。美国国会中许多来自南方的民主党议员早就对其心存不满,也投票支持拆解该机构。^③虽然战后斯托弗在陆军中建立的研究小组得以保留,但是领导者被更换,经费也大打折扣。^④

^① Senat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Hearings on Science Legislation(S. 1297), 79th Cong. 1st sess., October-November 1945, Part 4, pp. 899—902。关于美国情报界上层认为,在秘密行动和心理战上,热战到冷战是连续的观点,可参见阿伦·杜勒斯、约翰·V·格罗姆巴赫、海军托马斯·英格力斯少将、海斯·科罗纳准将、霍伊特·范登堡中将与彼得·费舍尔在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上的证词。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 June 27, 1947; published 1982 by th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Washington, DC: GPO, 1982)。

^② Anthony Cave Brown, *The Last Hero: Wild Bill Donovan* (New York: Vintage, 1982), pp. 775—84。

^③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80—82。

^④ 同上, pp. 175—85; Samuel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28—29。

尽管出现以上种种变化,但从1946年1月起,战后心理战行动呈现出不断正规化和扩大化的趋势。该月,杜鲁门组建了中央情报组(CIG),成为中央情报局(CIA)过渡性的前身,由其政治盟友、陆军航空兵司令霍伊特·范登堡(Hoyt Vandenberg)领导。^①中央情报组的规章制度将其工作限定在情报分析,也为许多已回归平民生活的前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提供了制度性保护伞。未足两年,杜鲁门就用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此后十年里,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预算都专门用于秘密战、“黑色”宣传和其他心理战行动。^②

随着美国重新整合衰落的欧洲帝国,对抗苏联,并将国内异见者与国外共产主义运动相挂钩,美国情报界对海外的干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46年1月,美国陆军地面部队主管情报的怀曼(W. G. Wyman)少将准备了一份长篇分析报告,阐述了他对美国政府所面临意识形态威胁的看法和必要的应对之策。

他说,美国士兵、驻德国占领军和国内百姓都承受着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严重“思想混乱”之苦。

为确保我国当下亟需的健全思想,必须找到医治松懈思想的精神盘尼西林(Penicillin)……当下我国的种种问题——劳动力、复员军人、不满的士兵都成为喂足、养肥共产主义秃鹫的疮疤。

接着,怀曼呈上了他的对策:

必须在我国安全机构以外建立某种机构或组织,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我们也必须握有某种武器来抵御在事关我们生死问题上做文章的秘密行径,防范现代文明之癌……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政府政策来落实心理战工作——我们必须与潜伏在我们中间的幽灵进行斗争。^③

① Alfred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Its Origi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0.

② John Prados,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12, 1989.

③ 怀曼准将致陆军参谋部 G-2 主任助理的信,“应对美国境内武力颠覆行动的计划”,1946年1月15日。U. S. Army P&O 091. 412(section IA, case 7), RG 319,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see also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p. 42—43.

美国从来没有公开表示采纳过怀曼的建议,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文化厌恶军方对日常政治指手画脚。但是美国陆军却在军人中,以及西德、日本和奥地利占领区的百姓中展开了怀曼所提议的思想战。前陆军心理战处(如今已成为陆军内务处一个部门)展开大规模运动,强化美军的思想统一,转变前交战国中百姓的态度。

他们所作所为堪称在民主社会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有目的的传播运动。为了对国际受众和美国士兵进行有效宣传,作为战时心理战处负责人,麦克洛尔(Robert McClure)准将为陆军开出一份所需措施的清单。列在清单第一位的是位于柏林、面向东欧进行德国美国占领区广播(RIAS),以及《星条旗》(the Stars and Stripes)日报;在美国之音之外,更广泛的面向全世界的广播;对驻欧洲及远东部队进行教育的方案(斯托弗做法的延续);每年生产50—75部纪录片;每周用三种语言出品最新的新闻纪录片;对所有在占领区上映的美国商业影片进行过滤审查;在美国占领区实行邮件审查,对报纸、杂志、图书出版实行许可制;在60个城市建设文化中心;针对外国读者出版五份亮光纸印制的外文杂志(美国国务院当时已有一份这样的杂志,麦克洛尔表示满意);印制数以亿计的教育小册子和传单;在三个国家出版美国军方和政府的日报,以及其他更多措施。^①除了这份清单,值得提及的还包括由调查专家弗雷德里克·W·威廉斯(Frederick W. Williams)、利奥·克雷斯皮(Leo Crespi)、人类学家赫伯特·派辛(Herbert Passin)和约翰·W·班尼特(John W. Bennett)牵头、分别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大量民意调查。这两个国家成为美国积累用外文在海外进行调查研究经验的重要场所。^②

1945年,大量战争期间的军人被遣散后,美国常常把宣传和心理战作为向海外派遣士兵的替代手段。在20世纪40年代行将结束之际,美

^①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55—56.

^②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82. 有关盟军在德国占领区进行调查的背景情况可参见 Anna J. Merritt and Richard L. Merritt (eds.), *Public Opinion in Occupied German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and Anna J. Merritt and Richard L. Merritt (eds.), *Public Opinion in Semisovereign German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国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这种做法虽然不完美,但基本上成功。时过境迁,加之很难将传播效果与其他社会因素剥离,时至今日这些项目的效用也无法确定。但关键是,负责美国安全的主要部门相信大规模的宣传和心理战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们愿意将大把的银子投给这些项目。对这类战役的良好感觉加强了政府中倾向扩大心理战的论调,以图控制欧洲、发展中国家里那些不安分的人群,同时反制苏联及其阵营中的其他国家。

“黑色”与“灰色”宣传、隐蔽战及其他形式的心理战等诸多敏感领域也都得到了发展。1946年至1950年间,杜鲁门政府挥金数百万设立秘密机构,用以指导隐蔽战。在随后近30年间,政府却不断否认曾存在过这些机构。

许多有关战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行秘密行动的记述仍作为绝密文件尘封于世,受特殊法规保护,使其无法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或正常渠道解密。^① 国会对水门案件的调查才让这些官方机构第一次露出了“冰山一角”。例如,1946年夏天,美国陆军部长罗伯特·派特森(Robert Patterson)命令陆军完善行政体系,新建空中侦察队,类似战争期间战略情报局为支持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和南斯拉夫开展游击战而组建的队伍。^② 虽然名字中含有“侦察”,但这些机构专门从事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与一般意义上的“侦察”几乎没有关系。第二年春天,当时美国最高政治军事协调机构——“国家海空军协调委员会”(SANACC)建立了一个跨界精英小组委员会,美其名曰“特殊研究与评估小组委员会”,旨在“采取必要步骤保持心理战技术的活力……以确保有一组核心人员能够处置突发事件”。^③

同年夏天,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并对安全机构进行了彻底改革。该法在中央情报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为总统在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管理策略和军队改组出谋划策。^④ 刚刚诞生的中央情报局面临的第

① Allan Robert Adler, *Litigation under the Federal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d Privacy Ac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Foundation, 1990), pp. 42—44.

②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p. 69—71.

③ 同上, pp. 46—47.

④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New York: Morrow, 1986), pp. 20—21.

一个问题是如何让秘密的心理战合乎宪法。刚刚成立几周,该局首任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Roscoe Hillenkoetter)少将就《国家安全法案》是否允许在和平时期采取“秘密宣传和准军事行动”的问题向其法律顾问征询正式意见。

中央情报局法律总顾问劳伦斯·休斯顿(Lawrence Houston)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该局被特许授权从事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也就是说只能对事实进行收集和审核。国会没有授权中央情报局从事隐蔽战和秘密宣传行动。如中央情报局花着纳税人的钱,从事未经授权的行动就是违法。他又说,即便总统直接命令采取秘密行动,中央情报局也必须在国会划拨特别经费后,依法采取行动。^①

休斯顿的顾虑促使国会于1947年12月9日颁布了两项决议,为美国在和平时期采取秘密战提供了第一个正式依据。美国心理战从一开始就采取多层次的手段,包括表面文章、欺骗,以及对政府秘密委员会同样适用的各种委婉说法。这一次,国安委一口气出台了两个彼此矛盾的决议,足以说明多层次的手段相互交叉使用的情况。

作为第一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看似平常、名为《国外情报协调措施》(Coordination of Foreign Information Measures)的政策文件,亦称“国安委4号”(NSC 4)。该文件委派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直接负责指挥“所有美国政府在国外的情报强化和协调工作……以抵消反美宣传影响”。^②重点是,“国安委4号”文件仅被列为机密级,是密级最低的政府秘密。成千上万的政府雇员都有机会看到机密文件内容。尽管将未经安全过滤的机密文件传递给他人是违法的,但他们可以公开地和新闻界人士谈论这些机密政策的存在及其性质。这实际意味着这些机密文件中的内容在出台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后就被新闻媒体以所谓国安委“秘密决定”公之于众了。

事实的确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后,经“国安委4号”授权,出现一系列

①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New York: Morrow, 1986), pp. 20, 27—29.

②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4: Coordination of Foreign Information Measures (confidential), December 9, 1947, RG 273,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公开发布的决策,如资助美国之音、学者交换、“美国之家”海外文化中心运作及类似秘密宣传项目等。表面上,美国政府在这些方面上采取的措施确实如爱德华·巴雷特所说,“真相就是我们的武器。”他随后成为这些项目的主管。巴雷特到处推销他对美国政策的说法——美国敢就国际争论公开己见,坦率地讨论美国社会的优劣,为其观点赢得可信度。巴雷特坚持认为这不是“宣传(贬义角度的用法)”而是“真相”。^①

然而真相是,在刚刚推出“国安委4号”后不久,国安委又推出了第二份文件——“国安委4—A号”文件(NSC 4—A)。该文件则被标为严格限定密级的“绝密”。依据法律,绝密文件只能在得到授权、需要获知其中内容的圈子中传阅,甚至不允许向圈子外的任何人透露此绝密的存在。在“国安委4—A号”文件中,国安委指示,新获通过的宣传项目“必须辅以秘密心理战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秘密授权中央情报局执行隐蔽项目,绕开“国安委4号”文件授权的所谓“秘密项目”(还不如称作公开项目)的渠道来进行。^②

国安委的这一做法避免了美国国会和公众就是否在海外开展心理战进行任何讨论。国安委要求这些项目的运作被设计成“可被否认的”,也就是说“未经授权者无法知道是美国政府在负责这些项目的策划和执行。如被发现,美国政府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承担任何责任”。^③

这看似自相矛盾、多层次的做法帮助建构了一套隐晦的官僚术语体系,让那些国家安全秘密项目的发起者可以根据受众类别,在不同层面上谈论心理战行动和隐蔽战的细节。与此同时,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可以否认这些项目的真实存在。这一情况对理解此后美国社会科学家在各个组织机构内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其次,“国安委4号”文件围绕“海外情报措施”建立了一个看似秘密、实则公开的项目,这在公开的讨论中被称为“心理战措施”或“心理战争”。

① Edward Barrett, *Truth Is Our Weap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53).

②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4—A: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top secret), December 9, 1947, RG 273,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③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1012: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 (originally top secret, now declassified), June 18, 1948, RG 273,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有助于维护美国基于民主理想、以坦率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神话，与苏联依靠欺骗、宣传和秘密武力的冷战方式形成对照。^①

还不到半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颁发了“国安委 10/2 号”文件（NSC 10/2），以更富有内涵的政策决定取代了“国安委 4—A 号”文件，给中央情报局赋予开展秘密战的更大权限。根据“国安委 10/2 号”文件，中央情报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政策协调办公室，其预算、人员和实际存在都成为国家秘密。在新建的最初几周里，这个机构叫作“特殊项目办公室”。但是这个名称太容易暴露，因为“特殊项目”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略情报局在战时的秘密行动。所以，尽管该机构与政策或协调都不沾边，但最终改名为“政策协调办公室”。^②曾在战略情报局出任重要职务、才华横溢的华尔街律师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成为该机构主管。^③

尽管在行政隶属上，政策协调办公室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分支，但它的资金来自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对接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

① 较一般人所意识到的，这种表面上相互矛盾、复杂的概念结构在异国事务中更为广泛地存在。实际上，它们有可能是现代政治传播系统所固有的。此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利用亚语言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那时，国家发起大规模公共信息运动，动员德国官僚体系和公众对犹太人进行迫害，掠夺他们的财产，“完美”（即无关死亡）的歧视，将大批犹太人聚集起来驱逐。被驱逐者随后被杀害，但纳粹信息部门彻底否认真相，声称被驱逐者只是被送到劳动集中营。少数军人受命将其变为死亡集中营。铁路运来成批的犹太人，集中营里的囚犯被用来做死亡实验，以获取数据。这些军人迅速发展出一套复杂、专业的委婉语和说辞，用来讨论工作，而不与官方所称被驱逐者不仅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的说法相冲突。当时，有关种族灭绝的信息在德国社会只是通过传言、笑话、境外广播和大规模计划中的不小心泄露而为人所知。最终结果是，一方面广泛流传着有关希特勒政府进行种族屠杀的消息，与之相应是对这些消息系统而内向的否认。因此，许多德国人的信仰体系中充满了各类词藻与飘忽不定。

大体上与此类似的心理与语言建构在一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斯大林在苏联的暴行统治、美国利用前纳粹进行的情报行动中都曾发生过。当然，在这些暴行和心理战项目中的心理与语言动态内容有很多明显的不同。但是其中的相似之处足以说明委婉的“表面文章”与多数现代政治传播密切相连。

②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1012. 有关大规模犯罪中委婉表达的重要性可见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Harper, 1961), pp. 216, 566, 652.

③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p. 33.

(George F. Kennan)。^① 也就是说,充满活力的威斯纳实际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1952年,威斯纳的“办公室”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47个实地工作站雇佣了6000人。政策协调办公室的年度预算从未正式公布,历史学家为此争论不休,如对1950年的预算估计就从8200万美元到该数字的三倍不等。^② 预算几乎全部用在了“黑色”心理战上。

国安委将政策协调办公室称作美国的心理战机构。尽管“心理战”一词含有强力攻击的意思,但这里却暗指媒体与说服。该词以委婉的方式掩盖了被大多数国家视作战争行为的秘密活动。如政策协调办公室规章中所说,该机构的任务包括“宣传;经济战;涵盖破坏、反破坏、拆毁与撤退措施等预防性的先发制人;采用协助地下抵抗运动、游击战和难民解放(原文如此)等组织方式颠覆敌对国家;在受威胁的自由世界国家培植本土反共要素”。^③ 政策协调办公室会专门安排暗杀和绑架那些对美国有暴力企图的人士,以及除掉背叛美国情报部门的双重间谍。^④

职业情报官员威廉·科森(William Corson)为回应1976年美国参议院的质询,调查了政策协调办公室的起源,用更加非正式、或许更明确的词语说明了同样的事实。

情报界对国安委如此明显、一贯地背书和支持各种“肮脏伎俩”反应迅速。在他们看来,这些本来就无可厚非。“国安委10/2号”文件决定被广泛地解读为,总统及所有权力上层人士都在说:全副武装,放心去干吧。当“国安委10/2号”文件内容传到情报工作人员那

①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Foreign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94th Cong. 2nd sess., Part 4 (Washington, DC: GPO, 1976), pp. 29—31. Hereinafter cited a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② 同上, pp. 29—36;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p. 81.

③ Col. S. F. Griffin, “Memorandum to the Record: NSC 10 (Psychological Warfare Organization)” (top secret), June 3, 1948; quote concerning mission from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10/2.

④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pp. 128—32.

里,则被解读为事实上的宣战,只是国会这次决定不公开动用那么多的兵力。^①

在此情况下,“心理战”多层次、常常相互矛盾的具体含义取决于人们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该词,以及他们的听众在多大程度上知道美国政策中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对于公众,这个词似乎是指那些基本公开、强有力的宣传及大众媒体的活动。对于国家安全专家和心理战的承包商们,同样一个词则延伸为有选择地使用武力,但绝密文件拒绝透露武力的具体量级。同时,美国政府很娴熟地拒绝为任何特定的武力行动负责,特别谴责那些将美国资助的秘密行动与共产党宣传家捏造相提并论的新闻报道。^②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政府动员包括社会科学家和学者在内的广大选民支持美国心理战项目,但又不去说明真正做了什么。

① Quoted in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p. 75.

② 相关例子可见“U. S. Rejects Charges of Anti-Polish Act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23, 1953): 304—5。

第四章 学界的倡导

事后解密和水门事件调查所透露的内容表明,1945年后,一群经挑选的学界支持者和政府心理战机构形成了联盟。通过二战后十年中《公共舆论季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联盟的几个重要特征。该期刊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东欧事务分部效力的德威特·普尔利用自己的学术假期,于193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的。

《公共舆论季刊》在战后的作为反映了普尔的关注,揭示出美国宣传与秘密行动至少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该期刊上许多文章明确地探讨了美国心理战经验,展示了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美国扩大此类计划。其全年索引中,许多文章都列在“心理战”或“宣传”或二者兼具的索引条目下,较为清楚地展示出该特征。^①

^① 体现这些特征的文章包括 John A. Pollard, "Words Are Cheaper Than Blood," POQ 9, no. 3 (Fall 1945): 283ff. (review of the work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Mrs. R. Hart Phillip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ropaganda in Latin America," POQ 9, no. 3 (Fall 1945): 305ff. (plea for expanded U. S. propaganda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and Edward A. 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POQ 12, no. 2 (Summer 1948): 280 (elaboration of reference group theory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drawn from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gainst enemy military forc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s annual index typically appears as an unpaginated annex to the bound annual volumes of the journal.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unattributed articles in this chapter appeared in POQ.

德威特·普尔背景可参见 Who Was Who, Vol. 3, p. 692; and Sig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 24, 41, 60, 259. 普尔最终成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的主席。

第二个特征通常更不易被察觉。《公共舆论季刊》上相当数量的文章是以该期刊读者为对象进行说服,以证明美国干预海外事务的合理性,以及传播专业研究可以为新兴冷战发挥独特的作用。此类文章常常以对国外事务类图书进行深入评论的形态出现。^①

最后,多位期刊编者和投稿者与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军方所进行的心理战中不可告人的或“可被否认的”方面有着经常性的密切联系。今天可以确认的是,《公共舆论季刊》编委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资金上依靠心理战契约。^②

《公共舆论季刊》上那些毫不避讳的文章,从用语和主题很容易看出与心理战相关。譬如,1945年《公共舆论季刊》发表的文章就有:利用民意调查方式在塞班岛获取军事情报的报告;^③对美国国内主要宣传机构——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的历史回顾;^④对在日本国民中使用民意调查,以确定宣传主题有效程度的讨论;^⑤论证支持美国应加强对拉丁美洲的反共宣传。^⑥此后十年间,该期刊文章延续着类似的主题。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本文不一一列出《公共舆论季刊》上所有那些明确关于心理战的文章。这里仅列举1945年至1949年间该期刊所发表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进一步介绍战争情报办公室的两篇文章;^⑦介绍二战期间德国文职与

① 相关例子可参见 Warren B. Walsh's reviews of M. Sayers and A. Kahn's text *The Great Conspiracy: The Secret War against Russia*, 10, no. 4 (Winter 1946): 596—97, or of Henry Wallace's text *Soviet Asia Mission*, 11, no. 1 (Spring 1947): 135.

② 此处,在资金上依靠着心理战契约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个人收入或重要专业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为国家安全任务而应用社会科学的投入资金。作为例子的《公共舆论季刊》编委会(后来称作顾问委员会)包括哈德利·坎特里尔、伦纳德·科特雷尔、菲利普·W·戴维森、乔治·盖洛普、哈罗德·拉斯韦尔、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伦西斯·利克特、德威特·普尔、埃尔默·罗珀、威尔伯·施拉姆、弗兰克·斯坦顿、弗雷德里克·史蒂芬、塞缪尔·斯托弗和埃尔默·威尔逊。具体项目和来源可见本书第五、六和八章的内容及注释。

③ Major Paul C. Bosse, "Polling Civilian Japanese on Saipan," 9, no. 2 (Summer 1945): 176.

④ Pollard, "Words Are Cheaper Than Blood," p. 283.

⑤ Lt. Andie Knutson, "Japanese Opinion Surveys: The Special Need and the Special Difficulties," 9, no. 3, (Fall 1945): 313.

⑥ Phillip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ropaganda in Latin America," p. 305.

⑦ Nat Schmulowitz and Lloyd Luckmann, "Foreign Policy by Propaganda Leaflets," 9, no. 4 (Winter 1945): 428, and Jacob Freid, "The OWI's Moscow Desk," 10, no. 2 (Summer 1946): 156.

军方人员精神士气状况，以及盟军对此力图施加影响的 7 篇报告；^①有关如何应用传单和明信片进行宣传的 3 篇案例分析；^②介绍美军士气研究与训练项目的 6 篇文章；^③至少 12 篇有关战时宣传和心理战图书的书评；^④不少于 15 篇有关美国和苏联宣传与心理战竞赛的多方面研究。^⑤

① Ferdinand Hermens, "The Danger of Stereotypes in Viewing Germany," 9, no. 4 (Winter 1945): 418, M. I. Gurfein and Morris Janowitz, "Trends in Wehrmacht Morale," 10, no. 1 (Spring 1946): 78, Herbert von Stempel, "Confessions of a German Propagandist," 10, no. 2 (Summer 1946): 216, Elizabeth Zerner, "German Occupation and Anti-Semitism in France," 12, no. 2 (Summer 1948): 258, Edward 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12, no. 2 (Summer 1948): 280, Morris Janowitz (reviewer), "Attitudes of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German Nazis," 13, no. 2 (Summer 1949): 343, 346.

② Nat Schmulowitz and Lloyd Luckmann, "Foreign Policy by Propaganda Leaflets," 9, no. 4 (Winter 1945): 428, Boris Joffe, "The Post Card—A Tool of Propaganda," 11, no. 4 (Winter 1947): 613, Marin Hertz, "Some Psychological Lessons from Leaflet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 13, no. 3 (Fall 1949): 471.

③ Capt. John Jamieson, "Books and the Soldier," 9, no. 2 (Summer 1945): 320, Arnold Rose, "Bases of American Military Morale in World War II," 9, no. 4 (Winter 1945): 411, Karl Ettinger, "Foreign Propaganda in America," 10, no. 3 (Fall 1946): 329, Leo Crespi and G. Schofield Shapleigh, "'The' Veteran—A Myth," 10, no. 3 (Fall 1946): 361, John Jamieson, "Censorship and the Soldier," 11, no. 3 (Fall 1947): 367, Paul Lazarsfeld, "The American Soldier: An Expository Review," 13, no. 3 (Fall 1949): 377.

④ Reviews of *The Great Conspiracy* 10, no. 4 (Winter 1946): 596, *Weapon of Silence*, 11, no. 1 (Spring 1947): 133, *Mass Persuas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 11, no. 2 (Summer 1947): 266, *Paper Bullets: A Brief 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World War II*, 11 no. 3 (Fall 1947) *Rebel at Large* [George Creel memoirs] 11, no. 4 (Winter 1947): 626, *Psychological Warfare*, 12, no. 2 (Summer 1948): 331,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12, no. 3 (Fall 1948): 496, *The Goebbels Diaries*, 12, no. 3 (Fall 1948): 500, *Persuade or Perish*, 12, no. 3 (Fall 1948): 511,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13, no. 1 (Spring 1949): 136,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13, no. 3 (Fall 1949): 524, *Publizistik im Dritten Reich*, 13, no. 4 (Winter 1949): 692.

⑤ Jacob Freid, "The OWI's Moscow Desk," 10, no. 2 (Summer 1946): 156, George Counts, "Soviet Vers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0, no. 3 (Fall 1946): 321, Martin Kriesberg, "Soviet News in the New York Times," 10, no. 4 (Winter 1946): 540, Dick Fitzpatrick,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America," 10, no. 4 (Winter 1946): 582; "Public Opinion Inside the USSR," 11, no. 1 (Spring 1947): 5, Alexander Dallin, "America Through Soviet Eyes," 11, no. 1 (Spring 1947): 26, W. Phillips Davison, "An Analysis of the Soviet-Controlled Berlin Press," 11, no. 1 (Spring 1947): 40, O. W. Riegel, "Hungary: Proving Ground for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1, no. 1 (Spring 1947): 58, H. M. Spitzer, "Presenting America in American Propaganda," 11, no. 2 (Summer 1947): 213, Richard Burkhardt, "The Soviet Union in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s," (转下页注)

尽管上述材料内容颇丰，“宣传”、“心理战”等字眼在该期刊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中也时有出现，但这些文章的作者却从未清晰说明这些词汇的含义。即便是该领域的专家，不同的人对“传播”、“宣传”和“心理战”都给出不同的定义。

利奥·克雷斯皮1946年为史密斯(Bruce Lannes Smith)、拉斯韦尔和凯西(Ralph Casey)合著的《宣传、传播与舆论：综合参考指南》写了一篇书评，上述情形在这篇书评中可窥一斑。克雷斯皮首先引用拉斯韦尔的说法，后者认为“‘宣传’针对一般大众……在争议话题上影响他们的态度”，而“教育只是技能和见解的基本传递，与态度无关”。但是克雷斯皮看法不同，他认为任何从事“社会启蒙的教育者”都会赞同说“教育特别关注的正是‘在争议话题上影响大众态度’……(拉斯韦尔)试图给宣传所下的定义并不成立”。^① 宣传和心理战在此类论述中经常出现，该领域带头人们围绕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以及如何与其他传播方式相区分都存有很大争议。

在该书评发表的几期之后，该领域又一位顶尖专家、蓝德公司的汉斯·斯皮尔(Hans Speier)以“心理战的未来”为题做了进一步探讨，文中将“宣传”和“心理战”交替使用，使这一难题变得更加复杂。^② 与之类似，在《公共舆论季刊》年度索引中，“宣传”和“心理战”条目下所列的文章彼此重复，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些概念无法清晰区分。^③

尽管该期刊无法就这些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人们仍能看出，“二战”后的头五年中，该期刊的主要争论都与心理战有关。这通过唐纳德·

(接上页注)11, no. 4(Winter 1947): 567, Hans Speier, "The Future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12, no. 1(Spring 1948): 5, Jan Stapel and W. J. deJonge, "Why Vote Communist?" 12, no. 3(Fall 1948): 390, Whitman Bassow, "Izvestia Looks Inside USA," 12, no. 3(Fall 1948): 430, Martin Kriesberg, "Cross Pressures and Attitudes: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onflicting Propaganda on Opinions Regarding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13, no. 1(Spring 1949): 5, Henry Halpern, "Soviet Attitudes Towar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Germany," 13, no. 1(Spring 1949): 117, Louis Nemzer, "The Soviet Friendship Societies," 13, no. 2(Summer 1949): 265, Kenneth Ols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zechoslovak Propaganda Administration," 13, no. 4(Winter 1949): 607, Leonard Doob, "The Strategies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13, no. 4(Winter 1949): 635.

① "Book Reviews," 10, no. 1(Spring 1946): 99—103, with quotes drawn from p. 100.

② Speier, "The Future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pp. 5—18.

③ 参见《公共舆论季刊》合订本无页码索引中的“宣传”和“心理战”条目。

麦克格拉纳罕(Donald McGranahan)和汉斯·斯皮尔各自所写的两篇理论文章可以很容易看出。麦克格拉纳罕(Donald McGranahan)的“美国的心理战策略”(U. S. Psychological Warfare Policy)一文以致编辑信的形式,发表在1946年秋季号上,^①重点探讨在对特定人群选择胁迫手段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特征。麦克格拉纳罕说,这就是“心理情报与我们心理战政策的联系”。简而言之,他认为当时美国心理战战术受到“广告情结”困扰,过于强调商业广告与公关原则,提倡“要小心,不要冒犯公众或其中任何重要的成员。广告或公关人员最大的兴趣在于最广泛的受众和最小公分母^②”。他认为,即便在二战期间,美国也不大情愿在对德国广播中直接批判希特勒。因为美国知道很多德国士兵对希特勒依旧忠诚,担心如果触犯其信念,将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③

麦克格拉纳罕主张,“正面攻击”对手意识形态的方法会更有效。他说,“福音派宣传”对异教徒的直接进攻让基督教有效地扩散。苏联“猛烈攻击(对手的)领导及(其)政治体系”的做法可激起其目标国家居民内部的不满。美国应在宣传和心理战技巧上应用上述经验,使之“适应(其)独特的目标和我们的民主生活理念”。总之,美国的心理战应该是针对目标国家、积极的颠覆战。如果美国的计划要想奏效,首先要说服本土上心存不满的居民,使他们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去攻击敌方政府,其次才是寻求目标国家居民内的“最小公分母”。^④

麦克格拉纳罕的主张与美国部分传统一拍即合,也更易于在战时条件下被采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毫不含糊地要推翻敌方的专制政权。但这一做法回避了战后心理战行动中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些“颠覆”手段用于和美国在表面上和平相处的政府是否正当?同时,要考虑到,这些颠覆行动要取得成功,资助必然都是秘密的,那么一个民主社会如何确定哪些行动是合适的、应在多大程度上执行?

该期刊1948年春季号的封面文章是汉斯·斯皮尔所写的“心理战的

① Donald McGranahan, "U. S. Psychological Warfare Policy," 10, no. 3 (Fall 1946): 446—50.

② 最小公分母:是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即一群体内最普遍的共性。

③ 同上。

④ 同上。

未来”。有必要在此说明一下历史背景。杜鲁门总统“划清界限”，反对1947年希腊和土耳其的民众革命。1948年柏林危机标志着美苏关系虽未触底，但已向转折的分水岭方向发展。在美国政府内部，1947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通过了“国安委4号”和“国安委4—A号”文件，官方授权采取秘密宣传、破坏和颠覆行动。弗兰克·威斯纳是政府中对这两份文件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那时，他还是国务院占领区部门主管，几个月后他就被任命为秘密战机构——政策协调局的主管。在国务院时，威斯纳的副手就是汉斯·斯皮尔，他们一同确保了“国安委4—A号”文件的通过。^①

就在斯皮尔发表该文的那个春天，他离开政府，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谋了一个临时职位。《公共舆论季刊》刊发他的文章，是将其作为个人学者而非政府官员。但是，斯皮尔的文章，至少是部分内容，明显来源于他在政府中专攻的、利用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美国在德国和奥地利占领区民众进行的再教育工作。在这篇文章中，斯皮尔认为，美国1945年后让心理战武器“形同废弃”，如今应重装上阵。他争辩说，该领域的专家从未得到政府应有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此前所做的努力都被局限于一个特殊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而，这一次“美国不能仍然对政治和心理战保持冷漠”，再也不能“依靠直到战争无法避免后的临场应对了”。^② 在斯皮尔看来，美国对苏联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反抗组织的秘密颠覆行动应该被扩大和升级。

他主张，如果有必要，美国政府应立即着手“制定（美国国内的）戒严法，以防范失败、消沉和动荡”。斯皮尔心中更为紧迫的是，激活旨在推翻敌对政权的、强有力的“进攻”计划。他写道，“颠覆（是）战略宣传的目标。美国……能够针对苏联专制政权发起真正的政治颠覆宣传，在政治领域尤为如此……未来战争的战略宣传策划和准备现在就必须

^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4号和国安委4—A号。威斯纳在国务院占领区部门主管时在心理战政策发展种的角色可见 SANACC Case No. 395, “Utilization of Refugees from the USSR in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March-July 1948 (top secret, now declassified and available on microfilm from Scholarly Resources, Wilmington, DE)。关于斯皮尔在国务院占领区部门时的职务可见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21—24, pp. 829—30, and Contemporary Authors, New Revision Series, Vol. 9, pp. 463—64。

^② Speier, “The Future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pp. 5, 8.

开始。”^①

因此，斯皮尔、麦克格拉纳罕以及其他著名的传播研究专家于1940年代末利用《公共舆论季刊》，呼吁美国安全机构动用最先进的技术在“未来”战争中推翻选定的外国政府，并要立即对此进行准备。斯皮尔的计划包括各种胁迫手段，甚至颁布戒严法，确保美国居民的配合。尽管斯皮尔以建议的形式提出计划，但是根据目前已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看，很多他建议的措施在文章发表时就已付诸实施了。^②

再来看《公共舆论季刊》有关心理战的第二个、也是表现得更为微妙的方面。该期刊许多文章将其读者作为说服对象，使他们支持美国针对其他与之竞赛的国家采取冷战行动，支持大众传播研究专家在其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通常，此类文章并不像麦克格拉纳罕和斯皮尔那样直接倡导心理战行动，而是搭建起他们的讨论框架，以加强美国政府内部强有力的“国际主义”派系的外交政策提议和宣传主题。如前所述，这种现象充分反映在《公共舆论季刊》对各类外交书籍的评论上，显示了评论者（或许还有编辑者）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提议的大力支持，哪怕这些图书与舆论研究并没有什么真正关系。《公共舆论季刊》1946年冬季号至1947年冬季号之间共刊发了27篇书评，其中6篇（22%）是对苏联一般兴趣书籍的评论，但却都出自沃伦·沃尔什（Warren Walsh）一人之手。他的每一篇评论都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必然的，冲突是由苏联挑起的。^③ 沃尔什的书评没有一篇和舆论或传播研究相关，除非笼统地讲，任何政治文章在某种角度都会涉及舆论。

本书并不想评对沃尔什观点的是是非非作出评论，只是想指出该期刊在当时最具争议的议题上，有意地扩散着一幅单色图景。用一个作者

^① Speier, "The Future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pp. 11, 14, 18.

^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4号和国安委4—A号。另可见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in Village Voice, "Special Supplement: The CIA Report the President Doesn't Want You to Read," February 16 and 22, 1976.

^③ 沃尔什的书评包括 M. Sayers and A. Kahn's text *The Great Conspiracy: The Secret War Against Russia*, 10, no. 4 (Winter 1946): 596—97, of Henry Wallace's *Soviet Asia Mission*, 11, no. 1 (Spring 1947): 135, of William van Narvig's *East of the Iron Curtain*, 11, no. 2 (Summer 1947): 269, of John R. Deane's *The Strange Alliance*, 11, no. 3 (Fall 1947): 463, and of George Moorad'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11, no. 3 (Fall 1947): 463—64.

的一个视角,足以表明刊物在东西方问题上确实存有一条编辑“界线”,任何与之相左的观点都不受欢迎。

该期刊在有关其他国际议题的报道上也显现了类似趋势。譬如,1947年,《公共舆论季刊》春季号开始报道意大利的民意调查,刊登了P·卢扎托·弗吉兹(P. Luzzatto Fegiz)针对意大利共产党可能具有的选举实力进行的调查——“意大利的舆论”(Italian Public Opinion)。^① 弗吉兹描述了他设计的研究方法,用以认定意大利选民在多大程度上同情共产党,并得出结论,意大利很快将“成为苏联控制下东欧的组成部分”。接着在1947年冬季号中,又出现了对此的第二篇特稿——菲利克斯·奥本海姆(Felix Oppenheim)所写的“意大利民主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Italian Democracy),表达了很多同样的论调。^② 此后,该期刊又分别在1949年发表关于意大利舆论、1950年发表有关意大利1948年大选中的宣传技巧的两篇文章。^③

在此,还有必要说明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1940年代后半期,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具实力的共产主义组织。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意大利选民可能民主选举出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政府深感忧虑,他们认为这一动向可能会把意大利拖到铁幕背后。“国安委4号”文件和“国安委4—A号”文件第一个秘密心理战行动就无所顾忌,为确保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的选举中败北,投入数百万美元开展了针对意大利和美国受众的“可被否认”的宣传运动。^④

① P. Luzzatto Fegiz, "Italian Public Opinion," 11, no. 1 (Spring 1947): 92—96.

② Felix Oppenheim, "The Prospects of Italian Democracy," 11, no. 4 (Winter 1947): 572—580.

③ Charles A. H. Thompson, review,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13, no. 2 (Summer 1949): 330; and C. Edda Martinez and Edward A. Suchman, "Letters from America and the 1948 Election in Italy," 14, no. 1 (Spring 1950): 111—25.

④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anel C. Reduction of Communist Strength and Influence in France and Italy (top secret), October 26, 1951, record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James Miller, "Taking Off the Glov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talian Elections of 1948," *Diplomatic History*, 7, no. 1 (Winter 1983): 35—55; James Mi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40—195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James Miller, "Roughhouse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s Italian Communism, 1945—58," *Storia delta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5, no. 2 (1989): 279—311; Arnaldo Cortesi and "Observer," "Two Vital Case Histories," in Lester Markel (e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9), pp. 197—212 (sanitized, but with contemporary Italian and French case studies).

这些有关意大利的报道表面上讨论的是意大利，但是《公共舆论季刊》的作者们不断解读并阐释的是，文中所包含的美国政府心理战的主题，而不是心理战本身。需要指出并强调的是，此处不是评论《公共舆论季刊》的立场，也没必要假设该期刊自愿参与美国对意大利大选的舆论塑造。这里只是想指出，从最显而易见的表面来看，这份学术期刊助长了对这些政治议题的单一看法，没有提供与之相反的观点。

《公共舆论季刊》内容中鲜见与其“宣传”角度（一些人可能称呼它的）相对立的观点，但也并非没有例外。艾尔弗雷德·麦克朗·李（Alfred McClung Lee）在1947年春给该期刊主编写信抗议，批判乔治·康特斯（George Counts）1946年的文章——“苏联版本的美国历史”（Soviet Version of American History）。^①他认为康特斯的文章只是单方面指控苏联作家如何在其杂志上歪曲美国历史，而不承认许多美国作家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歪曲了苏联的历史。此后十余年间再没有针对该期刊政治化的抗议。但是，部分读者对该期刊就外国政治新闻做意识形态谴责进行着消极抵抗。有意思的是，1948年，对《公共舆论季刊》读者的调查发现，20%的受访者回答说“越来越少关注（该期刊）对海外民众态度的描述”，并认为该期刊应该对科学方法、宣传运动历史案例以及对宣传效果研究给予更高重视。^②

《公共舆论季刊》及类似学术文献有关心理战主题的第三方面特征表现在，部分作者和编辑在二战结束一年内，仍围绕着秘密心理战项目与中央情报局、军方和国务院保持着非同寻常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可以从该期刊上许多文章和编委会的构成上或明或暗地看出。如前所述，刚刚离开与威斯纳共事的国务院占领区部门，斯皮尔便成了扩大心理战重要的“个体”呼吁者，是《公共舆论季刊》主要作者与政府秘密战项目存在非正式联系的例证。

但此种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变得更为普遍，且不易被识破。1945年弗雷德里克·W·威廉斯（Frederick W. Williams）“对国际合作的区域态

① Counts, "Soviet Version of American History," 321—28; and Alfred McClung Lee, "Are Only the Russians Guilty?" 11, no. 1 (Spring 1947): 173. Lee cites as evidence of his assertion data in Kriesberg's "Soviet News in the New York Times," p. 540.

② W. Phillips Davison, "Preferences of POQ Readers," 12, no. 3 (Fall 1948): 579—80.

度”(Regional Attitude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一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① 1944至1945年,美国舆论研究院和普林斯顿舆论研究办公室在美国不同地理区域,就公众对本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态度进行调查。表面上,威廉斯的文章只是在报告调查所搜集的数据。如《公共舆论季刊》所述,威廉斯利用这些数据强烈呼吁“美国应该加强国际思维”。^②

如今,在该文发表几十年后,可以清楚地知道,威廉斯所引用的数据来源于李施德林(Listerine)的继任者杰拉德·兰伯特(Gerard Lambert)为罗斯福政府开展的秘密情报项目。当年,美国国会禁止政府将基金用于任何形式的选民态度调查,声称宪法赋予国会的职责就是代表“民意”。国会的担心部分出自政治考虑,因为罗斯福利用与民意相逆的信息源来推进有争议的政策,尤其是利用这种方法推进“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尽管有国会的限制,但如让·康沃斯(Jean Converse)所说,白宫仍雇佣了坎特里尔和劳埃德·弗利(Lloyd Free)从事“政府情报工作”,其中包括收集海外秘密情报和在美国进行民意调查。最终,坎特里尔、弗利和弗雷德里克·威廉斯,以及美国舆论研究所走到一起,成了为政府开展实地调查的人员。^③

同时,《公共舆论季刊》的编委会中相当数量的人都深深卷入美国政府心理战研究或行动,其中一些人很大程度上靠政府基金资助为生。例如,1940年代末,该期刊编辑顾问委员会有25—30人,他们多因其舆论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而著名。如本书第五、六、七、八章的内容所述,坎特里尔、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和利克特等人明显依赖政府心理战合约,他们都是政府项目的承包人。他们加入编委会都是因为德威特·普尔,此人后来成为当时中央情报局最大项目——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的主席。^④编委

① Frederick W. Williams, “Regional Attitude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9, no. 1 (Spring 1945): 38—50.

② 同上, p. 38。

③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52—54, 165. 康沃斯在书中列举了一些较早发生的例子,这些例子描述了为美国总统做战略决策服务的机密试验,美国的这些战略决策都是支持英国的。

④ 关于普尔的背景可见 Who Was Who, Vol. 3, p. 692;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pp. 24, 41, 60; and 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pp. 134, 217—34 passim. 另可见 Harwood Childs, “The First Editor Looks Back,” 21, no. 1 (Spring 1957): 7, 柴尔德有关普尔在《公共舆论季刊》创建中角色的文集。

会中另一个重要成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他长期担任自由欧洲广播和自由欧洲基金会主任。该组织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负责在美国运作政治广告活动,并将中央情报局秘密供给普尔负责的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资金洗白。^① 1946至1947年间,该期刊主编为弗利。战时他是代表罗斯福政府的特工,多年后他被指定与坎特里尔分享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百万美元的研究拨款。^②

尽管对其内容的定量研究还有待进行,但《公共舆论季刊》的模式在当时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刊物中反复出现。美国社会学协会及其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在管理者和编辑成员上与美国舆论研究联合会及其出版物《公共舆论季刊》有很多交叉,因此,编委会成员有时会开玩笑说,他们都搞不清自己到底参加的是哪边的会。^③ 《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社会学的各个主题,在广度上超过《公共舆论季刊》,但是其刊登的关于传播的文章或书评却仍限于那么十几位作者,他们同时也是《公共舆论季刊》的主要作者。因此,《美国社会学杂志》上有关传播及其社会作用的观点范围也同样有局限。

此外,对50年代《公共舆论季刊》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围绕大众传播和舆论的文章进行非正式比较,可以看出两份期刊在此领域的文章都来自于心理战合约项目。例如1949年至1950年卷《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各类有关大众传播和舆论的文章共8篇。其中至少4篇直接或间接来自正在进行的心理战项目,包括斯皮尔和赫伯特·戈德海默(Herbert Goldhamer,都来自兰德公司)、斯托弗(美国士兵研究项目)和利奥·洛文塔尔(时任美国之音研究部主任,第六章将详细讨论)等人的文章。^④

① 有关斯坦顿在自由欧洲广播中角色的原材料可见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p. 124; and U. 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U. S. Government Monies Provided to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report no. 173239, May 25, 1972, p. 79.

② 有关弗利在战时的职业经历可见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52—54; 关于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津贴可见 John Crewdson and Joseph Treaster, "Worldwide Propaganda Network Built by CI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77.

③ 协会领导或编委会成员在两机构中都任职的包括塞缪尔·斯托弗、约翰·约翰导赖利和伦纳德·科特雷尔。

④ Herbert Goldhamer, "Public Opinion and Personality" (p. 346), Hans Speie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p. 376), Samuel Stouffer, "Some Observations on Study Design" (p. 355), and Leo Lowenth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Popular Culture" (p. 323); (转下页注)

总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公共舆论季刊》及其他当代学术刊物所发表内容,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年中与美国政府心理战项目紧密联系的三个特征。首先,《公共舆论季刊》经常发表有利于扩大心理战行动的案例分析、研究报告和辩解,成为当时美国宣传和心理战项目重要的支持者。其次,更不易被察觉的是,《公共舆论季刊》许多文章题目所显露出的主题是美国宣传而非心理战本身。它在美苏关系和1948年意大利大选上的编辑底线都是明证。

最后,材料显示,期刊编委会以及文章作者与当时秘密宣传和情报活动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在本章提到的几篇文章以及《公共舆论季刊》编委会构成中觅得线索。至少,《公共舆论季刊》创办者普尔是中央情报局组织和资助的重大宣传项目的全职主管。

传播研究与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间的联系纷繁复杂、盘根错节。对该领域顶级学术期刊的编委会及其内容施加影响只是这种联系的其中一个表现。金钱是新兴的大众传播研究与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之一。由于缺乏连续性的政府报告,一些项目也尚未解密,加之相关年份的数据缺乏,因此经济上的准确数字无人知晓。尽管如此,大体情况还是清晰的。

“政府与社会科学之间主要是经济联系。”社会科学研究局的阿尔伯特·彼得曼(Albert Biderman)和伊丽莎白·克劳福德(Elizabeth Crawford)写道,这种联系“如此深刻,以至于任何与政府关系的危机都将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危机”。^①

(接上页注)each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no. 1 (January 1950). Lowenthal specifically cites his *Voice of America* work in support of his thesis; see p. 324.

^① Albert Biderman and Elizabeth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p. 5.

第五章 政府的前哨

1945 年后的头十年里,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学院、毕业学位等完备且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十年中,美国军方、宣传机构和情报机构为这个领域中的研究项目提供了大量的经费。1952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最早发布了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的数据报告。报告显示,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助中,96%来自军方。另外 4%较为均衡地分别来自传统的民事机构(如劳动部、内政部),以及明确肩负国家安全任务的民事机构(如美国联邦民防管理局、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办公室)。根据这份报告,当年涉及国家安全任务的社会科学基金总额高达 122.7 万美元;与之相比,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的“民事”基金的总额只有 2.8 万美元。^①

这种对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此后有所减少,然而学术界整体对联邦政府的依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却增强了。由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据收集方法的改变,目前缺乏 50 年代晚期可用于直接比较的经费资助数据,但相关的数据暗示,社会科学在此时期每年从国家安全机构(如国防部、民防系统、美国新闻署)获得的经费增长缓慢,1959 年的经费总额为 139 万美元。与此同时,资助社会科学的民事基金(主要来自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福利部)却增长迅速,同年总额达到了 414 万美

^①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统计数据计算而来,见 Federal Funds for Science(Washington,DC: GPO,1953),pp. 39—40。

元。然而,我们不能仅凭这些表面数值就对 1959 年数据呈现出的这种军—民结构做出评价,因为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一大批社会科学研究合作协议在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Aeronautics)的庇护下得以签订,这些研究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这些研究的经费预算由于不能归类,所以很难与 1952 年的数据进行直接比较,但其总额比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经费之和还要多两倍。^①

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支持在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种支持通常与国家安全任务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一情况在 50 年代早期特别明显,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尤为如此。对《公共舆论季刊》、《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家》等学术期刊以及其他在 1945—1955 年间出版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便会发现,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空军、海军、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在此期间资助了几十项大中型规模的社会调查。唯一可与之匹敌的一项“民用”研究貌似是 1950 年农业部针对裁缝的电视效果调查(早期电视效果研究之一),这项研究显然没有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哈里·阿尔珀特(Harry Alpert)^②在 1952 年指出,农业部、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以及其他的民事机构也资助了一些数量有限的消费者偏好调查。^③ 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

^①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deral Funds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GPO, 1960), pp. 66—67。1962 年,一项针对大约 200 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在被问到他们早期的调查、教学、研究和咨询是否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政府的经费资助时,有 44% 的受访者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见 Harold Orlans, *The Effects of Federal Programs o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62), p. 98。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预算在 10 万美元及更高额度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唯一资助来源。见 Albert Biderman and Elizabeth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p. 9。

^② [译注]哈里·艾尔波特是美国社会学家,1953—1958 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项目的负责人。在其任期中,哈里·艾尔波特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的资助指引了方向,并且建立起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学者提供经费支持的基本政策框架。

^③ Harry Alpert, "Opinion and Attitude Surveys in the U. S. Government," *POQ* 16, no. 1 (Spring 1952): 33—41。艾尔波特在这篇文章的引言部分指出,实际上所有与军事情报以及与宣传相关的研究不在该文章的讨论范围内。另外,有关军方合作协议的数据,见 Lyle Lanier,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 no. 5 (May 1949): 127—147。(George Croker(U. S. Air Force Human (转下页注)

据显示,这些调查项目的规模和同时期开展的军事、情报、宣传研究有着天壤之别。

依靠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才得以生存的传播研究中心至少有六家。这些研究中心对心理战经费的依赖程度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倘若没有军方、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能否成为一个独特的、不同的学术领域?

这些主要的受益组织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ASR)、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社会科学研究所(BSSR)、兰德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IS)。这个名单还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20年里,许多更具影响力的专业学者涉足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成为美国心理战项目最积极的支持者。这种努力也为他们带来了部分收入,这对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而言尤其如此,他被认为是当时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最为重要的界定者。这些学者与机构作出的阐释以及他们实际的社会权力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形成至关重要。

以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前身)为例,该中心于1946年夏天由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以及他在

(接上页注)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Some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Within the Military," pp. 112—25, and Howard E. Page (Psychological Sciences Division,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Research Utilization," pp. 126—35, both in *Case Studies in Bringing Behavioral Science into Us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61), pp. 112—35; Erin Hubbert and Herbert Rosenberg, *Opportunities for Federally Sponsor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Maxwell Graduate School, 1951); Raymond Bower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Paul Lazarsfeld, William Sewell, and Harold Wilensky (eds.), *The Us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pp. 234ff; Leonard Mead, "Psychology at the Special Devices Center,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 no. 4 (April 1949): 97ff (see pp. 98—100 for discussion of television-based experiments with "rapid mass learning"); Charles Bray,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Contract Work on Psychology," and John T. Wilson, "Government Support of Research and Its Influence on Psychology," both 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7, no. 12 (December 1952): 710—18; Gene Lyons, "The Growth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Journal of Politics* 25, no. 3 (1963): 489—508; Irving Louis Horowitz, "Why the DOD Is No. 1," *Trans-Action* 5, no. 6 (May 1968): 32.

农业经济调查局时的不少前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①让·M·康沃斯(Jean M. Converse)在《美国的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对该中心做出过如下描述:“调查研究中心在其创建的第一年里扮演了类似联邦政府前哨的角色。”^②该中心早期签订的主要合同有两个:一是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拨款、为期十年的,关于大型组织的士气、领导关系和控制的调查研究;二是由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委托并资助的,关于美国民众对国家经济情况的态度的一系列调查研究,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在战后早期十分关注1930年代那种大萧条可能再次出现,也十分担心退伍军人转入文职工作可能引发社会动乱。^③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早期的战略情报应用研究包括美国空军资助的对苏联逃兵与移民的访谈研究。这项研究有两重目标:第一,确认能被美国宣传所覆盖到的苏联人口之社会—心理学属性;第二,收集苏联境内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情报,以确定核打击目标。^④

根据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档案记录,该机构1947年总收入中的99%来自与联邦政府签订的合同;该中心运营的头五年里,超过50%的收入来自于此。中心继任主管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曾对此有所反思,他认为,如果没有联邦政府资助,调查研究中心“或许早就不存在了”。^⑤

① [译注]二战期间,李克特担任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调查局项目调查部门的主管,为农业部进行社会调查。随着战事的蔓延,李克特所在的农业经济调查局也开始为战争情报办公室(OWI)、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等政府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②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40—341.

③ 同上, pp. 353, 357.

④ Clyde Kluckhohn, Alex Inkeles, and Raymo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Cambridge, MA: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54; USAF contract no. 33 [038]—12909), pp. 20—22, and Annex 1 (on ISR role) and pp. 360—68 (on use in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on the Soviet Union). See also Tami Davis Biddle, “Handling the Soviet Threat: Arguments for Preventative War and Compellence in the Early Cold War Perio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88; and 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p. 138.

⑤ Quoted i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53, 531 note 17.

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NORC)或许是这批早期调查中心中最自由且具有改革意识的一家机构,它在战时的工作约90%来源于和战争情报办公室(OWI)的合同,后者是政府用以了解民众士气的主要窗口。康沃斯认为,这个后盾“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保证了(国家民意研究中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①美国国会于1944年取消了战争情报办公室,但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继而与国务院秘密签订了一系列“紧急”合同,得以继续进行针对民众士气和态度的实地调查。这种安排随后制度化,并成为国家民意中心的一种调查手段,随后以“背负式”问题的方式推销给商业客户。^②

对国务院(而非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而言,染指这些合作协议可能是非法的;1958年,美国国会在这些“紧急”调查持续展开14年后,发现了这一令人难堪的丑闻。^③根据法律规定,为防止干扰国会,国务院被禁止向芝加哥大学的全国舆论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事实上这些调查研究确实怀有此意。该中心的档案显示,如果没有国务院的委托合同,中心在成立后的头十年里不可能组建并运营维护一支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的研究团队;这样一个团队对该中心的学术研究、商业合作以及经济收入而言都至关重要。^④

在这头十年里,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合同是中心与美国陆军化学部队(U. S. Army Chemical Corps)签订的;委托内容是调查个人与群体对“社

^① Ibid., pp. 309, 327. See als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Charles Mack),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1941—1960(Chicago: NORC, 1961), and Supplement 1961—1971(Chicago: NORC, 1972); James Davis,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Since 1948, 2 vols. (Chicago: NORC, 1976).

^② [译注]即国家民意中心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渠道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满足政府客户与商业客户的需求,使得双方均可获益。

^③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21—22. 详细内容参见 Hous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Opinion Polls, 85th Cong., 1st sess., June-July 1957(Washington, DC: GPO, 1957)。对于这些研究的影响的一个示例,可参考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关于苏联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后的公共舆论美的内部讨论。Carlton Savage to George F. Kennan, untitled memo regarding first use of atomic bomb, December 21, 1949(top secret), in Paul Nitze Papers, Policy Planning Staff files, box 50, RG 59,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④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09, 327.

区灾害”的反应,该调查中提及的地震、龙卷风其实是作为化学武器的类比用以模拟被访者的反应。^① 后来,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灾难研究,为美国政府评估核战争的心理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库。^②

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ASR)的经费来源相比之下更为多元。尽管该机构的早期记录较为粗略,康沃斯还是推算出如下结论:该研究所1941年至1946年间约有50%的预算来源于商业委托,如应《时代》和《生活》杂志要求进行读者研究,以及为非营利组织进行各类民意调查;其他经费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大笔捐赠,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少量资助。^③

然而到1949年,应用社会研究所已经欠哥伦比亚大学大量外债,缺乏足够的资金维持项目运作,只能坐等客户支付调查费用。当时应用社会研究所面临的现金流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拉扎斯菲尔德在筹款活动中推测,如果没有人马上伸出援手的话,研究所不得不关门大吉。

但到1949年年底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④签订了新的军事情报合约,大幅改善了研究所的财政。应用社会研究所1950—1951年的预算达到历史新高,其中约有75%的经费来自于与美国的军事、宣传机构签订的合同。^⑤ 在此期间,该研究所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主要项目

① Charles Fritz and Eli Marks, "The NORC Studies of Human Behavior in Disaste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0, no. 3(1954): 26—41; Rue Bucher, "Blame and Hostility in Disas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no. 5(1957); Elihu Katz, "The Night the Sirens Wailed in Chicago," *Chicago Sun-Times*, April 24, 1960. For an example of BASR studies in the same area, see Fred Ikle, "The Social Versus the Physical Effects from Nuclear Bombing," *Scientific Monthly* 78, no. 3(March 1954): 182—87.

② 关于这些研究如何作为核战争计划的元素发挥作用的讨论,可参见 Jack Hirshleifer, *Disaster and Recovery: A Historical Surve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RM-3079-PR, 1963)。

③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269, 506—7 note 42.

④ [译注]金斯利·戴维斯,美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曾被美国哲学学会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欧洲、南美、非洲和亚洲组织进行了多项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人口爆炸”的概念,并对人口转变模式的命名与发展做出重要影响。他与威尔伯特·E.摩尔(Wilbert E. Moore)合作撰写的文章《分层的若干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解读,曾在学界引起反响。

⑤ *Ibid.*, pp. 275—76, 506 note 37.

包括：受空军委托的两个旨在收集国外城市社会动态情报的调查项目，与海军研究办公室签署的一个大型项目，以及与美国之音签署的在中东地区进行民意调查的长期项目。^① 应用社会研究所对联邦资金的依赖程度实际上可能会更高，因为一些表面上的“私人”研究实际上是联邦政府承包给私营机构的调查项目。例如应用社会研究所的李·威金斯(Lea Wiggins)和迪恩·曼海姆(Dean Manheimer)曾作为咨询顾问，向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提供针对在欧洲的苏联流亡者进行访谈和调查的技术指导。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虽然是此项目的承包商，但经费却主要由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提供。^②

美国之音项目开始于1950年秋季，应用社会研究所是主要承包商，查尔斯·格洛克(Charles Glock)^③负责项目的日常工作。这项覆盖地域广泛且在方法论上雄心勃勃的调查在伊朗、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四个中东国家进行，每一个国家都是美国心理战期间的重点目标。^④ 在研究展开期间，至少有两个国家(伊朗和埃及)经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⑤

拉扎斯菲尔德协助草拟了调查问题，并经由会讲本地语言的研究人员在现场提问。这些问题包括：

97a. 你如何看待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你如何看待俄罗

① Ibid., p. 506 note 37.

② Kluckhohn, Inkeles, a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p. 402.

③ [译注]C. 格洛克与 R. 斯塔克提出了著名的研究宗教性的五维度测量法，即把宗教性分为宗教信念、宗教实践、宗教体验、宗教知识和宗教效果五个核心维度，对其中的每一个方面，再分别给出若干个指标。

④ 有关 VOA 研究的历史，可参见 Daniel Lerner with Lucille Pevs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pp. 79—80。有关美国在中东展开的心理战，可参见 William Blum, *The CIA: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Zed, 1986), pp. 31—36, 67—76, 96—107; and Thomas Power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9), pp. 106, 161, 431。

⑤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New York: Morrow, 1986), pp. 94—98 (on Iran); Myron Smith, *The Secret Wars*, Vol. 2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81), pp. xxxiii, xxxv (on Egypt)。

斯针对(你的)国家的行为?(备注:同时对变化进行深入调查)你有这样的感觉多久了?

42. 如果让你负责一个广播电台,你喜欢播放什么类型的节目?(备注:深入调查此问题)^①

应用社会研究所统筹安排了翻译、制表工作,对约 2000 份访谈进行了分析,并最终呈交给美国之音一份机密报告,以便为美国在该区域的广播宣传提供引导。该调查中收集的一些非保密数据在《社会测量》(Sociometry)、《公共舆论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刊登出来。其中包括本杰明·林格(Benjamin Ringer)和戴维·希尔斯(David Sills)撰写的关于所谓的“伊朗政治极端分子”的研究报告,以及由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和帕特里夏·肯德尔(Patricia Kendall)完成的对四个阿拉伯国家在传播和公众舆论方面的比较研究。^②

军方和基金会的关系网

上述三个最主要的传播和舆论调查研究中心与军方宣传机构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如果被置于一张范围更广、关系更复杂、规模更庞大的人际网络中看,也仅是一束小小的纱线。在这张人际关系网络中,研究经费通过受政府青睐的承包商,借由他们的人脉得以扩散,流向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克劳森对学术网络的研究曾对此有所记录)。这些非正式的关系为政府通过拨款对社会科学施加影响的方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新维度。

1947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不同军种间的人力资源委员会,旨在统一管理 and 协调军方对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的各种资助。^③ 这个事实例证了政府对上述研究领域的影响。

国防部和一小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企业家将该委员会作为政—学两

^①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 290.

^② Lerner and Pevsner,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p. 81, 449 notes 1—5.

^③ Lanier,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31—33; and “Psychological News and Not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 no. 12 (December 1948): 559.

界联系的秘密接触点。1949年，该委员会的主任是唐纳德·马奎斯(Donald Marquis, 密歇根大学教授、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威廉·C·曼宁格(William C. Menninger, 来自曼宁格基金会，主要从事军方委托的“作战疲劳”和相关的心理崩溃研究)，卡罗尔·沙特尔(Carroll Shartle, 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成为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部主任)，塞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 来自哈佛大学)。平民代表包括亨利·布罗辛(Henry Brosin, 来自芝加哥大学)、沃尔特·亨特(Walter Hunter, 来自布朗大学)和弗雷德里克·史蒂芬(Frederick Stephan, 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专业工作人员包括委员会执行主任雷蒙德·鲍威尔斯(Raymond Bowers, 后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BSSR]主任)和他的助手德怀特·查普曼(Dwight Chapman)，以及亨利·奥德波特(Henry Odbert)。同年晚些时候，社会心理学家莱尔·拉尼尔(Lyle Lanier, 来自纽约大学)从鲍威尔斯手中接任了执行主任一职。^①

上述委员会虽然没有拨款的权力，但负责监督军事预算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占比、推荐项目以及签订重大的研究计划。与该组织相关的预算、文件和会议记录都是机密的。1949年，该委员会负责监督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约有750万美元，这是截至当时投入该领域的最大的一笔单一来源的资金。^②

人力资源委员会被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专长于社会科学的某一方面。人际关系与士气小组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负责监督美国大多数军事心理战的研究，并对传播研究的资金支持具有最直接影响。其他三个小组分别是心理生理学小组(主要研究人类的高科技武器工程、运动技能开发等)、人事和培训小组(开发针对新兵的心理测试、研究领

^① Lanier,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31—32.

^② 在撰写本文时，相关的确切数字仍处于保密状态，这笔资金额度的大小显然部分取决于1949年时美国国防部对“社会科学”定义的宽泛程度。这里的数值是根据时任人力资源委员会人力资源小组人体工程学及心理卫生学部门的主任拉尼尔(Lanier)的报告推算得出的。该数据在发布前遭到了美国国防部秘书办公室的清除。拉尼尔的估算虽然比当代的其他学者偏高一些，特别是哈伯特和罗森堡(Hubbert and Rosenberg, Opportunities for Federally Sponsor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但是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提供的数字大体一致("Government Support of Research," p. 715)。

导力和群体社会学等),以及人力资源小组(研究武装部队的人员要求与动员)。^①

人际关系与士气小组的构成体现出,在心理战中的传播研究领域,一些学者专家与军事机构之间存在长期的、紧密的近亲关系。但这同时也明显增加了负责监督政府项目的学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因为一方面美国政府依赖传播研究专家们的建议,另一方面这些专家同时也是这些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人际关系与士气小组的主任心理学家查尔斯·多拉德(Charles Dollard)既是卡耐基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兰德公司的受托人,还是斯托弗二战研究分支(即美国陆军有关士气研究的分支机构)的老将。小组成员包括:汉斯·斯皮尔,他以兰德公司为根据地,最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主任;^②亚历山大·雷顿,当时任职于康奈尔大学,后任职于哈佛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工作主要依赖于美国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的相关调查;^③卡尔·霍夫兰,当时任职于耶鲁大学,他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大众传播实验研究》(*Experiment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49),这项成果是依靠独断地使用斯托弗研究分支的战时记录才完成。^④

人际关系与士气小组的有偿咨询顾问名单读起来就好像是那个时代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名人录。根据《美国心理学家》1948年12月的报道,“(为该小组提供)专家建议的特别顾问”^⑤包括哈里·阿尔珀特(Har-

① Lanier,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p. 132.

② 有关小组成员,可参见“Psychological News and Notes,” p. 559 有关斯皮尔的情况,可参见如下资料 Hans Spei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Reconsidered,” RAND paper no. 196, February 5, 1951; Hans Spei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lite and Mass,” World Politics (April 1952 [RAND paper no. P - 270]); Hans Speier and W. Phillips Davison,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Foreign Policy,” RAND paper no. P - 615, December 15, 1954. On RAND’s origins see Fred Kaplan, “Scientists at War: The Birth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American Heritage 34 (June-July 1983): 49—64.

③ Alexander Leighton, *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utton, 1949).

④ Carl Hovland, Arthur Lumsdaine, and Fred Sheffield, *Experiments in Mass Communi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This is the third volume in the American Soldier series.

⑤ “Psychological News and Notes”.

ry Alpert, 耶鲁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①、金斯利·戴维斯(刚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主任, 由于他获得了政府项目合同而拯救了濒于关门的应用社会研究所)、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 卡耐基公司, 此后在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成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秘书)、哈罗德·拉斯韦尔(耶鲁大学)、伦西斯·利克特(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主任), 以及埃尔默·威尔逊(国际研究协会, 美国政府海外舆论研究的主要承包者)。^②

小组主任查尔斯·多拉德和顾问约翰·加德纳的角色, 体现出这些传播学者和联邦政府之间存在复杂的财务关系及人际关系。多拉德是卡耐基公司的董事长, 而加德纳是卡耐基公司的一位资深高管。两人都亲自参与资助和监督了美国士兵研究, 该项目由塞缪尔·斯托弗、卡尔·霍夫兰、伦纳德·科特雷尔和其他研究者负责, 表面上是一项具有私人性质、非官方的研究。此外, 多拉德和加德纳还赞助了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项目, 这是卡耐基公司、美国空军、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资的合作项目, 雇佣了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及其他关注苏联的传播研究者。^③ (此前我们刚讨论过, 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作为项目承包商, 曾向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SR]及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ASR]咨询过如何开展针对苏联流亡者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到, 当时美国国防部涉及心理战科学问题的主要委员会(陆军研究处), 是由卡耐基公司的多拉德担任主任, 并向卡耐基公司的加德纳寻求咨询; 当时卡耐基公司的两项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则依赖

① [译注]哈里·阿尔珀特(1912—1977), 美国社会学家, 以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担任董事期间负责的社会科学项目为世人所瞩目。阿尔珀特在该基金会任职期间(1953—1958), 不仅努力引导了基金会向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的方向, 并建立了基本且可行的政策框架, 从而有效地宣扬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合理性和价值。

② “Psychological News and Notes”。

③ 有关多拉德与加德纳在委员会中的角色, 可参见前引书。有关加德纳在卡耐基公司的角色, 可参见 Who's Who, 1974—1975, p. 1099。有关卡耐基公司在美国士兵系列研究中的角色, 可参见 Samuel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26。

于与国防部的合作获得资金、独家数据和研究对象。与此同时,至少有两位在同一委员会的资深学者(斯托弗和霍夫兰),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多拉德和加德纳的商誉和财力以巩固自己在学界的特权地位。事实上,斯托弗和霍夫兰开展研究所需要的资金,由卡耐基的主管控制着。

至少,这表明了卡耐基公司和国防部的社会科学项目并没有脱离彼此独自运行。两个项目在核心成员、经费资助的优先级别、数据源等方面的大量重合,有力表明了两者实际上相辅相成、相互协调。这两个组织对社会科学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角色和作用有着起码的共识。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卡耐基公司及与之有所重叠的政府监督委员会,对用于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研究的大部分公共和私人资金具有实际的控制力(或实质性影响),对那些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往往能够对学者学术生涯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而言尤为如此。

置身于这种非正式关系网络中的学者和管理者们对自身的角色具有清醒认识:即经济和政治势力在学术社区中的捐客。1987年,正在哈佛大学调查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起源的奥康纳(Charles O'Connell),曾对卡耐基公司的约翰·加德纳进行过访谈。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后二战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人际关系时,加德纳回答说,他当时至少参与了四个能够对该领域的重大举措或决策产生影响的重要“网络”。

第一个网络,我将称之为行为科学关系网。其成员包括查尔斯·多拉德、克莱德·克拉克洪、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和我,还有塞缪尔·斯托弗、约翰·多拉德(查尔斯·多拉德的兄弟)以及亚历山大·雷顿……我们都对行为科学本身及其对所有成员共同关心的问题具有的启发作用深感兴趣……第二个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哈佛大学关系网,成员包括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德弗洛·约瑟夫(Devereux Josephs)……第三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脱胎于战争的国际事务关系网……我们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深深陷入了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中,我们会在各种论坛上相遇,并且和福特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国务院等机构一起工作……^①

加德纳继续说道，第四个网络是围绕斯托弗在（陆军研究处）形成的，其成员包括查尔斯·多拉德、弗兰克·凯佩尔（Frank Keppel）、弗雷德里克·奥斯本（Frederick Osborn，斯托弗在战争时期的军事上级，同时还是卡耐基公司活跃的受托人），以及斯托弗本人。

根据加德纳的上述观点，对冷战时期向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经费支持的另外两个来源——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拉塞尔·塞奇基金会（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进行简单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50年代提供给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基金是由利兰·德维尼（斯托弗在美国士兵系列研究中的合著者）主导的。^② 在德维尼任职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似乎成为了摆在公众面前的一个幌子，帮助哈德利·坎特里尔的研究所隐藏了其在国际社会研究项目从中央情报局获得的至少100万美元的经费，有关原因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细致的讨论。^③ 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本人是心理战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并于1954至1955年间担任艾森豪威尔在心理战问题主要顾问及军师。^④

伦纳德·科特雷尔于1951至1967年间，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担任首席社会心理学家；他不仅往往作为该机构的新闻发言人露面，而且对基金会的决策制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⑤ 科特雷尔同时是国防部心理与非常规战争顾问组主席（1952至1953年）、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成

① Charles O'Connell,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 Soviet Studies at Harvard," Ph. D. diss. UCLA, 1990, pp. 178—79.

② John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as a Career Contingenc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7, no. 2(1984): 212.

③ 坎特里尔对此事的解读，可参见 Hadley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31—32, 145. 《纽约时报》对此事的解读，可参见 John M. Crewdson and Joseph Treaster, "Worldwide Propaganda Network Built by the CI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77.

④ Thomas Sorenson, *The Word War: The Sto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Harper, 1968), p. 46.

⑤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p. 212.

员(1954至1958年)、美国陆军的科学顾问组成员(1956至1958年),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常务理事。^①科特雷尔是社会科学界在心理战行动中最富有激情的推手之一,他多次呼吁成立“一个(社会科学家之间)的新社团,致力于促进本学科在心理战领域承担任务的能力”。^②

综上所述,这些证据表明,冷战开始后的头15年里,美国社会心理学及有关大众传播行为诸多方面的研究,所获得的大部分经费实际上只是受一小群人的直接控制或重要影响。这群人自二战以来秉持精英立场、极力支持将心理战作为发挥内政外交政策影响力的工具。他们利用权力,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委员会及人事任命,将主流学界和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关联在一起。他们的关系网络大都对外界封闭,他们的记录和决策过程往往处于保密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其协调机构的存在都是一项国家机密。^③

如果按照“阴谋”这个词所包含的陈腐意义来理解,这不是“阴谋”;用社会学家所熟知的概念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参照群体”或非正式网络。这些关系网络所行使的非正式权威揭示出一个明显的中间派意识形态趋向:那些支持科学进步观和国家安全观的研究项目,更有可能获得经费支持;后者往往是保障学术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那些不符合上述标准的研究项目将逐渐变得无人问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极力压制。这种有选择的资助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那些得到精心阐述的科学真理往往支持或赞成研究经费提供者的预设或假想。

这些资助机构和紧密联系的委员会无疑为这一时期传播研究特定范式的阐述提供保障,毕竟范式的制定就是解答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更为

① “Cottrell, Leonard Slater,”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107, p. 100.

② Leonard Cottrell, “Social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Sociometry* 23, no. 2 (June 1960): 103—19, with quote at p. 119.

③ 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Holt)曾提及威尔伯·施拉姆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度机密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工作过,参见 Robert Holt, *Radio Free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8), p. 236. 相关材料还可参见“Briefing Paper—Schramm Meeting,” August 1, 1956 (formerly secret, declassified 1991), Wilbur Schramm files, USIA Library Historical Collection, Washington, D. C.

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政府的心理战计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北美传播学的时代精神？当然，在此过程中也有其他力量的贡献，特别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曾强调过商业化项目，另外迪利亚(Delia)和其他学者也对传播学的学术发展进行过讨论。^①

我们无疑应对影响传播研究演进发展的每个因素给予精确的考量，而有关争论仍未告一段落。因为现有的数据过于简略，无法得出有力的最终答案。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为传播研究中心的生存和运转提供了经济担保，为其所从事的大规模调查项目提供必要经费，并为一群惺惺相惜的学者搭建了人脉关系，这些学者往往对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决定权或能够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元素对传播学研究领域“可获得的知识”造成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另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个时期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是“控制论”(a paradigm of dominance)的必要组成部分，该范式认为精英对传播的控制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当时重要的学术期刊并不醉心论证传播“是”什么，而是致力讨论精英如何使用现代技术来管理社会变化，如何提取政治让步，或者如何从目标受众那里获得购买决定等问题。传播领域经学术研究得以强调的这些方面，实际上是资助这些研究的各类公共或私人机构最为感兴趣的方面。这种研究趋向无视内在于传播活动中极端复杂的、共有的社会过程，仅仅将传播窄化为以说服力(同时最终也是胁迫性)信息传播动态关系为基础的简单模型。

^① Robert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p. 504—5. [译注]本书中译本《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于2008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第六章 “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

前几章曾提及,学术界对心理战的参与有三种形式。本章指出,这种参与形式在朝鲜战争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峰。1950年之前,学术期刊对心理战的讨论已然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对二战经验的总结,或开始沉浸于讨论在临近的冷战中该如何做才能使心理战的战略生效。从1950年开始,大量的研究报告显示出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心理战的关注以及对军方新近资助的传播效果研究的热衷。

不少朝鲜战争时期的研究成果出自当时最杰出的大众传播研究者之手。回顾历史,人们最终会发现,这些研究者具有下述共同特征:他们不仅撰写了各式各样的研究文本,而且从大量官方和私人的合作协议中受益;不仅在重要的学术期刊的编委会中任职,而且最终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院的系主任和名誉教授。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网络的建构过程中,一些人的专长转化成我们现在熟知的专业“知识”,即传播学的“知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空军将威尔伯·施拉姆、约翰·W·赖利与弗雷德里克·威廉斯派往朝鲜,对反对共产主义的移民进行访谈,对美国的心理战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既包括提交给空军的机密版本,还包括公开的学术版本,即刊登在《公共舆论季刊》的论文,以及一本名为《红军占领城市》(*The Reds Take a City*)的流行畅销书。^①

^① John Riley and Wilbur Schramm, *The Reds Take a City: The Communist Occupation of Seou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1); John Riley, Wilbur (转下页注)

该书中满是关于战争和暴行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精心编辑之后被用以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该书在美国政府资助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亚洲、欧洲各国，并成为对朝鲜战争爆发原因进行解释的“权威”。

同一时期，《公共舆论季刊》上至少有 6 篇论文涉及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受“美国之音”所托在中东进行的调查研究（或是研究摘要，或是中期报告），其中一篇对丹尼尔·勒纳根据此项目的调查数据与结论进行整理分析所成的专著^①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勒纳本人则是该期杂志的编辑。^② 紧随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军方研究项目的方法论报告在学术文献中进一步扩散，^③对东欧和苏联传播行为的研究也呈现出同样的趋

（接上页注）Schramm, and Frederick Williams, "Flight from Communism: A Report on Korean Refugees," POQ 15, no. 2 (Summer 1951): 274 (除另作说明，本章所有未注明出处的文章均刊登在《公共舆论季刊》上)；Wilbur Schramm, F. E. C.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Radio (Washington and Baltimore: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52, ORO-T-20[FEC], 秘密安全信息)。有关美国新闻署翻译并传播的《红军占领城市》，参见 Raymond Bower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Paul Lazarsfeld, William Sewell, and Harold Wilensky (eds.), *The Us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p. 245。

其他一些著名的传播学研究者也参考了朝鲜战争期间为国内宣传而进行的难民访谈的资料，参见 W. Phillips Davison, "The Lesser Evil," Reader's Digest 58 (June 1951): 97—100。戴维森的论文最初是作为兰德公司第 P—194 号研究的成果(1951 年)。

①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8.

② J. Mayone Stycos,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s in a Rural Greek Village" 16, no. 1 (Spring 1952): 59—70, J. Mayone Stycos, "Interviewer Training in Another Culture" 17, no. 2 (Summer 1952): 236—46, Benjamin Ringer and David Sills, "Political Extremists in Iran: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s Data" 17, no. 4 (Winter 1952—53): 689—702, J. Mayone Stycos,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in Other Cultures" 19, no. 1 (Spring 1955): 68—78, Patricia Kendall, "The Ambivalent Character of Nationalism among Egyptian Professionals" 20, no. 1 (Spring 1956): 277, Morroe Berger (review),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22, no. 3 (Fall 1958): 425.

③ 例如，Eric Marder, "Linear Segments: A Technique for Scalogram Analysis" 16, no. 3 (Fall 1952): 417—31, Samuel Stouffer, Edgar Borgatta, David Hays, and Andrew Henry, "A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Cumulative Scales" vol. 16, no. 2 (Summer 1952): 273—90, Andrew Henry, "A Method for Classifying Non-Scale Response Patterns in a Guttman Scale" 16, no. 1 (Spring 1952): 94—106, Edgar Borgatta and David Hays, "The Limitations on the Arbitrary Classification of Non-Scale Response Patterns in a Guttman Scale" 16, no. 3 (Fall 1952): 410—16, Edgar Borgatta, "An Error Ratio for Scalogram Analysis" 19, no. 1 (Spring 1955): 96—99。

势——可以确认这些研究至少有一项与中央情报局签订了合作协议。^①

朝鲜战争前夕,如同黑色宣传和秘密宣传曾经历过的那样,白色宣传和公开宣传领域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1947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采纳“国安委4号”和“国安委4—A号”文件未滿三个月之时,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批准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美国国际信息办公室(OII),即美国新闻署(USIA)及其海外分支美国新闻处(USIS)的前身。“美国之音”遂被整合进来,并在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危机中获得了大笔经费支持。^②

在公开的宣传战的初始阶段,新闻工作者和公共关系专家比社会科学家似乎更具影响力。国际信息办公室和早期的美国新闻署所签署的原则声明反映出(借用丹尼斯·麦奎尔媒介理论的术语)^③这些新闻工作者的操作理论(the working theories of journalists)和外行观察者的日常理论(common sense theories of lay observers)。他们在进行宣传时只对精英与大众做出模糊区分,比如,即便是早期的学术交流项目也试图将目光投射在那些外国精英或者有希望进入精英圈子的年轻教授身上。诚然,美国对西欧受众的广播节目显得更富有经验,这得益于美国外包给私人调查专家并雇佣本土访谈调查员开展的地域性受众研究(政府之所以给这些调查披上私人的外衣,据称是因为如果承认研究受到美国的资助将有可能对受访者产生影响)。针对东欧和中国“封闭”社会展开的那些昂贵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广播,其效果却难以预计、飘摇不定。这不仅因为难以获知美国广播信号所能穿透的实际范围,还因为无从知晓到底有多少人能收听到这些广播。^④美国情报和宣传部门对美国广播节目的效

① 参见 Brutus Coste, “Propaganda to Eastern Europe,” 14, no. 4 (Winter 1950): 639—66. 考斯特先后受雇于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和欧洲沦陷国家大会(the Assembly of Captive European Nations), 两个组织的资金几乎完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

② Sorenson, *The Word War*, pp. 21—30.

③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1987), p. 5.

④ Edith Bjorklund,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Program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and the Overseas Information Center Libraries,” *Library Quarterly* (October 1968): 414; and Herbert Schiller,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p. 140, 205.

果可谓知之甚少。它们是否为美国赢得了朋友？是否应该用更具感染力的言辞？“信息”节目所能起到的效果是否真的有所不同？

麦卡锡议员和他的盟友们对“美国之音”和美国的情报工作发起了政治攻击。在此压力下，政府遂向二战时期合作过的社会科学家们寻求帮助，以期解答这些让人困惑的问题。联邦机构和学者间重建起来的关系很快具有了共生性质。很多社会科学家将大众传播研究视为一个前景广阔却缺乏资金的领域，于是他们为赢得新的合作协议展开了激烈竞争。政府对那些看起来最为可靠，而且对其宣传、情报和军事训练项目做出贡献的学者给予了回报。我们将会看到，合约竞争带来的一个实际结果是，促成社会科学界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大部分压力并非是由外界施加的，而是来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

“随手可得的太平盛世”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为“白色”宣传机构（如“美国之音”和美国新闻署）进行的传播研究应否被看作美国心理战的一部分？对《公共舆论季刊》、《美国社会学杂志》以及同时期其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许多学者将他们的研究看作是心理战的一种形式，而且在进行研究时也对此结果有着清醒认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

以1951年夏天美国舆论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年会为例，主办方安排了三场专门讨论心理战的会议，鲜明地展示了当时主流传播研究者的时代特征。各场会议传达出一个意见共识：美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应被视为对美国心理战的一种贡献。6月25日周一的会议由W·菲利普·戴维森担任主席，主题是“美国舆论研究对心理战的贡献”，主要演讲者包括埃尔默·威尔逊（国际舆论研究有限公司）、利奥·洛文塔尔（“美国之音”项目的研究主管）、丹尼尔·勒纳（斯坦福大学）和约瑟夫·史代考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发展中国家专家）。兰德公司（该公司当时完全仰仗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合约生存）的代表是戴维森，他在介绍威尔逊时提到的轶事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此次会议的主要基调，后者刚刚完成一项针对五个西

欧国家的、表面上是私人性质的快速舆论调查。戴维森提到,该调查的中心议题是“通过测量人们是否愿意做一些与自身感受相关事情,从而了解谁是站在我们(即美国政府)这一边?”威尔逊的调查对技巧有着极高要求,他本人自然是个中高手,导致“跟踪他的苏联特工耗尽心力不得不被换掉”。^①

洛文塔尔用带有些许奇幻色彩的演讲总结了“美国之音”的传播研究观,他认为“美国之音”在寻求一种“最终奇迹”,即“在心理战中运用舆论调查而获得随手可得的太平盛世”,洛文塔尔继续说道,“在那遥远的一天,士兵们只要告诉研究员有关内容、受众、媒介和预期效果等基本要素,研究员就可以像做出一道代数方程式那样测算出结果”,然后就可以打赢这场战争。^② 在随后出版的论文中(由洛文塔尔与同在“美国之音”工作的约瑟夫·克拉珀共同撰写),洛文塔尔将“美国之音”的国际广播称为“心理战的类型之一”,并指出传播研究和舆论调查“在当前的战役中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③

约瑟夫·史代考斯在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在中东为“美国之音”进行的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将心理战视为“美国之音”项目的核心原理。他指出,针对游牧人口的调查对于“心理战的长期研究十分重要”,这不是因为调查本身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也不是由于它能够促进游牧民族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双向交流与“沟通”。^④

上述观点决不仅限于“美国之音”。美国舆论协会主办的第二场会议,由海军研究办公室的约翰·麦克米兰担任主席,主题是“国防中的舆

①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t the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Princeton, June 22—25, 1951,” 15, no. 4 (Winter 1951—52): 768ff. 有关戴维森主持的论坛,参见美国舆论协会年会会议论文集,“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15, no. 4 (Winter 1951—52): 801—5. (注意不要与同期中克拉珀与洛文塔尔合著的一篇有着相似标题的文章混淆。)

② AAPOR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p. 802.

③ Joseph Klapper and Leo Lowenthal, “The 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the Evaluation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15, no. 4 (Winter 1951): 651.

④ AAPOR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p. 804.

论和传播研究”。美国空军代表发言的重点涉及心理战中空军感兴趣的诸多关键领域,包括“对公众潜在恐慌的测量方式,将空投传单作为传播工具的有效性,以及心理战的整体问题”。^①此外,本届年会的主席会议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主持,国务院国际广播部的总负责人福伊·科勒进行了主题发言。后者发言的题目是“舆论研究在现阶段美苏争霸战中的角色”,^②突出体现了该场会议的特征。

1952年冬季《公共舆论季刊》国际传播研究专刊标志着心理战项目在学术性的传播研究中的整合程度达到了历史新高。该特刊由利奥·洛文塔尔(时任“美国之音”项目调查负责人)担任客座编辑,是冷战时期国际传播的最新研究和学说的首份正式汇编成果。之所以专门提及这个项目,是因为它不仅证明了“独立的”传播学者与政府心理战行动之间的紧密互动,而且展示了诸多用以遮盖这层关系委婉说法。

利奥·洛文塔尔在《公共舆论季刊》的工作及其在“美国之音”的经历显示出,美国知识分子与科学家在冷战早期所承受的压力复杂且充满矛盾。洛文塔尔是一位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他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历史中毫无争议的反共时期为美国政府工作,在功能论鼎盛时期从文化角度对传播理论进行批判——他既是一名幸存者,也是一位陈规破坏者。^③尽管如此,洛文塔尔公开发表的观点及其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职业生涯,与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杰伊·拉沃斯通(Jay Lovestone)、西德尼·胡克(Sidney Hock)以及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人相似(只有一个例外者,稍后会讨论到)。他们都是知

① AAPOR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National Defense,” 15, no. 4 (Winter 1951—52): 794.

② AAPOR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residential Session,” 15, no. 4 (Winter 1951—52): 795.

③ 有关洛文塔尔的生平及其著作的概述,参见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passim; Leo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Martin Jay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4); and Hanno Hardt, “The Conscience of Society: Leo Lowenthal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 no. 3 (Summer 1991): 65—85.

名的反共自由主义者,在抨击斯大林政府之前,曾长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家。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激发出一种背叛感;再加上斯大林政权日渐残暴并暴露出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组织中受到条条框框约束的知识生活,以及西方为了诋毁和破坏知识分子和工会领袖对革命的支持而进行的一系列高效的宣传活动,等等,使已经幻灭的理想——当时流行的文本《失败的神》如是表述——广泛传播。^①

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一批对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心理战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顾问,在各自职业生涯的某个时期,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并在针对苏联、中国及第三世界民主主义的心理战任务中运用辩证法及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奥·洛文塔尔也是如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及其他学术期刊上的批判文章以及从事的编辑工作,非常明显是为了达到提升美国国际宣传影响力而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观点。^②

洛文塔尔对他当年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回忆,体现出了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相似的矛盾心理。“我不喜欢伪装成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的狂热批评者”,多年以后,洛文塔尔在接受采访时,对他的政府工作做出如下评价。^③

我从自己(在“美国之音”)的特定功能来看的话,毕竟,我只是美国宣传机器中某个部门的主任,而该机器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和制定。……无论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二战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分析德国的宣传)还是我,都没有向政府妥协。我不得不说,不论是

① 幻灭相关内容,参见 Crossman, *The God That Failed*, essays by Arthur Koestler, Richard Wright, Stephen Spender, etc.; 有关麦克斯·伊斯特曼、西德尼·霍克、詹姆斯·伯恩汉姆等人,参见 John P. Diggins, *Up from Communism: Conservative Odyssey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有关杰伊拉沃斯通及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参见 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② Oseph Klapper and Leo Lowenthal, “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15, no. 4 (Winter 1951) 651—62.

③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p. 93—94.

在战争时期我为美国战时新闻局工作，还是在战后我在“美国之音”工作，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在为一个帝国主义强权效力。……毕竟，当时美国与苏联是互相敌对的两极，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间点，很难分辨出两者谁参与了更多的帝国主义政治。

在局势明朗后，洛文塔尔没有步伯恩汉姆、拉沃斯通等人的后尘。随着冷战的深化，他拒绝成为一名职业的反共活动家，而更愿意进入学界。1952年新一届共和党政府成立后，他跳出了政府，进入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当上了教授。^① 最终，洛文塔尔在随后做成了许多其他学者未竟之事：他设法将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及其他往往相互敌对的知识传统融为一体，并在有生之年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元老。^② 总之，洛文塔尔在心理战中为“美国之音”所做的工作并非个案；相反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具有改革意识的传播研究科学家具有一致性。洛文塔尔在“美国之音”的经历揭示出，美国知识界对心理战的回应具有暧昧和矛盾的色彩，并反映出冷战早期反传统的学者们不得不在两极中做出选择而承受的重重压力。

洛文塔尔 1952 年围绕国际传播研究编纂的《公共舆论季刊》，为那些暗中与政府签订合约却不为人知晓这层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这些论文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被宣传成有关国际传播的前沿观点。

查尔斯·格洛克(Charles Glock)“关于传播和意见形成的比较研究”^③便是其中一例。格洛克对“国内传播系统”概念进行了较详细的阐释，探讨了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大众和意见领袖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该体系的方法概要。洛文塔尔将格洛克的研究呈现给《公共舆论季刊》的读者时，只简单提及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一项成果，并未对概念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进行更多解释。但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最近公开的档案显示，格洛克的研究实际上获得了国务院的资助，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BSSR)的合作项目，

①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pp. 81—110 passim.

② Hardt, “The Conscience of Society.”

③ Charles Glock,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Opinion Formation,” 16, no. 4, (Winter 1952—53): 512—26.

目的是加强对意大利和近东地区(当时美国心理战的主要目标)对公众舆论的操纵。^①

政治层面的考量对格洛克的研究议程设计产生了明显影响。格洛克强调:“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东方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觉醒,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对来自‘帝国主义’西方的事物产生了不信任感。”“有证据表明,埃及的知识分子对来自美国的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矛盾情绪……因此有必要从舆论形成的范畴,研究在变动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中……外部信息以哪些不同的方式被吸收。”^②

姑且不论格洛克所做研究的科学价值如何,他的这项应用性政治研究很明显是为支持一个特定目标而设计的,即为了维护美国政府在意大利和近东地区的国家利益。

格洛克的观点被当时在同一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其他大众传播研究者所采纳。这并不是说,那些无须背负由资助者所强加的政治包袱的研究者,就有能力将格洛克的研究变成一个中立的科学进步,或许有人可以做到。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反,几乎所有步其后尘进行“国内传播系统”研究的项目都得到了国务院和美国陆军的资助;和资助格洛克研究的动机相同,资助者将这些研究当作一种旨在达成同一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工具。社会科学研究所(BSSR)的档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格洛克的研究成果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53年的课题竞标中获胜提供了基础,沿着同一思路继续协助国防部的洛文塔尔办公室^③,对东欧卫星国家^④和菲律宾^⑤的

①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Stanley Bigman, project director),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SIA, November 1953,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4, project no. 642, p. 1.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② Glock,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 522.

③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④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ss Communi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10, project no. 30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亦可参见 BSSR, “Hungary,” series II, box 11, project no. 303, in the same archive.

⑤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in Philippines Survey,”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3, project no. 627,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pecial Libraries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国内传播系统”展开系列研究；此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代表美国陆军对亚洲的前苏联共和国的传播系统展开了类似研究。^①

除了格洛克的研究，1952年冬季《公共舆论季刊》国际传播研究专刊上的其他文章也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本杰明·林格和戴维·希尔斯合著的《伊朗的政治极端主义者：对传播数据的二次分析》一文声称只是应用社会研究所一项关于中东动荡国家的意见数据。实际上，这篇论文是国防部资助的、针对伊朗政治趋势研究的成果。当时的背景是，中央情报局正在伊朗资助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国民政府的政变，论文标题中所谓的“政治极端主义者”大部分是摩萨德的支持者。^② 总体看来，同一期中关于苏联传播行为的研究^③，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广播的研究^④，以及从方法论角度讨论对东欧移民进行访谈的价值（作为测量美国宣传有效性的晴雨表）^⑤等文章都呈现出类似的属性。

丹尼尔·勒纳为这期特刊的读者提供了意识形态引导。他详细论述且未收到任何异议的论点是，那些未能向美国对外政策举措敞开怀抱的学者“对自由世界而言是一个巨大损失”。在勒纳看来（支持其立场的编者或许也有此看法），开展反“中立者”情感（如和平、安全和紧张感松弛）的运动，“是每一个有能力且有意愿提升传播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相关性

①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awrence Krader and Ivor Wayne, project directors), "The Kazakhs: A Background Study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Task KAZPO, technical report no. 23, November 1955),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4, project no. 649,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② Ringer and Sills, "Political Extremists in Iran." 有关伊朗军事政变，参见 John Ranelagh, *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p. 260—64.

③ Alex Inkeles, "Soviet Reactions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pp. 612—17; Paul Massing, "Communist References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618—22; Peter Rossi and Raymond Bauer, "Some Patterns of Soviet Communications Behavior," pp. 653—65—all in 16, no. 4 (Winter 1952—53).

④ Harold Mendelsohn and Wemer Cahnman, "Communist Broadcasts to Italy," 16, no. 4 (Winter 1952—53): 671—80.

⑤ Richard Sheldon and John Dutkowski, "Are Soviet Satellite Refugee Interviews Projectable?" 16, no. 4 (Winter 1952—53): 579—94.

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①

《公共舆论季刊》刊登的学术论文创造出一种“私人”情境,这种情境推进了修辞系统的完善,将学者表达的观点与其研究的实际用途隔离开来。洛文塔尔的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例证。1952年夏天,洛文塔尔在《公共舆论季刊》坦陈他负责的“美国之音”项目是“心理战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②但在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为“国际传播研究”所编纂的特刊中,没有明确提及与心理战相关的论文,也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为心理战服务的^③——1952年《公共舆论季刊》的索引目录中只有两篇论文被列入“宣传”条目,而没有一篇论文被列入“心理战”条目,该事实亦能为此提供证据。

这种隔离非常有效。洛文塔尔编辑的特刊中有四篇主要文章(包括格洛克的文章在内)被收录进施拉姆的《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中(此书被视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被一代代高校读者研读。^④这本书挑战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假设,即认为媒介受众的行为毫无差别的假设,这一观点有时也被称作宣传的“魔弹论”(magic bullet)。此后施拉姆持续推广适合所谓受众行为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意见领袖”现象、创设“参照小组”趋势等等,这些理论和研究成果都是为了设计更加成功的群体操控术而使用的策略元素。

施拉姆更愿意用“传播研究”而不是“心理战研究”来描述他的研究。其实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传播研究”一词能弱化催生该研究领域的社会情境。与此同理,施拉姆将上述研究文章溯源于《公共舆论季刊》,而非与政府的合作协议,从而为其平添了一层学术伪装,为

^① Daniel Lerner, "International Coalitions and Communication Content: The Case of Neutrality," 16, no. 4 (Winter 1952): 681-88, 另 pp. 687, 684, 688, 也有相关引述。

^② Marjorie Fiske and Leo Lowenthal, "Some Problem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16, no. 2 (Summer 1952): 149-59, 另 p. 150 也有引述。

^③ "Special Issue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Leo Lowenthal, Guest Editor," 16, no. 4 (Winter 1952-53). 《公共舆论季刊》索引不分页,在词条“宣传”下面可以见到文章数。虽然该杂志在1952年之前与之后都设有“心理战”的词条,但是在1952年的索引中没有该术语。

^④ Wilbur Schramm (ed.)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4).

读者清楚辨识出这些研究的原始出处进一步制造了烟雾和陷阱。^① 鉴于这种欺骗方式的隐蔽性，从施拉姆作出的、备受读者青睐的解释中，我们无法了解到格洛克博士曾经依靠为一种特定的传播行为（国际政治宣传）提供咨询建议而谋生，因为这些信息早已从读者接触到的文本中移走了。读者所能看到的，其实是《公共舆论季刊》的信誉支撑起来的一个暗示性主张，也就是学界已达成了一项明显共识——国际传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阐释如何将本国的国家意志强加于他国。

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与联邦资助项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始于朝鲜战争时期，并持续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若要理解这一关系，可以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中入手。社会科学研究所于 1950 年在美利坚大学成立，有关该研究所的历史档案主要收藏在美利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图书馆。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所聘请了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包括罗伯特·鲍尔（Robert Bower）、库特·巴克、阿尔伯特·彼得曼、伊丽莎白·克劳福德、雷·芬克（Ray Fink）、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以及艾弗·韦恩（Ivor Wayne）。^②

社会科学研究所现存的合约数据显示，以下研究成果均是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进行并完成的，包括：以东欧和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人民为对象的“心理战的目标及其脆弱性”研究；一个“旨在从社会、政治和心理各方面了解暴力……因为这事关军事力量的控制和利用”的项目；一份关于“囚禁行为”和战犯心理崩溃的报告；以及关于药物的相对有效性、电击、暴力和其他审讯囚犯时使用的强制性技术的系列研究。^③ 人类生态学基

① Wilbur Schramm (ed.)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4), p. 469 (for Glock). 亦可参见 Bruce Lannes Smith, Ralph White, and W. Philips Davi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其中数篇文章首次发表时都刊登在洛文塔尔的特刊中。

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Libraries, Historical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epartment, Guide to the Archives of the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 d.).

③ “Account list cards, BSSR Archives, series I, box 13;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obert Bower),” *Kazakhstan and the Kazakhs: Target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 “working paper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ffice, December 1954,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5, project 649; Lawrence Krader and Ivor Wayne,” *The Kazakhs: A Background Study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

囚犯审讯相关的内容，参见 Albert Biderman, Barbara Heller, and Paula Epstein, (转下页注)

金(the Human Ecology Fund)资助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非洲研究和囚犯审讯研究,事后这笔资助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渠道。^① 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时与美国新闻署签订了合作协议,协助培训南越政府收集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可靠数据,培训美国新闻署工作人员的大众传播研究技术,收集美国新闻署海外听众的情报,并在各种数据分析的执行方面发挥了功能。^② 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费预算有50%,甚至可能有85%来自上述合约提供的资助。^③

从1951年开始,美国新闻署聘请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实施另一项高优先级的项目,在海外宣传节目中加入传播动力学的先进理念。现存的档案记录显示,社会科学研究所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项目做出了贡献:引入现代的受众调查方法;^④引入“意见领袖”的概念,并在宣传战和心理战中对“精英”与“大众”作出了区分;^⑤引入“国内传播系统”的概念(和拉扎斯菲尔德与格洛克所使用的措辞一样)^⑥作为美国

(接上页注)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Captivity Behavior, BSSR Research report 339-1, February 1961,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AF 49(638)727,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14, project 339;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ouis Gottschalk, MD). "The Use of Drugs in Information-Seeking Interviews," December 1958,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11, project 32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① Account list cards, BSSR Archives, series I, box 13; and Albert Biderman, "Social-Psychological Needs and 'Involuntary' Behavior as Illustrated by Compliance in Interrogation," 23, no. 2 Sociometry (June 1960): 120. 有关中央情报局在人类生态学基金中的角色,参见 John Marks,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CIA and Mind Control*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p. 147-63.

② Account list cards, BSSR Archives, series I, box 13; Stanley Bigman, *Are We Hitting the Target?: A Manual of Evaluation Research Methods for USIE*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ial Use Only], 1951), USSR Archives, series n, box 3, project no. 627; "Public Opinion in the Philippines,"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3; "International Seminar to Be Held in Saigon," *Times of Vietnam*, December 13, 1958, p. 2, BSSR Archives, series I, box 13. The BSSR Archives is held b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③ 作者的估计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账户列表卡为基础。

④ BSSR, *Are We Hitting the Target?* BSSR, "Public Opinion in the Philippines."

⑤ BSSR, *Are We Hitting the Target?* pp. 13-20.

⑥ Glock,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and Opinion Formation," pp. 512-23. 比格曼与拉扎斯菲尔德、格洛克共同负责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关国内传播体系的研究计划,但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的文章只出现了他的一个署名。拉扎斯菲尔德在同期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议题相似的论文。

政府宣传渗透的目标。^①

社会科学研究所为美国新闻署所做的课题研究证明,人们所熟知的“个人影响”、“两级传播”的传播动力学早在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的《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 1955)一书出版的四年以前,就已成为美国新闻署传播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悖。^②早在1951年,拉扎斯菲尔德应用社会研究所的斯坦利·比格曼(Stanley Bigman)就为美国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换计划(the U. S.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美国新闻署的前身)制定了一份有关社会调查的秘密指南,名为《我们是否正中目标》^③(以下简称“目标”。当时应用社会研究所正在“美国之音”的资助下在中东进行一个大型项目,对传播行为中的“个人影响”模式的诸多方面进行测试)。^④在完成这份指南后不久,比格曼就转入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那里继续这一“目标”研究项目,并于1953年承接了一个后续项目,研究菲律宾的公共舆论和传播行为。^⑤比格曼在上述“目标”指南中强调了当时传播研究中的诸多前沿概念,对于如何使用社会调查方法追踪“个人影响”网络对大众态度的冲击、如何找到一位合适的当地“意见领袖”影响具体的目标个体、如何设计复杂的调查问卷、如何弥补受访者偏见的方法以及类似的前沿技术做出介绍和描述,这些大都超越了当时多数的意见研究技术。比格曼的研究项目的内容包括:培训美国新闻署如何利用菲律宾本土的受访者找到当地的意见领袖,获得有关受访者了解美国的信息来源的详尽数据,编纂有关当地对民主、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美—菲关系等问题的态度的统计数据,确认美国新闻署对菲律宾宣传活动的有效性的反馈。

① Account list cards, BSSR Archives, series I, box 13; BSSR (Stanley Bigman),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② Elihu Katz and Paul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③ BSSR, *Are We Hitting the Target?*

④ Daniel Lerner with Lucille Pevs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p. 79; Bruce Lannes Smith, “Trends in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Opinion, 1945—1955,” 20, no. 1 (Spring 1956): 182—95.

⑤ BSSR (Stanley Bigman),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Questionnaire for Opinion Leaders—Form B,”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比格曼 1951 年制定的这一指南充分说明,“个人影响”概念的演进过程远比我们通常所了解到的更加错综复杂,也更为依赖政府方面的资助。在解释“个人影响”概念的演进时,人们通常先将此概念的诞生溯源自 1945—1948 年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麦克菲等人针对纽约州的投票研究,然后极为唐突地跳跃到 1954 年这一投票研究结果的发表^①以及 1955 年《个人影响》一书的出版^②。然而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及其在菲律宾、中东进行的宣传谍报工作,解释了从“个人影响”概念的萌发到相关成果的出版之间的 6 年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社会科学研究所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菲律宾项目也充分证明,传播行为与传播研究表面上倡导多元的、民主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用于美国资助的反叛乱运动也能够用于管理代理美国政府的威权政体。保罗·M·莱茵巴格(Paul Linebarger)是美国对东南亚心理战的首席专家,曾吹嘘道,中央情报局“发明”了菲律宾总统拉蒙·马格赛赛(Raymon Magsaysay)并把他安插进办公室。^③ 据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评论家威廉·布莱姆(William Blum)称,进到那里之后,“中央情报局撰写了(麦格塞塞的)发言,对其外交政策给予细致的引导,并利用媒体资产(受雇的编辑和记者)给予他日复一日的喝彩与支持”。^④

根据曾在该运动中有积极表现的特工约瑟夫·B·史密斯(Joseph

① Bernard Berelson, Paul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② Katz and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③ Joseph Burkholder Smith, *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 (New York: Ballantine, 1976), p. 84.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史密斯就是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机构的一名官员,对菲律宾的政治与心理战负责。有关菲律宾的反叛乱军事行动,亦可参见 Michael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New York: Pantheon, 1992), pp. 85—120 passim; D. Michael Shafer, *Deadly Paradigms: The Failure of U. 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Walden Bello, “Counterinsurgency’s Proving Ground: Low Intensity Warfare in the Philippines,” in Michael Klare and Peter Kornbluh (eds.), *Low Intensity Warfare* (New York: Pantheon, 1988) 158—82.

④ William Blum, *The CIA: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Zed, 1986), pp. 40—43.

B. Smith)回忆,中央情报局当时的想法是将菲律宾变成亚洲的“民主样板”。^①但实际上,马格赛赛在美国资助下进行的针对胡克游击队的反暴动战争最终变成了爱德华·兰德斯戴尔(Edward Lansdale)发展一系列心理战技术的血腥试验场,特别是美国新闻署挖掘菲律宾文化和当地迷信行为的试验场。诸如“扫荡性巡逻”(search-and-destroy)和(为消除某区域内的恐怖分子或游击队活动而采取的措施)“扫荡性绥靖”(pacification)等是在美国侵略越南失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战术(与修辞),其实最早是在兰斯代尔监管菲律宾期间苦心钻研出来的。^②

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两者在菲律宾的关系最好被理解为是劳动分工的不同。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机构,而且美国新闻署坚称自己并未给中央情报局的海外办事处提供掩护。^③但根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美国新闻署收集的情报(如通过比格曼对菲律宾人“意见领袖”的调查收集的情报)经常提供给中央情报局。^④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工作协调,起先是由杜鲁门心理战略委员会区域专家监管的“国家计划”负责,后来则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⑤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菲律宾项目进入高速运转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的联合军事国家计划的政策监督交由具有总统直接访问权的高级助手负责,起先是C·D·杰克逊,后来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两人相继亲自监控运动的开展并制定相应的战略。^⑥

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政府开展的研究暗含的主张是,“科学的”心理战和反暴力技术的实际应用,有助于把菲律宾变成一个比以往更民主

① 关于保罗·莱茵巴格与菲律宾运动,参见 Smith, *Portrait*, pp. 74—104.

② Blum, *The CIA*, pp. 40—43.

③ Sorenson, *The Word War*, p. 65.

④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he U. S. Ideological Effor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grams 88th Comp.*,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64), pp. 62—63.

⑤ 有关农村计划,参见 *ibid.*, pp. 62—63; 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情报局的协调,参见 NSC 10/2;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 June 15, 1948, and NSC 54121 2: Covert Operations, March 12, 1955, both in 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olicy Papers File, RG 273,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Sorenson, *The Word War*, p. 28;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New York: Morrow, 1986), pp. 84—87, 109.

⑥ Sorenson, *The Word War*, p. 46.

并远离暴力的国家。这里的“以往”指的是1889—1902年的残暴屠杀,当时一支美国远征军镇压了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组织的反抗。

但回溯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上述主张得以兑现。社会学研究所和美国新闻署在菲律宾的研究开展40余年以来,胡克运动(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击败;一个相对稳定、亲西方的政府得以建立起来;一小部分菲律宾人富裕起来。但是从其他各项指标来看,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营养水平、土地所有关系、教育水平、性病率,甚至出版权和选举权等等,对于广大的菲律宾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在这40年间基本没有任何改善,甚至变得更加恶劣。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者们并没有在菲律宾安置美国的政策。但他们向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提供了有关菲律宾人口的社会结构、心理及精神状态的详尽知识,构成了现代反游击战术的基础。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暗含了他们的主张,但美国在菲律宾及发展中世界开展的心理战活动,实际上并未降低,反而提高了当地的暴力和穷困水平。

军方对“扩散”研究的资助

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的心理战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中央情报局的心理战项目大都是秘密的,而美国军方开展的项目则介于两者之间。1950年代最有名气和最有影响力的传播研究项目中,不少都是在美国军事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的,只不过后者很少公开承认。

里维尔项目(Project Revere)是其中一个生动鲜活的例子。^① 该项目

^① [译注]《大众传播研究效果的里程碑》(第三版)对里维尔项目展开的历史背景亦有所描述,读者不妨对比相关内容。《大众传播研究效果的里程碑》将该研究置于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强调“对于其中的一些内幕,当初甚至连研究者和笔者本人都浑然不知。一组社会学家,带着一大笔他们以为是来自美国空军获得的资金,研究了空投传单的使用。当时这些研究者并不知道在背后支持这项研究的并不是空军,几年后才有证据表明这一研究的真正目的也不是用于军事方面。现在一切都水落石出了,里维尔计划显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是一项名为“极端心理控制项目”的庞大的社会心理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是美国空军资助的一项关于信息扩散的、高成本的系列研究,由斯图亚特·多德(Stuart Dodd)和梅尔文·德福勒(Melvin DeFleur)等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执行。^①洛厄里(Shearon A. Lowery)和德弗勒在回顾传播研究历史的教科书^②中,将此研究视为该新兴领域里几个主要的“里程碑”之一。^③简单来说,里维尔项目的科学家通过美国空军的飞机,向(华盛顿州、爱达荷、蒙大拿、犹他州和阿拉巴马州)几个选定城镇空投了上百万包含国防宣传或商业广告的传单。然后他们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对当地居民接触到的样本信息的扩散情况进行详细记录。空军对此项目的赞助当时被视为机密,多德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的早期项目报告对此也未作承认。^④相比之下,多德、德福勒和其他研究者早些时候的描述则更坦诚一些。^⑤洛厄里和德福勒后来指出,空军为此项研究投入了大约30多万美元(按20世纪50年代的价值计算),^⑥这是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传播研究最大的一笔投资。

里维尔项目体现了心理战研究时期固有的复杂困境与妥协。对多德和他的同事而言,这笔钱对“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研究”意味着“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机遇”。^⑦但局限是研究不得不聚焦于空投传单,并将之作为一种传播手段。空投传单对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宣传、对中央情报局在东欧的宣传以及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核作战策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

① [译注]里维尔项目(Project Revere)是以斯图尔特·C·多德(Stuart C. Dodd)为首的一批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承担的调查任务。该项目以一个著名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名字命名,为期3年(1951—1953),目的在于调查空投传单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相关问题,例如传单上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口头传播间接的传到其他人那里。

② [译注]参见《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章《里维尔项目:作为最后一种诉求媒介的传单》。

③ Shearon Lowery and Melvin De 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Longman, 1983), pp. 205—31.

④ Stuart Dodd,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from Person to Person,” 16, no. 2 (Summer 1952): 247—62. 杜布在此没有明确提及研究的资助者。与此相反,他假设性地指出:“假设我们的空军希望向敌人、中立者(无论是民众还是军人)或我们自己人投放传单”(see p. 247).

⑤ Stuart Dodd, “Formulas for Spreading Opinions,” 22, no. 4 (Winter 1958): 537, 此处杜布强调美国空军编号为“AF 13(038)—27522”的合作协议资助了此项研究。亦可参见 Lowery and De Fleur, *Milestones*, pp. 207—8.

⑥ Lowery and De Fleur, *Milestones*, p. 208.

⑦ Ibid.

媒介,但它没有任何必要的“民用”价值。^①

多德和他的团队主张,传单可以被视为一种试验刺激物,通过它了解传播的各种属性。研究成果不仅仅局限于传单本身,也适用于通常意义上各种媒介。他们开发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描述这一新刺激物的冲击力、速度以及对该刺激的削平(leveling)现象。他们对传单与人口之间的最佳投放比率、重复投放传单对受众回忆信息的效果、投放时间与投放效果的变化等资助者最感兴趣的数据给予了重点研究。德福勒称,从该项目推导出的具有普适性的重要经验或许是,任何讯息在个体之间的扩散(即“两级”社会网络中的第二级)都会失真,即使最简单的讯息也是如此。^②

该项目催生了数十篇刊载于学术期刊和书籍中的文章与论文。德福勒、奥托·拉尔森(Otto Larsen)、奥尔加·奥恩(Orjar Oyen)、约翰·G·肖(John G. Shaw)、理查德·希尔(Richard Hill)和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等人以里维尔项目的数据作为论文的基础。^③ 1958年,《公共舆论季刊》刊登了多德制作的一份称作“里维尔相关论文”的参考资料列表(见附录)。大略浏览这份列表中的标题和期刊,便可清楚了解接受政府秘密合约的研究成果进入主流大众传播研究的方式及其渗透程度。

多德的这个项目既是一项关于宣传的研究,项目本身也是一次宣传活动。如图2所示的这条样本信息,在“轰炸机差距”论的鼎盛时期很明显刺激了公众对苏联轰炸机实施核袭击的恐惧。事实上,多德研究中的不少目标社区



图2

① 有关美国空军关注的问题,参见 *ibid.*, pp. 207—8;有关中央情报局关注的问题,参见 Sig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p. 56; on air-dropped leaflets' role in strategic war plans: author's interview with Fletcher Prouty, April 12, 1984.

② Lowery and De Fleur, *Milestones*, pp. 205—31, with summary of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t pp. 229—31; see also Dodd, "Formulas for Spreading Opinions," pp. 537—54.

③ Dodd, "Formulas for Spreading Opinions," pp. 551—54.

在那时远离美国的商业航线，遑论苏联的轰炸机了。美国空军制造所谓的“轰炸机差距”论，是为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战略核政策的讨论中巩固自己的地位，现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已对此点达成共识。^①

迄今为止，多德团队中的学者没有人对该研究成果的实际或潜在应用表示反对。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情报局于1956年突然取消了原定在欧洲空投传单的计划，原因是一架捷克民用客机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在捷克上空发放传单的飞行气球的影响而发生坠机。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对此次坠机事件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不会在正式文件中表明要对不存在的传单宣传项目负责。^②

中央情报局和传播研究的创建者们

从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心理战研究中，可以找到更加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些项目在1950年代中期及晚期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笼罩于中央情报局周身的秘密操作使我们难以获得完整的档案，但从现有的一些零碎信息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阿尔伯特·哈德利·坎特里尔（人们常称其为哈德利·坎特里尔），他是现代大众传播研究一位知名“创建者”。坎特里尔于1937—1939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项目的副主任，他创建了普林斯顿大学舆论研究室并长期担任主任，同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收听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之一，该中心后来被整合进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对外广播信息服务中。坎特里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被广泛评价为“社会科学界第一次认真从事调查研究，并首次尝试系统地收集和整理调查结果”。^③坎特里尔与高尔顿·奥尔波特合著的《广播心理学》通常被誉为大众传播理论与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民意

^① 有关“轰炸机差距”相关的问题，参见 John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U. S.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Russian Military Strength* (New York: Dial, 1982), pp. 38—50。

^② Mi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p. 56.

^③ 此段落中坎特里尔的相关信息出自“Cantril, [Albert] Hadley,” *National 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55, pp. 211—12。

研究,主导了一个国际舆论研究这一分支学科长达 20 年之久。

坎特里尔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致力于研究李普曼的“刻板印象”——即李普曼所谓“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并指出人们借此处理远离他们直接经验的外部世界。坎特里尔在国际调查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期望能确定在一个给定人群中,阶级、民族主义、种族等因素如何影响刻板印象的呈现,这些刻板印象又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国民行为、特别是针对美国的行为。^①坎特里尔的研究通常是揭露不满群体的“表现”,其基本假设是:美国海外的目标与行动在总体上有益于世界。如果外国的受众不是这么看待美国行为,问题一定出在他们误解了我们的良好意图,而非他们的行为有根本性的错误。

坎特里尔的职业生涯与美国的情报机构及秘密心理战有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至少保持到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比如,普林斯顿大学舆论研究室与罗斯福政府签订了秘密合同,在二战前夕协助进行美国的舆情研究。坎特里尔担任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由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的针对拉丁美洲的情报机构)和二战战时新闻局的高级舆论专家,后来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外交政策制定的心理层面考量提供咨询。坎特里尔还曾协助肯尼迪政府重建了美国情报机构。^②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央情报局 1956 年为坎特里尔及其同事劳埃德·弗利(Lloyd Free)提供了 100 万美金,用于收集有关中央情报局感兴趣国家的基本态度的情报。^③洛克菲勒基金会貌似协助坎特里尔将这笔钱洗白,因为坎特里尔在书中不断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这笔资金

① 从如下例子可见,William Buchanan and Hadley Cantril, *How Nations See Each Other*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2), pp. 91—101; or Hadley Cantril, *The Politics of Despai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② Cantril, [Albert] Hadley. See also collec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correspondence with Cantril, including Cantril's oblique reference to what appears to be clandestine CIA sponsorship and editing of his pamphlet *The Goal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Hopes of Humanity* (1951; published by Institute for Associated Research, Hanover, NH) in Cantril note of October 22, 1951; in Hadley Cantril correspondenc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③ John M. Crewdson and Joseph Treaster, "Worldwide Propaganda Network Built by the CI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1977.

的提供者。^① 但《纽约时报》和劳埃德·弗利在坎特里尔过世后都承认中央情报局是资金的真正提供者。^②

坎特里尔将法国和意大利的“抗议”选民的政治潜力作为第一个研究对象,这些人被认为敌视美国的外交政策。^③ 接着,坎特里尔在私人的、学术的伪装下于1958年前往苏联,目的是收集苏联人的社会心理以及苏联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情报。坎特里尔的专题报告直接呈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的主要观点是:强硬但带有少许尊重地对待苏联,而非公开的嘲讽,这样做将有助于增进东西方关系——正如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做的一般。^④ 后来坎特里尔的任务还包括研究卡斯特罗在古巴的支持者,以及对一系列国家(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印度、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等)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作为中央情报局此时期干预措施的检查清单。^⑤

坎特里尔在中央情报局合约下开展的工作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查美国本土民众对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问题的观点——许多观察家会指出政府基金的这一用途是违法的。^⑥ 因此,坎特里尔引入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创新,通过受访者的社会学特征及其在美国意识形态连续谱(由坎特里尔设计)的位置中确定其政治观点。作为这一政治观点分析技术的先驱,他彻底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选举活动。^⑦

① Hadley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31—32, 145.

② Crewdson and Treaster, “Worldwide Propaganda Network.”

③ Hadley Cantril and David Rodnick, *Understanding the French Left* (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1956).

④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pp. 134—43.

⑤ Cantril, *The Politics of Despair*;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pp. 1—5, 144.

⑥ Lloyd Free and Hadley Cantril,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America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有关合法性的问题,应注意中央情报局宪章中有一句话,禁止该机构(具有)“警察、传票、执法权力或内部安全功能,”大多数观察家由此认为,中央情报局无权在美国国内收集美国公民的情报。有关此点,参见 Thomas Power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9), pp. 315—17, 367—70, 其中有关于中央情报局运转混乱的内容。

⑦ 一相类似但晚近的技术,亦可为此提供例证,见 F “Redefining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 1987, p. A12, with data provided by the Times Mirror-Gallup Organization.

第二个或许也更为重要的例子,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IS)。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该机构的主要资助者,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曾公开提供过关于双方关系的详情。但据广泛报道,中央情报局资助了国际研究中心的创建,为该中心的许多重要研究(包括机密的和公开的版本)提供资金;国际研究中心也是中央情报局向其他机构(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提供基金的渠道;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麦克斯·密立根(Max Millikan)在此就职前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另外,根据国会记录的内容,在担任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密立根是“核心情报机构的顾问”。^① 1966年,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伊锡尔·德·索拉·普尔承认,该中心过去与中央情报局有合作关系,但他坚持宣称,中央情报局因为随后的丑闻,于1960年同国际研究中心断绝了关系。^②

国际研究中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最重要传播研究中心,并在5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根据国际研究中心的官方陈述,该中心的传播研究在由汉斯·斯皮尔(主席)、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华莱士·卡洛儿(Wallace Carroll)、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爱德华·希尔斯、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秘书)组成的一个任命规划委员会的介绍下,曾获得来自福特基金会的一笔为期4年、总计85万美金的资助。^③ 无法知晓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是否实际上来自中央情报局。但福特基金会的档案清楚表明,当时基金会正在为中央情报局一项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重要宣传项目(文化自由委员会)买单,并在中央

① 关于中央情报局对国际研究中心的资助,见 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Dell, 1974), p. 181; and David Wise and Thomas Ross,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4), p. 244. 有关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研究,见 Marchetti and Marks, *The CIA*, p. 181. 关于据称由中央情报局承保的一项大型研究的例子,见 W. W. Rostow and Alfred Levin, *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52). 关于国际研究中心作为中央情报局资助通道的相关内容,参见 Wise and Ross,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p. 244. 关于密立根的角色,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Country Team Seminar, June 11, 1962).

②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for Governments,” *Background* 10, no. 2 (August 1966): 114—15.

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Plan fo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World Politics*, 6, no. 3 (April 1954): 358—77; MIT, CE-NI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Description* (Cambridge: MIT, July 1955).

情报局的要求下提供了 50 万美元的捐赠，基金会主席约翰·麦克米兰（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心理战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为了给中央情报局的项目提供掩护，与其建立起了常规性的联络。^① 在国际研究中心传播研究规划委员会成员中，爱德华·希尔斯同时一直是文化自由委员会项目的主要新闻发言人，该委员会有中央情报局的背景，汉斯·斯皮尔是兰德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管，华莱士·卡洛儿是一位国家安全问题的新闻记者，他曾为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创作了一系列有关对苏秘密战的机密报告。^② 简言之，国际研究中心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或明或暗地与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战略捆绑在一起。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段，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出产了大量与心理战相关的论文，并刊登在当时权威的学术杂志上。该中心此时期在心理战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从《公共舆论季刊》1956 年春和 1958 年秋的两期特刊中展示出来。1956 年春的特刊由伊锡尔·德·索拉·普尔与弗兰克·博尼拉(Frank Bonilla)编辑，1958 年秋的特刊由丹尼尔·勒纳编辑，主题分别是“政治传播研究”和“现代化地区的态度调查”。^③

特刊的内容主要由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该中心规划委员会的成员

① Don Price Oral History, pp. 61—70, and Don Price memo, May 21, 1954 (appendix to oral history), Ford Foundation Archives, New York. 有关福特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的档案证据，最早是由凯·伯德揭露的。

② 有关希尔斯，参见 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pp. 98—209 passim. 有关斯皮尔，参见 Hans Spei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Reconsidered,” RAND paper no. 196, February 5, 1951; Hans Spei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lite and Mass,” *World Politics* (April 1952 [RAND paper no. P-270]), Hans Speier and W. Phillips Davison,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Foreign Policy,” RAND paper no. P-615, December 15, 1954. 斯皮尔近期被曝光的他当时承担的工作还包括：研究苏联对西德重新武装的反应、研究苏联对于核威胁的政治战术、撰写关于美国士兵系列研究的报告，以及对博弈论的政治应用做出评价。斯皮尔于 1990 年 2 月 17 日在佛罗里达的索拉塔娜去世。参见 “Hans Speier, Sociologi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2, 1990. 有关卡罗尔，参见 Wallace Carroll, *The Army's Role in Curre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p secret, declassified following author's mandatory review request), February 24, 1949, box 10, tab 61, entry 154, RG 319, U. 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Wallace Carroll, “It Takes a Russian to Beat a Russian,” *Life*, December 19, 1949, pp. 80—86; “CIA Trained Tibetans in Colorado, New Book Says,”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73.

③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Frank Bonilla (eds.), “A Special Issue on Studie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no. 1 (Spring 1956); Daniel Lerner (ed.), “Special Issue: Attitude Research in Modernizing Areas,” 22, no. 3 (Fall 1958).

(如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Isaacs]、Y·B·达摩[Y. B. Damle]、克莱尔·齐默尔曼[Clair Zimmerman]、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苏珊·凯勒[Suzanne Keller]^①)以及特刊编辑^②提供。他们也刊登了一些国际研究中心外包给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比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艾弗·韦恩(Ivor Wayne)对美国 and 苏联的宣传出版所做的内容分析,以及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帕特里夏·肯德尔(Patricia Kendall)根据“美国之音”项目在中东收集的数据对埃及精英人群进行民族主义的研究。^③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或经济发展被认为对美国构成了所谓的危险,便成为国际研究中心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的问题的地理区域,与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存在问题的区域,几乎完全一致:印度尼西亚的“煽动分子”、智利的激进学生、波多黎各的“变化倾向”人物,以及中东经济发展的社会冲击。^④

① In 20, no. 1(Spring 1956); Harold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p. 197; Y. B. Damle,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Ideas and Knowledge in [East] Indian Villages,” p. 257; Claire Zimmerman and Raymond Bauer, “The Effect of an Audience upon What Is Remembered,” p. 238; Suzanne Keller, “Diplomacy and Communication,” p. 176; and Harold Isaacs, “World Affairs and U. S. Race Relations: A Note on Little Rock,” 22, no. 3(Fall 1958); 364.

② Ithiel de Sola Pool, Suzanne Keller, and Raymond Bau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Travel on Political Attitudes of U. S. Businessmen,” p. 161; Frank Bonilla, “When Is Petition ‘Pressure’?” p. 39; Daniel Lerner, “French Business Leaders Look at EDC,” p. 212—all in 20, no. 1(Spring 1956); and Daniel Lerner, “Editors Introduction,” p. 217;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Kali Prasad, “Indian Student Images of Foreign People,” p. 292; Frank Bonilla, “Elit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Areas of High Social Stratification,” p. 349; all in 22, no. 3(Fall 1958).

③ Ivor Wayne, “American and Soviet Themes and Valu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mes in Popular Picture Magazines,” p. 314; Patricia Kendall, “The Ambivalent Character of Nationalism among Egyptian Professionals,” p. 277—all in 20, no. 1(Spring 1956).

④ Guy Pauker, “Indonesian Images of Their National Self,” p. 305; Lucian Pye, “Administrators, Agitators and Brokers,” p. 342; Alain Girard, “The First Opinion Research in Uruguay and Chile,” p. 251; Kurt Back, “The Change-Prone Person in Puerto Rico,” p. 330; Robert Carlson, “To Talk with Kings,” p. 224; Herbert Hyman et al., “The Values of Turkish College Youth,” p. 275; Raymond Gastil, “Middle Class Impediments to Iranian Modernization,” p. 325; Gordon Hirabayashi and M. Fathalla El Khatib,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n the Villages of Egypt,” p. 357; A. J. Meyer,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p. 391; Richard Robinson, “Turkey’s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Urbanization,” p. 397; Lincoln Armstrong and Rashid Bashshur, “Ecological Pattern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in Lebanon,” p. 406—all in 22, no. 3(Fall 1958).

国际研究中心对阿肯色州小石城废止种族制度也进行了研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例子。^①

在上述研究的报告中,国际研究中心的作者基本上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视为美国的一个管理难题。丹尼尔·勒纳主张“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和传播”是现代化类型学的基本元素,这种现代化可以被测量和形塑,以确保产生美国政府希望的结果。“这些匆匆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如何保持稳定?”勒纳问道,“一个自由参与的社会依赖于负责任地形成和表达意见。那么这种表达的欲望将来自何处?”^②

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及其他文章中,勒纳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里,通过舆论传播的公共参与(掌权期间)发生在真正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之前”^③——这明显体现了李普曼的早期观点。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大众人群,他们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相关的信息,但却在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上被剥夺了权利,从而相当容易被激进民族主义者、共产党和其他“极端分子”提出的具有感染力的要求所影响。根据李普曼的分析,无论是制造此类危机形势,还是精英人群对此类危机的管理,大众传媒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勒纳也发现了这一点。勒纳提议,可以尝试在菲律宾展开的大部分运动中建立起一种策略模型:将“白色”宣传与“黑色”宣传、经济发展援助以及由美国训练与资助的反叛乱行动有机结合起来,从发达国家的角度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这些问题。

这一“发展理论”融合了宣传、反叛乱军事行动和目标地区的选择性经济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末很快被整合进美国的心理战的全球实践当中。一些机密项目在柬埔寨和老挝的山区逐渐开展,这些项目雇佣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而他们则接到了所谓“国家建设”和反叛乱的训练。^④从勒纳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类似的项目,比如在美国特种部队保护伞的蔽护下,通过宣传活动、建造“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s)

① Isaacs, "World Affairs and U. S. Race Relations," p. 364.

② Lerner, "Editor's Introduction," pp. 218, 219, 221.

③ Lerner and Pevs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 396. Emphasis added.

④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59—63, 69—77; Blum, *The CIA*, pp. 133—62.

和一些受控的社会发展活动,从而赢得越南农民的人心。施拉姆、白鲁恂、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等学者对此进行了适时的阐释。^①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勒纳成为由五角大楼资助的对第三世界心理战会议的固定成员,勒纳的主要工作是为“美国资助的海外低强度战争”的战略设计讲授社会科学数据的有用性。^②

特别行动研究办公室1962年的卷宗“美国陆军的有限战争使命与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围绕“卡米洛特项目”(Project Camelot)^③广为人知的争议表明,当时残酷的美国反叛乱军事行动产生于更早时期的心理战项目,其策略中的重要内容则成形于新兴的发展理论学派。^④ 此外,发展理论的重要承诺——美国为控制第三世界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如果处理巧妙的话,不仅有助于实现干预的目标,而且同时能够推进美国的利益——频繁受到美国新闻署、军方媒体、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宣传手册的广泛报道。经过政府的实地检验,勒纳、普尔等人倡议的策略及其提供的合理

① 有关传播理论界对反叛乱军事行动做出的贡献,参见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159—69 (Pye) and 199ff (Pool)。亦可参见 Ithiel de Sola Pool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oject], 1963), pp. 1—25 (Pool), 46—74 (Schramm), 148—66 (Pye)。

②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282ff; see also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p. xvii, 47—53。

③ 卡米洛特事件促进了有关现代社会科学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及其在世界政治舞台造成的结果之间的碰撞的公开讨论。1964年起,美国军方雇佣了一批私人美国社会科学家,在这些被认为可能法宝猛烈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针对社会结构、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对抗、通信基础设施等类似基本数据的长期调查,这种调查贯穿于20世纪60年代。智利和其他目标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力量对该项目提出抗议,指出卡米洛特事实上是一项间谍行动。卡米洛特的签约者,美利坚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对此做出回应,认为上述批评是“可笑的”,因为卡米洛特是一项“经过设计的科学研究项目”,被选为研究对象的国家之间“没有区别”。由此争论逐渐升级。参见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No. 4, 89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65); Jesse Bernard, “Conflict as Research and Research as Conflict,”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ject Camelot*, rev.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p. 129n。

④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282ff; see also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p. xvii, 47—53。

性，成为政府应对那些反对美国海外干预的宣传主题。^①

提到国际研究中心，不能忽略的一个关键点是，一大帮知名的大众传播学者与美国军方、情报机构之间保持了连续的、具有小集团属性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为冷战早期的心理战摇旗呐喊的那帮理论学家，和1960年代在越南战争时期为此行为背书的理论学家是同一拨人。丹尼尔·勒纳、哈罗德·拉斯韦尔、威尔伯·施拉姆、约翰·W·赖利、W·菲利普·戴维森、伦纳德·科特雷尔、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等知名学者沿着这一路经前赴后继。^②

这种知名理论学者之间的传承和延续，构成了一种更广泛的模式，使“心理战”在一代人之后摇身变成了“国际传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科学“专业主义”。杰西·迪利亚(Jesse Delia)在对此领域的历史研究中很好地抓住了这种转向。迪利亚指出，主流大众传播学者们：

共同致力于从实践和政策方面科学地理解大众传播，(而这一目标却)被那些社会科学家们业已形成的专业主义转换为，在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内为那些已被界定的问题与标准寻求答案。在许多领域中，根据专业主义所接受的标准，理论问题被界定为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明显价值的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一态度已成为绝大多数传播研究者坚决拥护的核心共识。^③

① 例如，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促进美国在越政策公开项目》(NSAM No. 308: “A Program to Promote Publicly U. S. Policies in Vietnam”, June 22, 1964); 麦克乔治·邦迪的《在越军事行动》(NSAM No. 328: “Military Actions in Vietnam” April 6, 1965); 《建立东南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工作小组》(NSAM No. 329: “Establishment of a Task Force on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pril 9, 1965); 以及《在越扩大化心理战》(“NSAM No. 330: Expande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in Vietnam”, April 9, 1965)等，都从美国总审计长办公室通过了《信息自由法》的授权。

② 有关勒纳、赖利、戴维森、科特里尔和浦尔，参见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xvi, 151—59, 199—202, 282—86. On Pool, Davison, and Schramm, see Poo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 1—74. On Lasswell, see Harold Lasswell,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Studies in Coercive Ideological Movemen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③ Jesse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harles Berger and Steven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p. 59.

迪利亚认为,换句话说,大众传播研究变得更为“科学”了,更多地强调理论,并对应用研究任何一个给定方面的“价值”(或社会影响)采取客观态度。

但迪利亚的观察应该更进一步、直击要害,更精确地反映现实。迪利亚应该注意到,事实上,如拉斯韦尔、勒纳、施拉姆、普尔、戴维森这些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从来没有放弃“大众传播实用的、政治的那个方面”(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抛弃为政府心理战和商业客户类似的应用研究项目服务)。只不过,他们汲取了心理战项目的价值观以及其他的政治态度,将之注入新的、更科学化的理论陈述中,在新的“客观”研究的措辞外衣下,消除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研究项目中的伦理和政治假定。

大众传播研究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还引发了一系列有意思的措辞转向,弱化了主流大众传播研究与 1945 至 1955 年间资助者影响下的传播研究之间日益明显的差异。其中出现的一个新措辞,就是自认为的“中立”和“科学”。但是,关于传播是什么、传播有何作用这些核心概念却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从处于这些变化风口浪尖的一些项目中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新瓶装旧酒的过程中,把传播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这一核心概念得到了传承。

以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例,齐特拉·M·史密斯(Chitra M. Smith)于 1951 至 1954 年为兰德公司准备了一系列参考书目指南,并称为“国际传播与心理战”系列丛书。^①这无疑是一种“老”式的措辞表述。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齐特拉·史密斯这套参考书目指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来理解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流行的“心理战”概念。

但是到了 1956 年,这种措辞方法发生了转向。这一年,兰德公司将史密斯列出的书目编撰出版,并做出了两处重要修改,一是将丛书名改为

^① BSSR, Chitra Smith,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7, project 819,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国际传播与政治观点”，二是把编者扩展为两位——布鲁斯·拉纳·史密斯(Bruce Lannes Smith)和齐特拉·M·史密斯。^① 早先用以统合丛书(事实上,作为该套丛书的存在前提)的心理战概念彻底不见踪影,但丛书的内容却是换汤不换药。

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也出现过类似的事件。1954年,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在协助美国空军进行一项心理战研究,名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战略心理学、社会学优势及漏洞”。^② 该研究主要关注苏联的国内传播体系,包括技术、文化和政治属性,这是英克尔斯擅长的领域。1956年,作者在删除了十几页有关核战争时期的心理战行动之后,将剩余的400多页文本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并取了一个新标题《苏联体系是如何运转的》(*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③ 这本书遂成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关苏联研究的标准研究生读本。克拉克洪、英克尔斯和鲍尔的研究,由此从最初的一本相对“幼稚”的、探索敌国传播体系的入门手册,转而成为一份彻底地、看似更加“客观”与“科学”地描述苏联实际“运作”的宣言。

这些例子体现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流大众传播研究发生的变化和其在本质上的连续。伦纳德·杜伯(Leonard Doob)是《公共舆论与宣传》(*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1948)一书的作者,同时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美国国际宣传项目的积极活动者。他在接受斯普劳尔(J. M. Sproule)的访谈时,对这种措辞转向作出了较好的解释:

杜伯指出,在社会科学的词汇表中,随着传播(communication)、说服(persuasion)和舆论(public opinion)这些更客观(作者按:所谓

① Bruce Lannes Smith and Chitra Sm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Opi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② Clyde Kluckhohn, Alex Inkeles, and Raymo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the Soviet System* (Cambridge, MA: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54).

③ Raymond Bauer, Alex Inkeles, and Clyde Kluckhohn, *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 (1956; rpt. New York: Vintage, 1961).

客观)的概念取代了“宣传”(propaganda),这个术语开始失宠。确实,杜伯表示在其1961年对非洲传播的研究中,从未想过把“宣传”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术语使用。^①

事实上,与其早期研究相比,杜伯1961年的研究无论是在涉及“宣传”的内容方面还是在对“宣传”这一术语的使用方面,都没有减少太多。改变的只是“宣传”这一术语的表述框架,而这个框架传达给读者的核心概念一直是作为统治的传播(communication-as-domination)。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心理战研究中的社会情境被剥离出来,仅剩的核心概念在单纯的“传播”研究中被不断保留,这一趋势不断强化。直到那时,早期一些声称能够发现传播行为的“秘诀”的主张,都没有得到成功的证明。许多大众传播专家开始认为,“心理战”这一术语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会在目标受众中激起敌对感。里奥·博加特(Leo Bogart)在为美国情报局撰写的报告中指出,“在公开出版物中”讨论心理战,“就好比面对一个你正在勾引的女孩,大谈特谈勾引对方上钩的魅力技巧,并且如何让这种勾引看起来像是求爱”。^② 约翰·马丁(L. John Martin)进一步指出,在和平年代公开承认心理战活动,实际上就是为这些行为违反联合国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提供了证据。^③

早在美国舆论研究会1954年大会召开前,与“美国之音”和一些匿名政府机构有合约的研究人员,公开报道了两种受政府客户青睐但却最终失败的大众传播研究形式。^④ 向美国政府出售对外国宣传进行内容分析服务的基础在于:对出版物的详细监控有助于预测敌对政权的政治转变,同时能够揭示苏联宣传机构与世界范围内公开的非共产主义刊物之间的

① Reported in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 59.

② Leo Bogart, "Operating Assumptions of the U. S. Information Agency," 19, no. 4 (Winter 1955—56): 374.

③ L. John Marti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Its Legal and Diplomatic Contro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8), pp. 205—6. See also: B. S. Murty,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ropagand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ropaganda Analysis," 18, no. 4 (Winter 1954—55): 445—46.

秘密协作关系。而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哈罗德·拉斯韦尔、纳森·莱特斯、伊锡尔·德·索拉·普尔和其他二战国会图书馆心理战小组的成员的科研成果。然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的研究者1954年表明，上述研究都没有获得预期结果。^①类似的还有“美国之音”的海伦·考夫曼(Helen Kaufman)提到的一个例子。苏联断言，美国的种族歧视无法支持霍夫兰(Hovland)那套广为接受的、关于受众对“单面”宣传和“两面”宣传有何反应的理论。而“美国之音”对德国的研究关注的就是如何化解苏联的这一言论。^②同年，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在其他地方写道，“总体上”他感觉“鼓动和宣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角色被夸大了”。^③政府宣传能够带来“随手可得的太平盛世”(push-button millennium)的神话遂开始瓦解。

在美国舆论研究会1956年大会上，中央情报局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的一位分析家使这一神话彻底溃散。杰拉里德·斯特贝尔(Gerald Streibel)的演讲以一个长期以来的共识——即心理战的学术研究具有可取之处——开头，但他进而提到，除了政府对应用大众传播研究的巨额资助之外，“(心理战)操作者与研究者之间的鸿沟从未得以弥合”。他认为，研究者很难为操作者提供对“政策制定”有用、及时的信息。在现实世界里，“心理战与其说是反科学的，不如说它是前科学的”。政府所寻找的秘诀并不存在，这引发了自由欧洲电台转而向“记者和其他专家”寻求有关宣传技巧的信息与见解。斯特贝尔总结道：“心理战关心的是说服人群，而不是研究人群。”^④

斯特贝尔的言论在当时的工作坊中引发了小小的危机。对此次会议进行报道的社会应用研究所的戴维·希尔斯在记录中专门插入了一条说

①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ropaganda Analysis," 18, no. 4 (Winter 1954—55): 445—46.

② Ibid.

③ W. Phillips Davison, "A Review of Sven Rydenfelt's Communism in Sweden," 18, no. 4 (Winter 1954—55): 375—88, with quote drawn from p. 377.

④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ropaganda and People in the Cold War," 20, no. 4 (Winter 1956—57): 757—60, with quote drawn from p. 757.

明,指出自由欧洲电台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诸多基本假设相悖”,而且“对政策制定和应用研究的潜力都存在误解”。会议上的其他发言者都对斯特贝尔的结论进行了攻击。^①

但这是显而易见的。心理战问题,只是学界致力于寻找洛文塔尔所谓“随手可得的太平盛世”的、更广泛危机中的一个方面。次年,著名传播学作家威廉·阿尔比格(William Albigh)回顾前20年传播研究,指出该领域论文产出的数量虽高,但深度“并未让他受到鼓舞”。人们几乎不知道“传播学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或是)公共舆论的相关理论”到底是什么,阿尔比格指出,这些论文中满是描述性的实证研究,却少对舆论的形成过程和变化过程作出有意义的归纳和提炼。^②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表达了相似的悲观看法。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则做出了如下结论:“在十几二十年前赋予传播研究领域巨大活力的‘雄心壮志’(great ideas)已被消磨殆尽。(当今)没有形成新的、与之相当的替代观点。我们进入了一个停滞期。”^③即便是罗格斯大学的约翰·赖利(John Riley)和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伦纳德·科特雷尔(Leonard Cottrell)这两位心理战的坚定支持者,也承认在应用传播研究现存概念的基础上,要想在心理战的效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景已经“幻灭”。^④

撇开这些让人丧气的词句,事实上,心理战并未结束,只是在其目标与措辞的些许方面发生了转变。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紧密关联的国际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概念涌现出来。政府减少了对早期心

^① Ibid., p. 758.

^② William Albigh, “Two Decades of Opinion Study: 1936—1956,” 21, no. 1 (Spring 1957): 14—22.

^③ Bernard Berels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no. 1 (Spring 1959): 1—6, with quote drawn from p. 6. 贝雷尔森并没有详细解释他认为的“雄心壮志”是什么。然而,他的评论内容暗示着,他所指的是将跨学科的传播研究作为广义社会行为窗口的做法,李普曼的刻板印象的概念,拉斯韦尔“谁对谁说了什么”模型的质化研究方法论创新,以及诸如此类的基本概念。贝雷尔森的上述评论发表在1958年美国公共舆论协会年会上。1959年,威尔伯·施拉姆、大卫·利斯曼和雷蒙德·鲍尔在《公共舆论季刊》的春季号上对贝雷尔森的分析进行了评论,并强烈反对。参见 pp. 6—17.

^④ John Riley and Leonard Cottrell, “Research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21, no. 1 (Spring 1957): 147—58.

理战中备受青睐的“宣传”——也就是与传播媒介直接相关的方面——的资助，但对国际研究中心提出的更宽泛的、整合的“发展”整个国家的策略的资助却在不断增长。国际研究中心的方法认为，大众传播的技术创新，暗中激发了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被剥夺政治和经济权利之人的政治参与，进而在这些国家引发大规模骚乱。国际研究中心认为，大众传媒是这类危机管理的重要工具；能够教人们掌握新技能，并作出其他的积极贡献。但仅有媒介还不够，美国还应该组织起合适的经济、政治、军事机构，作为这种一揽子计划的组成部分。国际研究中心还表示，在那些传媒和一揽子援助计划都不足以稳定局势的国家，美国应该提供武器、警察、军事顾问和反叛乱援助。因此，国际研究中心的方法被传播专家称为“发展理论”，而被军事规划人士称为“有限战争”。^①

国际研究中心的工作对狭义的传播理论也很重要。1956年底，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达成一个广泛共识，受众效应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毕竟，对受众效应的研究是该中心传播研究项目的基础。这样一来，对“欠发达社会或农业社会中政治传播的接收、理解与记忆”的研究进入了舞台中心。^②此外，大家还达成了不成文的共识，海外的精英人群应该称为说服研究的首要目标群体。

“老式”心理战，特别是针对苏联及东欧的研究，虽然仍很重要，但看起来已停滞不前。以1956年《公共舆论季刊》的国际研究中心特刊为例，在当期41篇论文中，编辑伊锡尔·德·索拉·普尔将涉及苏联的论文限制在6篇，这个比例与1952年由洛文塔尔主编的国际传播研究专刊相比，差异十分明显。在该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传播栏目介绍

^① Irene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5); 亦可参见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Rohan Samarajiva and Peter Shields, "Integration, Tele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ower in the Paradig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no. 2 (Summer 1990): 84-105; Rohan Samarajiva, "The Murky Beginnings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Field," in N. Jayaweera and S. Amunugama (eds.), *Rethinking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ingapore: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 1987).

^② "Images, Definitions and Audience Re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20, no. 1 (Spring 1956): 197.

中,普尔表现出了一种言不由衷的恭维。他写道,“我们对此进行了如此长久的关注”,因此该栏目的文章显示出了分析的复杂性。^①

公开出版物并没有迹象表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仍然相信能够轻易找到掌握传播力的诀窍。与其相反,研究者现在普遍认为,要想达到更好的传播“效用”——即操纵受众达到所需结果的能力——只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通过每一点新的发现增加我们对传播行为的理解。国际研究中心专家们似乎还对诸如抽样程序、数据分析这样的基本方法问题达成了共识,同时认为在调查具有敌意或“拒访”人群时,可以使用一些粗糙但便捷的方法。

《公共舆论季刊》这些内容说明,有关苏联传播行为的论文数量在减少,但是关注第三世界动荡国家的论文却增加了。那些曾关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并做出诸多贡献的杰出学者,转而在专业范畴内,大肆批评用简单的“因果”模型无法预测传播行为。

1959年,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在一篇名为“关于传播效果”的文章中描绘了本书所讨论时代末期的最新传播理论发展动态。戴维森当时在兰德公司,刚刚完成两本有关冷战时期的德国的书,其中一本与汉斯·斯皮尔合著。^②

戴维森的文章是详细阐释“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最早作品之一,该理论后来在传播研究中颇具影响力。文中,他列举了一系列有关传播与人类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前提,指出人类所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指向特定的欲望或需求的满足。因为人的注意力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人们置身于信息的海洋中,希望通过分类整理找到他们认为(无关正确或错误)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习惯、态度和知识积累”将发挥“行动指南”的功能。戴维森继而指出,这个框架能为十年前的传播研究数据提供一个统一而连贯的解释,否则这些数据就会显得异常。他总结道,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能够揭示这一信息分类整理过

① Ithiel de Sola Pool, “Communication in the Global Conflict,” 20, no. 1 (Spring 1956): 313.

② W. Phillips Davison, “O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23, no. 3 (Fall 1959): 343—60; and author’s interview with W. Phillips Davison, November 14, 1990.

程的特殊机制。^①

戴维森这篇论文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找到了这一新的分析和早期心理战研究、特别是与那些未能成功找到传播效果诀窍的研究之间的概念联系。戴维森明确反对“被动受众”概念，然后为了实现对受众的操控，重新调整了分析策略，以适应自己的新分析。他对此作出如下总结：

传播者的受众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者——它不能被视为任由宣传大师塑造的一块粘土。恰恰相反，……如果操控者(manipulator)希望从受众那里有所得，那么必须先让受众有所得。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确实有时候操控者能够在讨价还价中占据优势……但受众也可以讨价还价。许多被广泛忽视或遭到误解的传播者其实都了解这项(传播)成本。^②

于是，受众不是被动的；它或许更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但为了达到预期的行为必须被驯服的动物。然而，“新”“旧”两种解释背后的相似性在于：一是要赶快找到一种方法，使受众能够更有效地听从传播者的意志；二是忽视了传播者与其所处社会之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两种解释都抛开了传播的社会情境，这不是简单地为开展一项受控实验而采取的临时之举，而是理论本身的一个基本取向。戴维森1959年这篇文章作出的新阐释，意味着传播又一次不知不觉降为一套“操控者”(用戴维森的话来说)的技术集，只不过这一次是从个体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戴维森上述观点的论据和参考，大部分来自心理战实践与研究，这些在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和专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传播影响行为”的方式，戴维森举了三个例子，其中两个来自二战时期的心理战。^③戴维森在此研究中使用的其他证据(每个都有注释)，分别来源于

① Davidson, "O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pp. 344—55, with quotes drawn from pp. 347, 349.

② Ibid., p. 360.

③ Ibid., pp. 353—54.

如下研究：美国新闻署在希腊的宣传活动，劳埃德·弗利和哈德利·坎特里尔为中央情报局所做的海外调查，库珀和亚霍达的宣传研究，苏联叛逃者的情况汇报，以及科斯克米提、英克尔斯和鲍尔对苏联宣传的研究。^①

没有人指出戴维森对上述文献的阅读和使用存在错误。关键在于，这一主导范式对此后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已经找不到任何与美国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斗争或冷战相关的概念。

^① Ibid., pp. 355, 348. Lloyd Free, *Six Allies and a Neutral* (Glencoe: Free Press, 1959), pp. 350, 357, 360.

第七章 主导研究范式的国际化和强化

191

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当然不能被简化为“资助者带来研究偏见”这样一个问题。资助者确实惯于为那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提供资金，这些研究者也能够承诺和确保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于那些有钱有势、能够设定研究议程的出资方提供更多实际用途。但是社会科学界中，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要比这深入和复杂得多。在该学科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主导范式”的支持者们既要和那些追求各种非主流范式的同事作斗争，也要和持不同观点的非专业人士作斗争。这些对立关系，以及主流社会科学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纵横捭阖的多变关系，远远不是前几章中讨论的相对直接的经济联系能够简单说明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主流大众传播研究者并不是简单地被“收买”，而是将受雇机构的价值观内在化，并认同这些机构行动的理据，甚至因参与这些行动而自觉高贵和光荣。有趣的是，学术圈对这一时期心理战项目的支持和推动，被看作是对麦卡锡主义排外情绪的一种抵制。这种抵制，以知识界左翼和右翼的对手为代价，加强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政治正确性和学术权威性。

大众传播学术史的专家们基本上都同意，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将自己看作社会改革者、进步主义者，甚至是政治激进派。举一个简单例子，美国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管哈里·H·菲尔德(H. H. Field)曾经指出，这家研究中心的宗旨就是“让掌权者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这家机构的建设纲领强调，民意调查应该被看作

“一种让选民发声的新方式，由此加强政治、社会、经济议题上的公共知识和公共利益”。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前身实际是拉扎斯菲尔德设立不久的“人民调查机构”(People's Research Corporation)。这家机构的名称反映出1940年之前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某些措辞理念和精神气质。^①

然而，二战时期的政治军事危机为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构造了一套新的协同目标。彼得曼(A. Biderman)和克劳福德(E. Crawford)曾为美国空军准备过一份鲜为人知的材料，非常罕见地、直白地陈述了美国学界与政界的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新型协同目标的形成在主流社会科学家和政府的关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在材料中指出，1945年后，维持经济、赢得战争、打击纳粹和重建世界秩序的目标“让那些大幅增加公共干预和准公共干预的政策计划获得了合法性”，“能够为政府搜集各种情报、计划和评估数据，提供可靠专家知识和经验的，通常只有社会科学家这个群体”。^②不久之后，那些寻求社会工程工具以便管理危机的既存精英群体和那些对政府政策持改革态度的社会科学家群体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利益趋同。彼得曼和克劳福德指出，“科学的标签对于应用科学界的委托方——政府来说十分受用；同样，这对于那些寻求政府欣赏或认可其所提出的公共政策的社会科学者来说，也十分受用。”^③

全国性的共识十分强大，特别是在二战过程中尤为如此。彼得曼和克劳福德认为这种共识促使社会科学家把那些可能存在“根本性价值争议”的问题转变成“纯粹的工具性研究”。^④换句话说，对于改革派社会科学家来说，那些原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充满疑点的研究课题开始变得可以被接受，甚至变成令人向往的学术研究目标。

①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05, 308. 关于1940年之前大部分社会研究的改革方向，参见 Albert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p. 18.

②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p. 30.

③ Ibid., p. 31.

④ Ibid.

炸弹袭击对平民大众士气的影响、军队的民主化程度、真真假假的暴力袭击对国内外民众有何种宣传功能。这些议题不仅成为了可被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成为纯粹的工具性问题被“客观地”对待。^①

彼得曼和克劳福德所举的三个例子中，至少有两个，或者全部都是今天所公认的大众传播研究兴起阶段的基础文献。有关炸弹袭击心理影响的课题，来自于伦西斯·利克特(R. Likert)所组织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康沃斯(Converse)在其关于美国调查研究历史的著作中写道，该项目“是战争时期最为重要的政府调研项目。从项目设计来看，它也是最有野心的调研项目”。该项目出版的有关德国和日本民众士气的研究，是最早系统检验美国“说服行动”对外国民众产生效果的研究之一。当然，这种“说服”是以一种特别的暴力方式完成的。^② 上述提到的“军队民主化研究”和“暴力袭击宣传功能研究”是斯托弗、霍夫兰和美国士兵系列研究项目的其他同事一起完成的。这些项目将美国军队士兵作为研究对象，是最早开展的有关传播效果的、大规模系统性研究。学者们广泛认为，这类研究在传播学方法论的演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彼得曼和克劳福德认为，有五个基本因素使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项目能够以“专业化的恰当方式”被社会科学家们承接。彼得曼本人的早期研究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曾经接受了军方和情报机构的资助，因此他有

① Ibid. ,p32.

②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212, 484 notes 92—94. See Alexander Leighton, *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utton, 1949), pp. 58—95, 这是关于在日本对传统和原子弹袭击对平民大众士气影响测量的延伸讨论。

③ 参见 Edward Suchman, Samuel Stouffer, Leland De Vinney, and Irving Janis, “Attitudes Toward Leadership and Social Control,” in Samuel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362—429. 关于宣传效果，参见 Carl Hovland, Arthur Lums-daine, and Fred Sheffield, *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关于这一主题更为深入的研究，参见埃尔文·詹尼斯的“Effects of Fear-Arousing Propaganda”(with Seymour Feshbach),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48, no. 1(1953): 78—92。

机会接触一些权威信息,并记录下来。^① 以下是他们提出的五个基本因素:

“1. 社会科学家们会有选择地关注军事政治环境中那些与他们的价值理念一致的各种因素。”例如,社会科学家们会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与五角大楼达成合作共识,进而忽视美国对外的帝国主义行动和国内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崛起等更富争议的问题。

“2. 将社会科学家与‘暴力’这个军方关注的首要问题隔离开。”

“3. 非对称关系的理念。”彼得曼和克劳福德的意思是让社会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可以使用军方的资金和资源去开展他们自己的研究事业,避免参与他们所不屑的事情。

“4. 参与军方项目这种组织性的创新研究不会对专业自主性形成威胁。”军方在付出咨询费和项目资金的同时,一般允许社会科学家们留在高校或智库任职,而不是直接加入政府工作。

“5. 满足社会科学家们的科学抱负。”被资助的项目常常具有专业价值和科学开拓的吸引力。^②

其中第二个因素,即将学术与这些研究的实际效果“相互隔离”尤其重要。与彼得曼和克劳福德的研究相呼应,莫里斯·简诺维兹(M. Janowitz)也发现,军方对社会科学的使用“主要被限定在政治战、心理战、军队治理和士兵教化等领域”。^③ 这一发现同时暗示了两个要点:第一,“军事化”的传播研究特别愿意强调政府资助社会科学的特性;第二,获得资助的著名学者中,彼得曼、克劳福德和简诺维兹这三位都将他们的研究视作非暴力的工作。彼得曼和克劳福德还进一步说明,他们的许多

^①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参见研究卷首的合同数据表。

^② Ibid., p46—47.

^③ Morris Janowitz, *Sociology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5), p. 121; cited in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cited in p. 46.

社会科学家同事都持相同观点。也就是说，美国心理战研究（也包括军队士气研究等）应该被看作与弹头改进这样的研究具有本质不同。按照他们在1968年的说法，有一点可以印证这种观念当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十分普遍：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二战之后的20位主席中，“一半以上都曾以某种方式（在冷战时期）参与了国防研究项目”。彼得曼和克劳福德指出这些工作后来曾遭遇各种歧视，因此拒绝提供姓名。^①

他们在此处使用“相互隔离”一词是很巧妙的。彼得曼和克劳福德以承认社会科学家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良好意愿的方式，回避了这些学术工作实际上是否增加了社会痛苦和暴力这个更基本的问题。然而，社会科学家们的信念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个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他们的信念是否正确？绝大多数证据显示，他们的信念并不正确。

军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心理战项目）表面看来很少涉及作战前线的暴力问题。然而，只要看一看政府所公布的有关心理战的多种定义，尤其是那些仅在内部分享的秘密定义，就会明白，对项目分配方来说，暴力毫无疑问是心理战一以贯之的、主要的特性。很多学者也一定会不同程度地明白，他们的工作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整体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来，像威尔伯·施拉姆、伊锡尔·德·索拉·普尔和伦纳德·科特雷尔等人在他们精英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中会直接接触政府内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再者，哪怕一个一般的报纸读者也会经常看出，那些被广泛报道的，美国对希腊、伊朗、埃及、危地马拉、老挝、刚果等国暴力政变和内战的干预，与在这些国家中开展的民意调查和传播系统分析之间自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更进一步看，如果不是由于羞于承认参与了不光彩行动，社会科学家参与心理战研究所产生的那么多讳莫如深的秘密和借口又该如何解释？

结论是必然的：参与心理战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并非不清楚他们的角色，也并非不清楚心理战行动经常与暴力行动配合展开。用彼得曼和克劳福德使用的词汇来说，这些社会科学家只是与对他们研究工作后果

^① 引自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pp. 45—46.

的反思“隔离”了。

对这一时期《公共舆论季刊》和其他著名学术刊物的研究,能够对表面充满改革思维的学者为什么会参与心理战项目这一问题作出解释。其中很多原因与彼得曼和克劳福德列举的五点因素大致相同。通常来看,传播学术圈之所以对控制和操纵民众的研究抱有强烈兴趣,并不是出于某种单个原因,而是各种利益纠葛的结果。某个特殊个体的参与动机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总结出一些共性。

首先,心理战的研究工作成为一种表达爱国热情、忠诚和为国效劳精神的方式。这些情感在美国舆论研究会主席的讲话等仪式性文献中表达得最为频繁。《公共舆论季刊》曾为读者们摘登了美国舆论研究会主席塞缪尔·斯托弗 1954 年的演讲,他提到:“公共舆论分析帮助我们与那些正在威胁民主自由的力量战斗”,“为了服务社会的需要,社会科学家们必须具备一种历史远见,并努力工作以提高他们的调查研究技能”。^①

斯托弗的演讲鼓舞人心、底气十足,原因至少有两点。他将美国看作是民主、和平、人道主义、真理、理性和犹太教与基督教价值观的守护者。美国社会科学的很多倡导者都声称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让上述价值观念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以此来消除迷信与无知。^②与此同时,很多学者还对西方世界不久前经历的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正像斯托弗演讲所提到的,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看作是对西方文化发动整体攻击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学者们才有了整装前进共同支持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动力。^③

认为金钱本身就是一个动员学者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缺乏证据,只要想想还有很多比传播研究更赚钱的领域向既有能力又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开放。实际原因前面已经提到,只有参加政府资助项目才能开展特定形式的研究并获得职业声誉,而这是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达成的。

^① Samuel Stouffer, “1665 and 1954” (AAPOR Presidential Address), POQ 18, no. 3 (Fall 1954): 233. 除非另有注释,本章中没有出处的文章都出自《公共舆论季刊》。

^② 例子参见 Hadley Cantril, “Psychology Working for Pea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 no. 3 (March 1949): 69—73.

^③ 1989年12月6日,约翰·L·马丁对作者进行采访。

举例来说，一些学者对定量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很感兴趣，也乐于接受心理战项目的调遣，他们可以通过政府的资助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达成目标。塞缪尔·斯托弗在哈佛实验室开展的社会关系研究就体现出了这个特点。一方面，斯托弗坚定支持心理战项目，将其看作是应对“那一小撮能够按下致命武器（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残酷（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手段。这种支持不可放松，直到确认“自由世界的威力和意志可以摧毁他们”。^① 另一方面，斯托弗和他的同事们在《公共舆论季刊》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成果几乎全部聚焦于狭窄的方法论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在非结构访谈中获取累计量表这样的研究。^② 美国空军之所以资助这个项目，首要目的在于想从针对苏联难民和叛逃者的访谈中获取有关苏联的战略情报。^③ 斯托弗一方面帮助完成了这项工作，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一种方式将古特曼和拉扎斯菲尔德的潜在距离量表运用分析这些访谈的原始数据，从而满足自己的研究兴趣。^④ 与其类似，埃里克·马德尔（E. Marder）为美国军队人力资源研究办公室^⑤所做的国际舆情研究也同样包括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之前提及的斯图亚特·多德和梅尔文·德福勒（M. DeFleur）的里维尔项目也是如此。这种现象与彼得曼和克劳福德提出的五点要素中的第一点和第五点相吻合。

社会科学家们参与政府项目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权衡，即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那些没有积极参与政府项目的学者

① Stouffer, "1665 and 1954."

② Samuel Stouffer Edgar Borgatta, David Hays, and Andrew Henry, "A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Cumulative Scales," 16, no. 2 (Summer 1952): 273—91; Andrew Henry, "A Method for Classifying Non-Scale Response Patterns in a Guttman Scale," 16, no. 1 (Spring 1952): 94—106; Edgar Borgatta and David Hays, "The Limitations on the Arbitrary Classification of Non-Scale Response Patterns in a Guttman Scale," 16, no. 3 (Fall 1952): 410—16; Edgar Borgatta, "An Error Ratio for Scalogram Analysis," POQ 19, no. 1 (Spring 1955): 96—99. 以上文章都经过了美国空军 AP 33(038)-12782 号文件的认可，这一文件来自于人力资源研究机构、麦斯威尔空军基地、阿拉巴马州，它们为著名的斯托弗“托技术”奠定了基础。

③ Clyde Kluckhohn, Alex Inkeles, and Raymo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the Soviet System* (Cambridge, MA: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54).

④ Stouffer et al., "A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Cumulative Scales."

⑤ Eric Marder, "Linear Segments: A Technique for Scalogram Analysis," 16, no. 3 (Fall 1952): 417—31.

会被学术界的领袖们批评为“中立主义者”，甚至是斯大林的同情者。这种压力在丹尼尔·勒纳的著作中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来。朝鲜战争高峰期，他在《公共舆论季刊》国际传播研究专刊中写道：“国际舆情的管理工作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政治立场问题”，在与共产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中立主义者”总是声称“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选择不能等同于在自由和奴役之间的选择”。勒纳认为，这些喜欢追捧“和平、安全、缓和冲突”等政治口号的人们，正在推销一种“中立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这将会导致自由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民心的战斗中遭遇失败”。按照勒纳的观点，那些对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持保留意见的人，是在“回避政治现实……他们所持有的各种错误预期在未来现实事件的冲击下根本站不住脚”。^①

值得说明的是，与“中立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外知识分子宣传工作中的核心任务。从1950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就不断支持和资助文化自由委员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一系列有政治自由化和强烈反共倾向的刊物出版，其中包括英国的《邂逅》(*Encounter*)、德国的《月刊》(*Der Monat*)、奥地利的《论坛》(*Forum*)、法国的《证据》(*Preuves*)和拉丁美洲的《笔记本》(*Cuadernos*)。在传说中的共产主义扩张形势下，他们把这些机构和刊物用作争取中立立场知识分子的手段。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爱德华·希尔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丹尼尔·勒纳等人，开始成为这场运动卓越的公共代言人，但他们后来都坚持表示，当年并不清楚中央情报局资助了他们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十分清楚，声势浩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共运动在当时美国知识界中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隐秘资助。^②

与此同时，《公共舆论季刊》和其他主流刊物将那些非主流传播范式

① Daniel Lerner, "International Coali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Content: The Case of Neutralism," 16, no. 4 (Winter 1952): 681—88, 主要引自于 pp. 682, 683, 685。

②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al Cold Wa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in Barton Bernstein (ed.), *Towards a New Past* (New York: Pantheon, 1968), pp. 322—59; and 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的支持者，或者那些不积极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这两个群体经常重合）描述成被心理疾病所困扰的，或是在极权政治体制下人格紊乱的个体。^①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 Almond）的《共产主义的魅力》（*Appeals of Communism*）研究（与普林斯顿的赫伯特·克鲁格曼、埃尔斯贝·勒温、霍华德·瑞金斯合著）^②被广为接受和认可，也几乎是最详尽、浅显的科学分析。阿尔蒙德和他的同事们采访了约 250 位已辞去职务的共产党员，他们曾在四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任职。在这一有样本偏差的研究中，他们得出结论：共产主义吸引的人一般都“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不确定和混乱”。他们还称，共产主义组织的领袖一般被普通党员视为是“冷酷的、刻薄的、高高在上的、教条的和投机的”人，他们为了权力抛弃了一切价值观。^③

不管共产党是否存在以上这些特点，很明显的一点是，20 世纪 50 年代，对“马克思主义者存在或可能存在心理缺陷”这一提法的大肆宣传，使当时一些批判的观点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对阿尔蒙德数据作出的另一种解释是，“那些自我认知混乱的人”更倾向于辞去共产主义政党中的职务。事实上，和普林斯顿学者的结论相比，这一说法更符合基本的社会科学。但是阿尔蒙德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过多关注这种解释，该著作出版时，也从未认真讨论过这种说法。恰恰相反的是，当时的学术期刊将上述存在争议的研究方法奉为主臬，而阿尔蒙德自己也借此在主流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走向事业的巅峰。

① David Rodnick and Elizabeth Rodnick, "Notes on Communist Personality Types in Czechoslovakia," 14, no. 1 (Spring 1950): 81—88; Jean-Marie Domenach, "Leninist Propaganda," 15, no. 2 (Summer 1951): 265—73; Herbert Krugman, "The Appeal of Communism to American Middle Class Intellectuals and Trade Unionists," 16, no. 3 (Fall 1952): 331—55; 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Author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Behavior," 17, no. 2 (Summer 1953): 185—201.

② Gabriel Almond, with Herbert Krugman, Elsbeth Lewin, and Howard Wriggins,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也可参见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信函档案、心理战略委员、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独立报》以及 MO。阿尔蒙德要求心理战略委员会“对研究进行监督，同时从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角度评估在普利斯顿所做工作的实用性”（memo of April 16, 1952）。

③ Almond,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p. 15, 18, 142.

当时,针对美国全球地位普遍存在的观点有各种各样的批判,大众传播研究者们迫于社会压力极力压制这些批判观点,当时社会中日益盛行的麦卡锡主义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压力。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参议员麦卡锡和他的政治同盟针对美国的情报项目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进行了一系列攻击。这始于麦卡锡著名的“反美国之音”运动。这一运动带来了一系列“审查”活动:对美国新闻处图书馆的公开“大清洗”、解雇“美国之音”官员、对被疑是共产党员的美国之音职员进行反复调查。^①这一时期,还有一项调查虽然没有“反美国之音”行动那么闻名,但仍值得一提,那就是田纳西州国会议员卡罗尔·里斯(Carroll Reece)发起的,针对主要的享受免税待遇基金会的国会调查。里斯认为,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美国主要基金会,通过资助社会科学研究,参与推行社会主义,宣扬“一个世界”(One World)政府。里斯认为,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是对美国以及美国倡导的“自由企业”经济体系的背叛。他甚至指出约翰·杜威、塞缪尔·斯托弗、伯纳德·贝雷尔森正是所谓的“罪魁祸首”。^②

面对里斯的责难,各基金会的负责人申辩道,美国的社会科学是“冷战”时独特而有力的武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在向里斯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称,“在共产主义领袖眼中,社会科学被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党派扩张最险恶、最危险的敌人。这种观点十分强势,以至于苏联禁止教授社会学”。为了充分证明社会学对“冷战”的巨大贡献,赫林还专门引用了苏联政府发布的

^① 对《美国之音》的审查听证会,参见 David M. Oshinsky,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pp. 266—77 passim; and Robert William Pirsein, *The Voice of America* (New York: Arno, 1979), pp. 235ff.

^② House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ax-Exempt Foundations, *Tax Exempt Foundations* 83rd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54). 关于委员会调查主题的概述,参见 committee research director Norman Dodd's testimony (pp. 5—23) and that of his assistant Kathryn Casey (pp. 64—89)。关于斯托弗的辩护言论,参见 Charles Dollard's (Carnegie Corporation) testimony (pp. 972—74)。For Berelson's defense, see H. Rowan Gaither's (Ford Foundation) testimony (pp. 1035—36)。

两篇充满敌意的报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美国资产阶级哲学与社会学》和《服务于扩张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①

对于那些拒绝支持冷战共识的学者来说，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同事排挤、被解雇、学术前途困难重重、遭遇学校和国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面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质询、被媒体恶意报道，甚至还有更糟的。^② 即使最优秀的学者都无法幸免。比如，1953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让芝加哥大学的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出庭作证，因为十年前他曾加入过共产主义党派(布尔斯廷与调查机构合作)。^③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一直对美国社会学会的会议进行监督，努力排除异己。^④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因为拒绝根据政治现实修改自己的学术成果而被开除。^⑤ 同时，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些顶尖高校内，教授之间掀起了意识形态竞争，一些疑似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的教职工都遭到了“清洗”。^⑥ 1949

① Ibid. *Pendleton Herring testimony* (pp. 794—865 passim, with quotes drawn from p. 838).

② Ellen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Cauter, *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Jane Sanders, *Cold War on the Campus: Academic Freedom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46—196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Of related interest, see Philip Meranto, Oneida Meranto, and Matthew Lippman, *Guarding the Ivory Tower: Repression and Rebell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enver: Lucha, 1985); Jonathan Feldman, *Universities in the Business of Repress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John Trumbour (ed.), *How Harvard Rules: Reason in the Service of Empir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Athena Theodore, *The Campus Troublemakers: Academic Women in Protest* (Houston: Cap and Gown Press, 1986).

③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p. 42.

④ U. 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Daniel Lerner” FBI file no. 123—10557, correspondence from A. H. Belmont to V. P. Kay, August 3, 1953.

⑤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更简要的陈述，参见 Peter Novick, “Historians, ‘Objectivity’ and the defense of the West,” *Radical History*, No. 40 (January 1988): 7ff; and Jesse Lemisch, *On Active Service in War and Peac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Toronto: Hogtown, 1975).

⑥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Cauter, *The Great Fear*, pp. 403—45.

年,马里兰州出台了《奥伯反共产主义法案》,一度成为清除学术界左翼分子的先锋,为其他十二个州树立了榜样。^①(不过,这一法案事后被证明是违反宪法的。)

那些拥护和支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社会科学的学者和机构,先后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内安全机构的严重打击。20世纪50年代早期,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每年在纽约地区的招生高达5000人,但作为一个人尽皆知的美国共产党资助的机构,该学院上了官方“危险组织”名单,并被取消免税待遇、学生也被传讯、最终于1955年关闭。^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了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的工作人员,调查了学院“后继者”社会分析基金的全部记录,并最终关闭了这所学院。社会分析基金曾为诸如阿普勒曼·威廉(Appleman Williams)和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这样的左翼学者提供小额资助。^③为了抗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这种行为,公民自由紧急委员会曾试图组织美国社会科学家发起抗议活动,但收效甚微,而且至今尚未得到任何主流社会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的支持。^④

长达十年的压制给社会科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55年,拉扎斯菲尔德为共和党基金开展了一项针对政治审查对社会科学影响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45名大学教师中,27%的被调查者都曾费尽心思“澄清自己没有极左或极右的倾向”。其中约20%的被调查者甚至为此改变了自己在课堂上讨论的课题、留给学生阅读的参考资料和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几乎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十分担心学生会对自己在课堂上说过的话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并以此把他们提交学校行政审查机构或

①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pp. 114—15. 关于立法权的历史,参见 *Laws of Maryland (1949)*, Chapter 86, pp. 96ff.

② Cate, *The Great Fear*, pp. 174—75.

③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earings Related to H. B. 4700, to Amend Section 11 of the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Act (The Fund for Social Analysis)*, 87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61).

④ Emergency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 “Petition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dvertisement) *Washington Post*, May 31, 1961, p. A16. 一些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没能在宣传广告上签名。

联邦调查局。约有 394 名被调查者声称，他们认为“自己的某些观点被歪曲地上报给官方了”。^①

在这种环境下，对心理战的学术贡献部分程度上成为证明一个人政治可靠性的途径，这一点在上文提及的基金会宣誓中可见一斑。当时，社会学对心理战的贡献被视为其政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公共舆论季刊》中有一些文章的“编者按”也存在这种倾向，在那些略有争议的文章的开头，编辑一般会这样申明，作者的意图是“吸纳中立者进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②或者“增强美国宣传战的效果”。^③

《公共舆论季刊》的例子反映出，在麦卡锡时代，很多学术机构扮演了自相矛盾的角色。面对来自激进右派的攻击，该期刊策略性地以继续出版斯托弗、贝雷尔森这类学者著作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然而与此同时，所有维护合法性的行为都必然带着一点不合法的特征，而且这也是一个逐步划分“不负责任”观点和“负责任”观点之间界限的过程。

在大众传播研究和其他领域，躲避麦卡锡主义审查的一个好办法，就是不断地对有利于巩固“中心”或主流范式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行为标准进行定义并维护。^④ 尽管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但这些行动本质上并不是为公民自由和学术自由而战。那些已经“自身难保”的学者们已经陷入了命运的漩涡，就像蒙受不白之冤的查尔斯·比尔德和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一样。

这种靠近政治中心寻求庇护的方式给大众传播研究带来了重要影响，强化了学术中心的权威，也增强了那些擅长在政府和基金会之间斡旋的学者们的权威。这种暗示告诫学者，不要像拉扎斯菲尔德调查所倡导的那样，去探寻理解传播学的新方法。这种暗示更沉重打击了对主流社会科学进行“左倾”或“右倾”批判的学术正当性。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美国社会科学“激进右派”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与对“激进左派”的批判也

① Paul Lazarsfeld and Wagner Thielens, *The Academic Min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pp. 193, 194, 197—204, 218—22, 206, 382.

② Lerner, “International Coalitions,” p. 681.

③ William Glaser, “The Semantics of the Cold War,” 20, no. 4 (Winter 1956): 691—716.

④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pp. 219—338.

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二者都反对国家与精英学者之间的“合谋”，对于社会科学领域专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蒙昧主义和排他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并且都坚信(尽管持有不同的理由)现代社会工程技术会对他们的支持者产生严重威胁。^①

马克思主义对传播学范式进行批判的合法地位慢慢丧失，这已成为对抗麦卡锡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共舆论季刊》和诸如美国舆论研究会等主流学术团体中，参与心理战项目的学者即便隐瞒了研究资金来源^②或采用有争议的研究方法^③，都不会被视为道德问题。但是，那些指责社会科学与国家“联姻”的言论，却对专业的中心带来了威胁，不管这些分析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很少能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也鲜有机会在学术会议中露面。

20世纪50年代，和其他知名杂志一样，《公共舆论季刊》倾向于忽略甚至嘲讽那些脱离主流研究范式的学者。但是，如果学者能够对普遍认可的传播学特点的假设进行翔实的论证，那么他一定会得到《公共舆论季刊》的青睐，其文章能够经常发表并获得赞誉。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该期刊从未刊登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思·霍克海默、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著作，只是刊登了三篇不温不火的书评，两篇是米尔斯的著作(1954年秋季和1956年秋季)，一篇是霍克海默的著作(1956年夏季)。^④这一行为表明，《公共舆论季刊》在刻意与这些学者保持距离，

① 例子参见 testimony of A. H. Hobbs in House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ax Exempt Foundations, Tax Exempt Foundations, pp. 114—88。

② As in Stuart Dodd,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from Person to Person,” 16, no. 2 (Summer 1952): 247—62; 应用社会研究所在引用时将自己定义为研究的赞助者，而不是合约的原始来源。例如，Patricia Kendall, “The Ambivalent Character of Nation-alism among Egyptian Professionals,” 20, no. 1 (Spring 1956): 277。

③ Almond, Appeals of Communism. 关于施拉姆曾经在东欧进行的关于广播研究的方法的批判以及美国在古巴进行的宣传广播的研究，参见 U. 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Broadcasts to Cuba: TV Marti Surveys Are Flawed (GAO/NSIAD-90-252, August 1990)。

④ Elliot Mishler, review,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by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18, no. 3 (Fall 1954): 323; W. Philips Davison, review, Sociologica: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introduction by Horkheimer, 20, no. 2 (Summer 1956): 480; Arnold Rogow, review, The Power Elite, by C. Wright Mills, 20, no. 3 (Fall 1956): 613—15。

但却颇有技巧地表示,这些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大众传播专业的学生们“有话要说”。与此同时,《公共舆论季刊》重复出版了与该杂志立场一致的学者的文章、书摘以及客座评论,比如丹尼尔·勒纳、哈罗德·拉斯韦尔、W·菲利普·戴维森等学者的作品。

对于那些在大众传播问题上表达异端观点却没有以“科学”的形式去表达的作者,《公共舆论季刊》毫不掩饰自己嘲讽的态度。埃弗里·莱瑟森(Avery Leiserson)对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所著《人所不知》(*The People Don't Know*)以及劳埃德·巴伦布莱特(Lloyd Barenblatt)对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所著《隐形说客》(*Hidden Persuaders*)的犀利评论,就是最好的例证。^① 塞尔迪斯和帕卡德认为,美国的大众媒介向受众展示了一个单一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现实”,这对大众意识的影响与渗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公共舆论季刊》将这两位学者定义为“不负责任的疯子”。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公共舆论季刊》“应该”刊发更多阿多诺、霍克海默和米尔斯这类学者的文章,也不在于塞尔迪斯和帕卡德的言论无可批驳,而在于它对某些大众传播领域的特定观点进行阐释和维护,同时策略性地排斥阿多诺这类批判学者,使得双方无法进行“负责任”的对话和交流。

总而言之,美国学术界参与心理战的行为存在着正、负两方面影响。正面影响包括:一是展现出一种爱国主义;二是获得资金和学术声誉;三是在一个对知识存在质疑或缺乏共识的社会中,为一个人的专业提供“保护伞”。负面的引导包括:一是想要避免伴随抵御国外假想敌时产生的失败,二是未达成政治和社会合法性时有遭受惩罚的威胁。这两方面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存在一种“绝缘”现象,即学术机构或个人将自己与自己学术著作产生的影响剥离开来。同时,学术界对于麦卡锡主义的抵制带来了对政治和科学中心的强化,这种强化的代价是同时挑战了“左翼”和“右翼”的观点。

^① Avery Leiserson, review, *The People Don't Know*, by George Seldes, 14, no. 1 (Spring 1950): 156—57; Lloyd Barenblatt, review, *The Hidden Persuaders*, by Vance Packard, 22, no. 4 (Winter 1958): 579.

第八章 心理战的遗产

威尔伯·施拉姆(W. Schramm)这位学者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对传播观念演化的任何讨论中都值得被特别提及。施拉姆传记的作者史蒂文·查菲(S. Chaffee)曾经写道,施拉姆“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灯塔”,而且从1933到1973年的传播研究应该被命名为“施拉姆时代”。施拉姆职业生涯中的专长是学术管理,还有对他那个时期大众传播“知识”的界定和传播。查菲称施拉姆是“(美国)大众传播学时代精神、研究范式和理论知识的首要播种者”。^①詹姆斯·坦卡德(J. Tankard)也认为,“威尔伯·施拉姆在界定和建设传播研究领域方面是贡献最多的一位”。^②尽管这些评价有时被批评为过于夸张,但施拉姆在1948至197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仍然十分明显。

施拉姆的著作在今天仍然很重要,因为这些著作对后面几代学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且被认为在冷战早期引领了传播教育界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观点。施拉姆在1945到1960年间的著作体现出一种黑白分明的二元论世界观,将他狂热的美国中心主义置于国内外意识形态敌人

^① Steven Chaffee (ed.),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to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36 (October 1974): 1—8.

^② James Tankard, "Wilbur Schramm: Definer of a Field," *Journalism Educator* 43, no. 3 (Autumn 1988): 11. 施拉姆进行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定义,这一影响超越了传播学研究。例如,施拉姆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共同承担编辑部的责任。

的对立面。^①

即便是施拉姆最热心的拥护者也承认，在施拉姆走向到美国新闻教育巅峰的过程中，他的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几乎都用‘好人’和‘坏人’来解释大众传播行为”，二是“带有一丝接近于种族中心主义”。^② 今天已经很少被提及的是，施拉姆的许多重要著作，包括里程碑式的著作《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都是为美国政府宣传项目而准备的教材。^③ 施拉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威权式”和“苏联集权式”两种媒介系统的区分，至今仍被广为接受。而这一理论是在美国新闻署的项目研究中提出的，主要建立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心理战项目有关苏联的二手资料基础上。^④

在上述理论中，施拉姆认为，与赫鲁晓夫时期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反对共产主义的威权国家性质更好、更加自由、也更加人道，部分原因就在于二者传播体制结构的差异。施拉姆的理论模型是把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简单划分为“好”和“坏”两类，忽视了任何一个社会在政治主张和

① 实例参见 John Riley and Wilbur Schramm, *The Reds Take a City: The Communist Occupation of Seou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1); 或者 Wilbur Schramm, "The Soviet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Hideya Kumata and Wilbur Schramm (eds.), *Four Working Papers on Propaganda Theory* (Urbana: Illinois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1955).

②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p. 4, 5.

③ Wilbur Schramm (ed.),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4), 参见美国新闻署承诺书的前言。麦克劳德和布鲁姆勒确定了传播学研究成为“一门自主学科”的日期，从施拉姆的 1954 年出版的著作中可查到证据。参见 Jack McLeod and Jay G. Blumler, "The Macrosocial Level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in Charles Berger and Steven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p. 284.

④ 施拉姆关于竞争传播系统的研究，参见 Schramm, "The Soviet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Wilbur Schramm, "Soviet Communist Theory," in Fred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pp. 105—46。施拉姆著作的脚注都来自一些名人的巨著，诸如 Frederick Barghoorn, Raymond Bauer, Merle Fainsod, Alex Inkeles, Paul Kecskemeti, Nathan Leites, and Philip Selznick，这些都是在为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项目做准备；W. W. Rostow and Alfred Levin's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52)，他们的出版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西德尼·胡克的研究为美国空军做了准备，他自己的研究服务于美国新闻署和美国空军，主导对韩宣传。相关完整的名单参见 Siebert, Peterson, and Schramm, *Four Theories*, pp. 152—53。

社会实践上的复杂关系,也未能对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面对进行考察和阐述。这种研究取向之所以缺乏科学严肃性,不仅因为其服务于政治目的,更是因为它为那些超级腐败和残忍政府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民主的、理性的说辞,即它们是对抗传说中集权威胁的有效手段。施拉姆的这种模式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不时被调用。近来,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 Kirkpatrick)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这种思维模式展现得尤其明显。^①

施拉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有关传播的一些重要著作今天仍然无法看到,原因是它们与中央情报局和军方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密切相关,政府坚持要将这些文件保密 30 年以上。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追溯施拉姆的职业生涯究竟与美国心理战运动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关联。例证如下:

1. 美国空军对朝鲜战争中美国心理操纵的研究。该研究的成果以多种语言反复出现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学术性和大众性出版中。^②

2. 美国新闻署的若干重要研究,其中包括对该机构的“评估”,“评估”项目是在施拉姆担任一家公民委员会主席时完成的,该委员会彼时积极拓展美国新闻署的行动。^③

^① 关于柯克帕特里克,参见 Christopher Hitchens,“How Neoconservatives Perish: Good-bye to ‘Totalitarianism’ and All That,”*Harpers* 281, No. 1682 (July 1990): 65。施拉姆关于“极权主义”这一概念的研究,参见 Schramm,“Soviet Communist Theory.”在当今传播理论中,对这一概念结构的重复和不断修正的具体例子,参见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1987), pp. 111—19。

^② Riley and Schramm, *Reds*; John Riley, Wilbur Schramm, and Frederick Williams, “Flight from Communism: A Report on Korean Refugees,” *POQ* 15, no. 2 (Summer 1951): 274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unattributed articles in this chapter appeared in *POQ*); See also Wilbur Schramm and John Riley, “Communication in the Sovietized State, as Demonstrated in Ko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951): 757—66. See also Wilbur Schramm, *F. E. C.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Radio* (Washington and Baltimore: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52, ORO-T-20[FEC]).

^③ Noted in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34. Wilbur Schramm (chair), U. S. Information Agency: A Program of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USIA, 1953).

3. 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解放电台 (Radio Liberation) 的委托, 对自由欧洲电台 (Radio Free Europe) 和解放电台 (Radio Liberation) 的项目开展分析和咨询服务。这些电台表面上是私营, 实际上由中央情报局管理。^①

4. 担任国防部长特别行动顾问小组的秘书长。该小组主要专长是为宣传行动、心理战和秘密行动设计计划。^②

5. 在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国防科学委员会任职。^③

6. 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资助了施拉姆的若干著作。包括《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1954)、《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Working Papers on Propaganda Theory*, 1955)、《人类传播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1963), 以及其他流传广泛的教科书。^④

7. 与美国海军研究局的大量研究合同。^⑤

8. 晚年参加了美国国际开发署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关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国大众媒体发展的项目。^⑥

综上所述, 以目前的公开资料来看, 政府的心理操纵行动在施拉姆职业生涯的特定时期内扮演着核心角色。正是这一时期, 按照坦卡特的说法, 施拉姆“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构建了之后几十年被广为运用的传播研究范式”。^⑦

① Robert Holt, *Radio Free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8), p. 236; Joseph Whelan, *Radio Liberty: A Study of Its Origins, Structure, Policy, Programming and Effectiven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72), pp. 299—301; see also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31.

② “Schramm, Wilbur Lang,”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105, p. 432;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31.

③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31.

④ Schramm,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see Fore-word for acknowledgment of USIA sponsorship). Kumata and Schramm, *Four Working Papers* (USIA contract 1A-W-362). Wilbur Schramm,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7.

⑤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105, p. 432.

⑥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17, 43—44.

⑦ Tankard, “Wilbur Schramm,” p. 11.

在传播研究中,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以及于其中内在的有关“传播”和“国家安全”概念),体现了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正反馈,是从系统论分析借用而来,本意是指信息系统整体行为与这些系统所采用的模式、技术标准之间的关系。

按照麻省理工学院布莱恩·亚瑟(W. B. Arthur)的说法,正反馈的问题在于,它会像枷锁一样限制新知识的出现,而且会约束那些构建新模型的知识创新活动。亚瑟认为“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的思想并不能保证长久适用”,“一些早期构建的标准(如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现在已过时的计算机语言FORTRAN)很难被后来的标准撼动,不管潜在的候选者有多么优越”。^①那些根深蒂固的知识形式和标准会制造出一个封闭的观念体系,只有当这个体系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外部力量,或者由于自身不堪重负而崩溃时,才可能发生改变。

托德·吉特林(T. Gitlin)所说的“主导范式”^②和史蒂文·查菲所用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时代潮流”(Zeitgeist)一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知识形式。^③简而言之,一个范式或时代潮流是指在一些问题上的专业共识;关于一个研究领域“是什么”的知识;检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工具;相对固定的研究议程;对这一研究领域“负责任”观点和“不负责任”观点进行区分的默认标准。^④

美国政府在心理战项目上的持续支出显示,美国社会科学界这个“基于知识的系统”存在正反馈现象。政府在资助传播研究时,重视的是这个

① W. Brian Arthur,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 262 (February 1990): 92—99, with quotes drawn from p. 99. 相关更详细的材料,参见 W. Brian Arthur,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 in Philip Anderson Kenneth Arrow and David Pines, (ed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88); Paul David, *Path Dependence: Putting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IMSSS Technical Report No. 533, Stanford University, November 1988); Elhanan Helpman and Paul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② Todd Gitlin,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 no. 2 (1978): 205—53.

③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in Preface and p. 1.

④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研究领域能否为资助机构带来短期效益。这些机构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宣传、情报和军事操作。这种严格限定的倾向同时被很多因素所强化,包括:研究资料来源限制、在国会审查之前明晰联邦机构预算、对麦卡锡主义的恐惧、针对苏联威胁而立即采取措施的信念等。量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适合这种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这种研究给人以“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印象,它强调数量统计的特点常常使改革派社会科学家可以绕过国会和强势本土主义游说团体所设置的障碍。很明显,政府资助形塑了20世纪50年代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流行概念范式,例如多德的扩散研究和勒纳的发展研究等等。

当然,并不能简单地说明美国传播研究的科学探索路径事先就被政府和其他人决定了。虽然政府资助并不能决定社会科学家的表达内容,但是它却能够决定谁可以就传播学发表“权威”讲话,而且能够间接决定谁的言论可以通过学术媒体被圈内同仁所知晓。这种心理战项目的“正反馈”效应首先是通过政府合同的资金促成,而这样一来又会产生其他影响,包括:参与学术圈中最有影响力学者的社交网络(正像克劳森的社会计量研究)的机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可参见多德主持的里维尔项目的文献)的机会、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讨论的机会、获得大学教职,以及其他能够在学术圈中巩固自身地位的各种机会。^①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可以适时回顾1945到1960年间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的科学遗产。这些遗产至少可以在9个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域中看到:

1. 效果研究。
2. 对苏联和其他被美国决策者认定有问题国家的传播体系之

^① John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as a Career Contingenc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7, no. 2 (1984): 207—13. Stuart Dodd, "Formulas for Spreading Opinions," 22, no. 4 (Winter 1958): 537—54。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讨论组的成员不断出现在美国舆论研究协会的年会上,这显然表明,讨论组一直在报道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这些讨论组总结出来的问题很明显出现在每年的《公共舆论季刊》上。对于专业性的进步,参见 Clausen, "Research," p. 212。

研究。

3. 舆情问卷抽样技巧的精细化操作,以及问卷统计方法。
4. 在美国以外地区,尤其是对美国观察者来说存有敌意地区的民意研究和受众研究。
5. 早期的扩散研究。
6. 早期的发展理论研究。
7. 威尔伯·施拉姆称为大众传播研究和教学“时代风潮”的各种观念。
8. 在“参照群体”和“两级传播”理论中的深化。
9. 在商业公共关系领域广泛运用的“动机”研究和士气研究。

传播效果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在心理战项目和传播学发展中都特别重要。在非常重要的美国士兵系列研究和卡尔·霍夫兰在耶鲁大学的相关研究当中,美国政府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同时又是间接的主导角色。从美国士兵研究的数据搜集,到费用高昂的 IBM 打孔卡数据输入,再到理论阐释的推进和研究人员的工资,以及其他研究报告生产所需的日常经费,所有这些花销都由二战时期的美国军方提供,他们的目标是要维持战争时期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纪律。^① 霍夫兰及其研究团队战后的数据分析在整个研究项目中至关重要,但花费最少,这些研究工作也是由卡内基集团赞助的。^② 正如前面讨论所指出的,美国士兵研究中看似属于

① 参见 Samuel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3—54,这一部分是对于心理战项目不同阶段的发起动因、财政动因的讨论; p. viii for discussion of IBM punch cards.

② 同上。也可参见卡耐基集团致谢书的正文(See also front is piece of text for Carnegie Corporation acknowledgment)。斯托弗、拉姆斯登以及霍夫兰都依赖政府支撑,参见 Samuel Stouffer et al., “A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Cumulative Scales,” 16, no. 2(Summer 1952): 273—91; in which Stouffer acknowledges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AF33(038)-12782 as the principal under wri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 well-known “H-technique”; Arthur Lumsdaine and Irving Janis, “Resistance to ‘Counterpropaganda’ Produced by One-Sided and Two-Sided ‘Propaganda’ Presentations,” 17, no. 3(Fall 1953): 310. Note that Lumsdaine became the “monitor” for the U. S. Air Force contracts provided to Stouffer; and “Psychological News and Not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 no. 12(December 1948): 559.

“私人”资助的部分，也与同时代的心理战项目存在人员队伍上的重叠。从霍夫兰一系列研究中获得的数据和结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阐释美国传播学的核心论据。^① 这些研究包括：有关信源可信度的研究、针对不同受众的单面宣传和两面宣传研究、恐惧和暴行的动机影响研究、舆论的持续时间变化研究，等等。

对美国说服对象的国家传播体系开展详细研究，也成为早期大众传播学的焦点。一系列详尽的、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大众传播体系研究应运而生，研究对象包括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西欧的卫星国、前苏联外围国家（伊朗、土耳其等），以及被美国安全机构视为有政治问题的国家（法国、意大利、智利、古巴、印度尼西亚等）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所^②开展的对于苏联传播体系的研究，是国家传播体系最早的综合性研究之一。在这个研究中，“国家传播体系”一词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第一次出现并被使用。^③

在方法论上，心理战项目资助和推动了几种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后来成为大众传播学以及美其名曰“公共传播研究”（其实就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基础。这些研究方法的发展包括：把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量化研究技巧的推进；资助领先的调查机构支持调查研究法的细

① 例子参见 Lumsdaine and Janis, “Resistance to ‘Counterpropaganda’”; W. Phillips-Davison, “O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23, no. 3 (Fall 1959): 343. 戴维森写道，霍夫兰进行的“实验室研究”使得出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命题变成可能。从小范围被筛选过的定量研究内得出这样的命题并分类，这样的举措大多被冠以修辞学、政治传播和心理战的名义。例如，霍夫兰实验数据在美国新闻署的应用，参见 Ralph White, “The New Resistance to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16, no. 4 (Winter 1952—53): 541.

②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November 1953), series II, box 4, project 642; “Kazakhstan and the Kazakhs: Target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 (December 1954), series II, box 5, project 649; “The Kazakhs: A Background Study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November 1955), series II, box 4, project 649;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in Eastern Europe” (January 1958), series II, box 10—11, project 303; 每一份文件都来自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文件，收藏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中。

③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y G. Blumler, “Linkages Between Mass Media and Politics: A Model for Analysi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ovitch, and Janet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化;资助斯托弗、霍夫兰等人实验法和准实验法研究技巧的发展;资助利克特、斯托弗等人推动量表技巧的发展;资助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最早的电子计算机项目。^① 军方和宣传机构同样支持伊锡尔·德·索拉·普尔、施拉姆和其他人设计专门的研究方法,从“反对派”群体,尤其是苏联反对派的舆论和媒介使用中获取情报。^② 这些方法对于敌对亚文化研究也有广泛的适用性,比如罪犯人群、贫困人群、富有阶层等群体的亚文化,但主要而言,还是为了让美国的外宣项目预算合法化。^③

在扩散理论研究这方面,美国空军宣传项目有力支持了多德、梅尔文·德福勒和其他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的扩散研究。希伦·洛厄里和梅尔文·德福勒为这些研究的合法性辩护,声称它们构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若干个里程碑之一。^④ 在扩散理论研究中,美国空军为整个项目的开支提供了保障,他们选择空投传单作为实验刺激物,提供散发传单的渠道,并大力推动这类宣传行为成为“扩散研究”的重点方向。很明显,如果没有美国空军的保护,多德及其同事们的研究,就不可能获准开展。

① 关于最新分析,参见 Harold Lasswell and Nathan Leite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49), 提供了关于拉斯韦尔、莱特斯、詹尼斯、伊锡尔·德·索拉·普尔和其他人在战时工作的一系列例子。关于支持调查组织和科技发展的观点,参见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75—76, 340—41, 353, 357, 506—7 notes 37 and 42, 531 note 17; Carl Hovland, Arthur Lumsdaine, and Fred Sheffield, *Experiments in Mass Communi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关于支持利克特和社会研究机构的论证,参见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40—41, 353, 537, 531 note 17; and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 p. 26. On support for Stouffer, see Stouffer et al., “A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Cumulative Scales.” On financing the use of computers, see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 p. 28。

② 支持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的证据,参见 Sig Mic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p. 211。支持施拉姆的论证,参见 Whelan, *Radio Liberty*, pp. 299—301。

③ Whelan, *Radio Liberty*; 也可参见 *Hous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Winning the Cold War: The U. S. Ideological Offensive* (Washington, DC: GPO, 1964), Part 6: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grams,” and Part 7: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④ Shearon Lowery and Melvin De 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Longman, 1983), pp. 204ff.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13 (038) - 27522 under wrote Dodd's Project Revere research. On financing, see pp. 207—8。

从早期的发展理论中也可以看出心理战项目在扩散研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发展理论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发展得很迅速,^①但是20世纪50年代,其中心在麻省理工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CENIS)。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该领域的核心著作。这项研究关注的是“美国之音”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勒纳和其他三位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杰出学者:伊锡尔·德·索拉·普尔、盖伊·波克尔(G. Pauker)和埃弗利特·哈根(E. Hagan),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国际研究中心的成员。^②每个人都为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镇压暴动做传播议题的咨询和讲授工作。^③

施拉姆是20世纪50年代大众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最重要一位学者,他的研究与心理战项目结合得太深,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认定其“教育性”工作开始于何时,而他的“国家安全”工作又是何时结束的。之前刚刚提到,施拉姆对于美苏争端的二元论解读是他能够接下政府合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他能成为查菲所谓现代大众传播研究“时代精神”代表的原因。^④

在20世纪50年代最有影响的两项大众传播研究——“两级传播研究”和与之相关的“参照群体研究”中,都可以发掘心理战项目的一些贡献。这个研究领域的学者包括: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伊莱休·卡茨、罗

① Everett Rogers,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in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3rd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83), p. 121.

②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Mass Media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Lucien Pye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234—53; Guy Pauker, "Indonesian Images of Their National Self," 22, No. 3 (Fall 1958): 305—24. Everett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62). MIT, CENI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Description* (Cambridge: MIT, July 1955), pp. 59—60.

③ 关于普尔和哈根在镇压暴动中的角色,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Report of a Country Team Seminar (on counter insurgency)*, June 11—July 13, 1962 (Washington, DC: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1962), Ithiel de Sola Pool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oject], 1963)。关于“发展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应用的详细阐述,参见 remarks by Daniel Lerner, Ithiel de Sola Pool, Guy Pauker, Lucien Pye, Morris Janowitz, W. Phillips Davison, Hans Speier, and others in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④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1.

伯特·默顿和赫伯特·海曼(H. Hyman),他们的研究一直被当作“民间研究”,比如关于美国传播和投票行为的研究。^①然而,当代的观察家如布鲁斯·拉纳·史密斯却发现,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在以上两个研究议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56年早期,史密斯就对比了汉斯·斯皮尔的心理战研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选举研究,这两项研究都被视为“两级传播”的理论源泉。史密斯发现,斯皮尔和拉扎斯菲尔德都认为“政治上有影响的传播不能直接通过大众媒体宣传触及广泛的社会阶层”,“却往往通过个人或组织作为中介到达大众”,斯皮尔将这些个人或组织称为“社会接力点”(Social relay points),而拉扎斯菲尔德则称之为“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②史密斯还认为,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为“美国之音”开展的中东研究,为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检验。^③与此相似,史密斯把“参考群体”理论大部分功劳归功于罗伯特·默顿和赫伯特·海曼,但是继续又引用了希尔斯和简诺维兹对二战德国国防军溃败的研究和国际研究中心对于国际传播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都对“参考群体”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④斯坦利·比格曼(S. Bigman)为美国新闻署做的研究,也在1955年卡茨和拉扎斯菲尔的关键性个人影响理论出现前对其做出了重要贡献。^⑤

最后,心理战项目也给“动机”研究的发展以及商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些公共关系技巧做出了一定贡献。动机研究在起源和筹款过程中一直是非常商业化的。但是,政府保持军队和民众斗志和大型企业中加强雇员士气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斯托弗在这个领域的先驱研究就是

① 关于“两级传播”和“参考群体”理论的来源,参见 Elihu Katz and Paul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Robert Merton, “Patterns of Influence” (1949) in Robert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7); Herbert Hyman and Paul Sheatsley, “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 11, no. 3 (Fall 1947): 412—23.

② Bruce Lannes Smith, “Trends in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Opinion, 1945—1955,” 20, no. 1 (Spring 1956): 182—96, with quotes drawn from p. 191.

③ Ibid.

④ Ibid.

⑤ Stanley Bigman, *Are We Missing the Target? A Manual of Evaluation Research Methods for USIE*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51).

军队最早推动的，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及。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公司的企业形象广告被视为是“社会内心理战”很明显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公共舆论季刊》所言，企业形象广告是从政府项目成果借用而转为民用的典型。^① 同样，20 世纪 50 年代动机研究领域的杰出评论家赫伯特·克鲁格曼(H. Krugman)也把政府对于心理战项目的热情，作为促进动机研究技巧发展的六大原因之一。尽管在克鲁格曼看来，政府之前声称的这些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值得怀疑。^②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在 1945 到 1960 年间开展的心理战项目，对这个时期大众传播研究最重要的议题设置方面都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效果研究的很多重要基础探索都来自于二战时期的心理战。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机构资助的项目，其中采用的实验和准实验的研究方法和量化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创新，都在大众传播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冷战时期大量有关外国传播体系、信息扩散以及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受到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引导和塑造。

1945 至 1960 年间，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和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三方面特征。第一，美国心理战项目一定意义上是大众传播理论的应用形式。美国的社会科学，包括大众传播研究，为美国政府和整个西方工业文化胁迫目标群体建立了合理性解释。心理战项目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技巧，以便施加胁迫性影响。正如施拉姆在 1954 年所言，囊括了当今各种传播研究成果的“宣传”，“就是社会控制的工具”。^③

第二，政府的心理战项目为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的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了大部分经费。应用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研究中心等重要研究机构都是依靠军方、情报和宣传机构的合同维持生计，在 20 世纪 50 年

① Leonard Pearlman and Morris Rosenberg, "Propaganda Techniques in Institutional Advertising," 16, no. 1 (Spring 1952): 5.

② Herbert Krugman, "An Historical Note on Motivation Research," no. 4 (Winter 1956): 719-23.

③ Hideya Kumata and Wilbur Schramm, "The Propaganda Theory of the German Nazis," in Kumata and Schramm, *Four Working Papers*, p. 37. In Schramm's original conception, this attribute of propaganda applied simply to "totalitarian" societies. The Propaganda Theory project was prepared under USIA contract 1A-W-362.

代早期,传播学发展成为一项独立学科的那些年尤为如此。

第三,有数据显示政府项目并没有决定什么是科学家应该说的,但却强烈地影响了谁具有话语权。在科学家的眼中,保持相对独立性、避免研究结果受到直接干预,这是军方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① 美国学术圈也会不时地给合同委托机构带来不那么受欢迎的研究结果。^② 尽管有时话可以这样说,但其实政府合同很明显地帮助组织和供养了科学家的一种非正式组织网络。而这些科学家正是主导美国传播研究领域几十年的那批人,正如克劳森的研究显示的那样。^③

不论传播研究如何标榜自己,美国的传播研究通常并不是中立客观的,它与政治经济力量的距离可能都不到一壁之隔。事实上,传播研究与权力机构紧紧缠绕在一起,这一点与主流经济学或是原子物理学一样。这些学科是建制内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产物,它们之间的结合太过广泛以至于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常识。

心理战项目的支持者一直宣称,这种心理战模式的胁迫应该比正规战争成本更低、更灵活,而且也没有传统战争那么血腥,甚至可以转移或者避免争端。这些支持者声称美国在国外运用这些技巧能够带来人道主义并产生民主,而这些政治价值正是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学术圈所公开支持的。

然而,与上述言辞相悖的是,美国宣称理应在心理战项目中受益的一长串国家,今天却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托、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最近的巴拿马和前苏联。这些目标国的大多数民众今天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极度贫困的状况,与号称惠及众人的干预行动和传播项目开展之前相比,这些国家变得更不民主、更不自由,医疗情况更差,人民处于更大的恐慌中。甚至一些一向保守的人物,

① Albert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pp. 46—47.

② eg., Joseph Klapper(chair)“Propaganda and People in the Cold War”(AAPOR panel report), 20, no. 4(Winter 1956): 757—60.

③ Clausen,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Soldier.”

如约翰·保罗二世教宗都认为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历时数十年的相互竞争带来了明显的灾难性后果,在这些竞争中,心理战正是一项核心策略。^①

讨论心理战的问题具有争议性,因为再度审视心理战的历史脉络会得出一种异端邪说式的结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总是贪婪的、破坏性的,对种族灭绝采取容忍的态度,愿意牺牲无数人去追逐看起来越来越遥远的安全幻想。再度反思心理战在传播学中的作用,需要再度审视当今西方意识形态的来源,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社会科学家在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样的讨论总会惹恼那些认同现存秩序的人们。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思考也许会带来一丝希望。

^① Pope John Paul II,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Encyclical Letter), February 19, 1988; Roberto Suro, "Papal Encyclical Says Superpowers Hurt Third World," Peter Steinfels, "An Unsparing View of Economic Ills," and "Excerpts from Papal Encyclical on Social Concerns of Church," each appearing 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88.

斯图亚特·多德“里维尔相关论文” 系列清单(1958)

里维尔相关论文参考文献

1. Bowerman, Charles, with Stuart C. Dodd and Otto N. Larsen,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Verbal vs. Graphic Symbol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UNESCO, Vol. 5, September 1953.
2. Catton, William R., Jr., "Exploring Techniques for Measuring Human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1954, pp. 49—55.
3. —, and Melvin L. DeFleur, "The Limits of Determinacy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Social Forces*, Vol. 35, 1957, pp. 295—300.
4. —, and Stuart C. Dodd, "Symbolizing the Values of Others," in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Thirteenth Symposium of the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1954, Chap. 34, pp. 485—496.
5. —, and Richard J. Hill, "Predicting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Leaflets: A Study in Selective Perception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Sampling,"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roceedings of the Pacific Coast Sociological Society, 1953, Vol. 21, pp. 247—251.
6. DeFleur, Melvin L., and Orjar Oyen,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an Air-borne Leaflet Messa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9, 1953, pp. 144—149.
7. Dodd, Stuart C., "The Interactance Hypothesis—A Gravity Model Fitting Physical Masses and Human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5, 1950, pp. 245—256.
8. —, "Sociomatrices and Levels of Interaction—for Dealing with Plurel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Sociometry*, Vol. 14, 1951, pp. 237—248.
9. —, "On Classifying Human Values—a Step in the Prediction of Human Valu-

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6, 1951, pp. 645—653.

10. —, "On All-or-None Elements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Sociolog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 1952, pp. 167—177.

11. and staff, "Testing Message Diffusing in C-Ville,"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roceedings of the Pacific Coast Sociological Society*, 1952, Vol. 20, 1952, pp. 83—91.

12. —,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from Person to Person, 1'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6, 1952, pp. 247—262.

13. —, "Controlled Experiments on Interacting—Testing the Interactance Hypothesis Factor by Factor," read at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tlantic City, N. J., September 1952.

14. —, "Human Dimensions—a Re-search for Concepts to Integrate Thinking,"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Thought*, Vol. 9, 1953, pp. 106—113.

15. —,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in Controlled Experiments: Charting the Distance and Time Factors in the Interactance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8, 1953, pp. 410—416.

16. —, "Can the Social Scientist Serve Two Masters—An Answer through Experimental Sociology,"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roceedings of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Society*, Vol. 21, 1953, pp. 195—213.

17. —, "Formulas for Spreading Opinion—a Report of Controlled Experiments on Leaflet Messages in Project Revere," read at A. A. P. O. R. meetings, Madison, Wis., Apr. 14, 1955.

18. —, "Diffusion Is Predictable: Testing Probability Models for Laws of Inter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0, 1955, pp. 392—401.

19. —,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by Chain Ta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1, 1956, pp. 425—432.

20. —,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in Harmonic Logistic Curves," *Psychometrika*, Vol. 21, 1956, pp. 192—205.

21. —, "A Predictiv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Using Nine 'Mode' and 'Tense' Factor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0, 1956, pp. 571—585.

22. —, "Conditions for Motivating Men—the Valuanee Theory for Motivating Behaviors in Any Cul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25, 1957, pp. 489—504.

23. —, "The Counteractance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3, 1957, pp. 273—284.

24. —, "A Power of Town Size Predicts Its Internal Interacting—a Controlled Experiment Relating the Amount of an Interaction to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Interactors," *Social Forces*, Vol. 36, 1957, pp. 132—137.

25. —, with Edith D. Rainboth and Jiri Nehnevajsa, "Revere Studies on Interaction" (Volume ready for press).

26. Hill, Richard J., "A Note on Inconsistency in Paired Comparison Judg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8, 1953, pp. 564—566.

27. —,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ogistic Model of Message Diffusion," read at AAAS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lif., Dec. 27, 1954.

28. —, with Stuart C. Dodd and Susan Huffaker,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the Logistic Growth Curve in a School Population," read at the Biometrics Conference, Eugene, Ore., June 1952.

29. Larsen, Otto N., "The Comparative Validity of Telephone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in the Measurement of Message Diffusion from Leafle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 1952, pp. 471—476.

30. —, "Rumors in a Disaster,"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 and Melvin L. DeFleur, "The Comparative Role of Children and Adults in Propaganda Diffu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1954, pp. 593—602.

32. —, and Richard J. Hill,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1954, pp. 426—434.

33. Nehnevajsa, Jiri, and Stuart C. Dodd, "Physical Dimensions of Social Distance,"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38, 1954, pp. 287—292.

34. Pence, Orville, and Dominic LaRusso, "A Study of Testimony: Content Distortion in Oral Person-to-Person Communication,"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35. Rainboth, Edith Dyer, and Melvin L. DeFleur,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in Four Communities: Some Factors in the Use of Airborne Leaflets as a Communication Mediu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 1952, pp. 734—737.

36. Rapoport, Anatol, "Nets with Distance Bia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3, 1951, pp. 85—91.

37. —, "Connectivity of Random Net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3, 1951, pp. 107—117.

38. —,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Distinct Hits on Closely Packed Target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3, 1951, pp. 133—138.

39. —, "'Ignition' Phenomena in Random Net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4, 1952, pp. 35—44.

40. —, "Contribution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Mass Behavior: I. The Propagation of Single Act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4, 1952, pp. 159—169.

41. —, "Response Time and Threshold of a Random Net,"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4, 1952, pp. 351—363.

42. —, and Lionel I. Rebhun, "O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Rumor Spread,"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4, 1952, pp. 375—383.

43. —, “Contribution to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ntagion and Spread of Information; I. Spread through a Thoroughly Mixed Population,”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5, 1953, pp. 173—183.

44. —,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rough a Population with Socio-structural Bias; I. Assumption of Transi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5, 1953, pp. 523—533.

45. —,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rough a Population with Socio-structural Bias; II. Various Models with Partial Transi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5, 1953, pp. 535—546.

46. —, “Spread of Information through a Population with Socio-structural Bias; III. Suggested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Vol. 16, 1954, pp. 75—81.

47. Shaw, John G., “Testing Message Diffusion in Relation to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 Analysis of Respondents to an Airborne Leaflet Message,”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48. Turabian, Chahin, and Stuart C. Dodd, “A Dimensional System of Human Values,” *Transactions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Association*, 1954, pp. 100—105.

49. Winthrop, Henry, and Stuart C. Dodd, “A Dimensional Theory of Social Diffusion—an Analysis, Modeling and Partial Testing of One-way Interacting,” *Sociometry*, Vol. 16, 1953, pp. 180—202.

Stuart Dodd, “Formulas for Spreading Opin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Winter 1958, p. 551.

学术论文

50. M. A. Catton, William R., J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Human Values,” 1952.

51. M. A. Oyen, Orj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the Case of Message Diffusion,” 1953.

52. Ph. D. Catton, William R., Jr., “Propaganda Effectiveness as a Function of Human Values,” 1954.

53. Ph. D. DeFleur, Melvin Lawrence,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Stimulus Response Relationships in Leaflet Communication,” 1954.

54. Ph. D. Hill, Richard J., “Temporal Aspects of Message Diffusion,” 1955.

55. Ph. D. Larsen, Otto 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Social Diffusion of Messages,” 1955.

56. Ph. D. Shaw, John G., Jr., “The Relationship of Selected Ecological Varia-

bles to Leaflet Message Response,” 1954.

57. M. A. West, S. S. , “Variation of Compliance to Airborne Leaflet Messages with Age and with Terminal Level of Education,” 1956.

已出版的专题论文

58. DeFleur, Melvin L. , and Otto N. Larse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8.

研究文献概览

本书研究了 1945 至 1960 年间美国心理战与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本书引用的文献集中于以下领域：

1. 1945—1960 年间(通常被称作冷战早期)的国际事件和社会政治大环境；
2. 该时期的美国心理战行动；
3. 该时期的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
4. 几位主要思想家涉及心理战和大众传播研究方面的作品、传记资料等；
5. 活跃于大众传播研究和心理战领域的主要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史料；
6. 苏联和西欧之间的心理战和大众传播研究相关文献的资料对比。

接下来的注解按下列六大类对研究引用的文献进行讨论。

1945—1960 年间社会政治环境

与冷战早期的事件和政治相关的文献汗牛充栋，全面评述这些资料显然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然而，看看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的部分文献

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很多事件的发生背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得知当时主流学者和政治人物是如何解读这些事件的。

冷战期间,主要涉及外交事务的文献,通常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派别:正统派、苏联派、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正统派和苏联派的对立始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对这些学派所认为的“官方”版本的冷战,美国 and 苏联政权两方都持不同的看法。^①最基本的特征是:双方争执不休,认为对方才是造成冷战局面形成和升级的罪魁祸首,^②这是一个摩门教形式的二分法,将对方阵营的人视为强大又邪恶的敌人,^③并且相信己方想要在对方的侵略之下存活下来,一定得经历一场更加艰苦卓绝的战役。^④

① 参见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9), or James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ited by Walter Millis (New York: Viking, 1951)。对于这些问题“苏联路线”式的出乎寻常解读,可以参见 Nikita 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robe Talbo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p. 361—62, 367—63, 392—93, 453—60; 以及 Nikita 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robe Talbo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 47—67。

② 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或者 William Welch, *American Image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以及 Vojtech Mastny,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③ 从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坚定拥护二分法的认识论。参见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5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7); 或参见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编委会的两本小册子, *Apologists of Neocolonialism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Two Diametrically Opposed Polic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西方观察家的观点,可参见 James Burnham, *The Coming Defeat of Communism* (New York: John Day, 1950); James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New York: John Day, 1953); 或者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The Communist Conspiracy: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 84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56)。

④ 典型的西方作品包括: Anthony Bouscaren, *A Guide to Anti-Communist Ac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58); 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 *Guidelines for Cold War Victory* (Chicago: 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 Press, 1964);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Nature and How to Stop It* (Washington, DC: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苏联的作品包括: L. Skvortsov, *The Ideology and Tactics of Anti-Communism*, translated by J. Turner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Nikolai Yakovlev, *CIA Target: The USSR*, translated by V. Schneerson and D. Belyavsk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4); D. Volkogonov, *The Psychological War*, translated by Sergei Chulak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6)。关于苏联的策略还可参见 Paul Lendvai, *The Bureaucracy of Truth: How Communist Governments Manage the New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通过比较美国和苏联两方正统派材料,可以发现,双方均不承认对方的想法具有足够的合法性。这两种趋势是1945—1960年间的主流派别。

修正主义对于正统派的挑战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修正主义有几种变体形式,但是,基本都认同美国(并非苏联)是冷战时期的侵略者。^①20世纪70年代,后修正主义应运而生,可以理解为,它的出现重新整合了修正主义带来的裂痕,既承认了一些修正主义的事实性论点,反驳了摩门教式的关于正统派的一些想法,也重新认定,苏联应该对冷战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尤其是冷战初期的1945—1960年间。^②

涉及美国内政事务的一般性研究很难按照学派进行分类,部分原因在于,已经出版的观点丰富多变。但是,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的,区分两类作者是大有裨益的。一类作者视共产主义为巨大的威胁,认为这些威胁迫使本国做出回应(典型的就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而使用心理战技术^③);与之相比,另外一类认为,相比共产主义而言,那些回应本身对美国具有更加现实的威胁。^④

从整体上看,这些在大环境下的研究暗指了美国国内社会对于美国在美苏冷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显而易见,在研究所涉及期间内,从心理战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来看,这些分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有关这个趋势,最详细的记录可能是: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更早的、被广泛引用的“修正派”观点著作包括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Delta, 1961); Joyce Kolko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David Horowitz (ed.), *Corporations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② 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or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个对于苏联行为“后修正主义”的西方视角最详细的描述可参见 Joseph L. Noguee and Robert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③ Bouscarin, *Guide*; 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 *Guidelines for Cold War Victory*。

④ 参见 David Caute, *The Great Fear: The Anti-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Richard Freeland,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New York: Knopf, 1972); Robert Griffith and Athan Theoharis (eds.), *The Specter: Original Essays on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74)。

心理战相关文献

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很少看到有关心理战的文献及其呈现出的问题。首先,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心理战政策资料和操作记录中的一大部分在创建之时就被保密处理。^①许多资料至今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或者只能通过信息公开法案获取“美化”版本。^②在某些案例中,美国情报部门故意销毁特定的敏感行动的全部资料,特别是那些有关生化战争、人体化学实验和谋杀等的资料,借此规避国会关于心理战方面的盘查。^③

幸运的是,美国相对开放的政府记录方便了许多心理战政策以及一小部分现存运行记录的解密。这其中,许多资料并未公开发表,但是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杜鲁门总统图书馆(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获取。这些资料中,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安全委员的心理战政策报告、^④心理

① 概览可参见 Edward P. Lilly,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and Its Predecessors: Foreign Policy Coordination 1938—1953," in Gaetano Vincitorio (ed.), *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37—82.

② 例如,直到1989年以后,我以信息自由法案为要求,一部分被称为“热点文件”的20世纪40年代美军记录(记录组号319,条目编号:154,美国国家档案馆)才得以解密。另有一大部分的资料还处于保密状态。1989年,中央情报局介入了杜鲁门图书馆,重新封存了已经解密并公之于众十年之久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记录。

③ John Marks,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CIA and Mind Control*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p. 204—5; Thomas Powers, *The Man Who Kept the Secrets: Richard Helms and the CI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9);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lleged Assas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 An Interim Report, and Final Report 94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75 and 1976, respectively).

④ 基本政策文件包括:U. 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4: Coordination of Foreign Information Measures, December 9, 1947; NSC 4—A: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December 9, 1947; NSC 1012; 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 June 18, 1948; NSC 43: Planning for Wartime Conduct of Overt Psychological Warfare, March 9, 1949; NSC 59: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Program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Planning, December 20, 1949; NSC 59/1: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Program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Planning.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March 9, 1950; NSC 5911: Progress Reports, March 9, 1950, December 26, 1950, July 31, 1952, October 30, 1952, and February 20, 1953; Index to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Plan for General War, April 9, 1951;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Plan for General War, May 8, 1951; NSC 74: (转下页注)

策略委员会记录^①以及许多解密后的美国陆军、空军和国务院记录。^②在上述资料中,可以找到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零星讨论和记录。^③涉及中央情报局行动的部分记录已收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一个私立档案馆)、^④国家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⑤和其他机构中。

涉及中央情报局心理战行动的二手文献非常多,包括从各角度记录的史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和纪实记录。材料可靠性参差不齐。某些资料故意保有美国心理战行动的虚假消息,但研究者可以通过交叉检验多个作者对于同一事件或某一既定事实的描述,进行证伪。^⑥值得推荐的二手文献包括:关于

(接上页注)A Plan for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July 10, 1950; NSC 127; Plan for Conducting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During General Hostilities, February 21, 1952; NSC 135, No 6;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Effort; NSC 5412/2; Covert Operations, December 28, 1955. 这些文件和决议的关联程度依据个案有不同程度的保密状况。这些文件现存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内。

① 心理战委员会记录档案集现存位于密苏里州独立市的杜鲁门图书馆。参见 Dennis E. Bilger, "Record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1—1953, Shelf List," Truman Library, December 1981. 委员会档案概览参见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rogress Report on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Effort for the Period July 1, 1952, through September 30, 1952,"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Truman Library; 也可参见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ublic Affairs, "Emergenc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Offensive (USSR)," April 11, 1951,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subject file b. 188, Truman Library. 1989年,中央情报局介入了杜鲁门图书馆,重新封存了已经解密并公之于众十多年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记录。

② 特定内容参见 Records of the U. S. Joint Chiefs of Staff, RG 218, CCS 385(6—4—46), sections 7, 11, 16—17, 21—26, 31—47, 52—53, 71, 75—76, 79, 86; and Records of U. S. Army Staff Organizations, RG 319, entry 154 "Hot Files" series, particularly P&O 091. 412 TS, 这些材料全都现存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编号为 RG331 的心理战援助记录中有一份搜索引导,涵盖了 1945—1960 年的大部分研究资料,但是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它仍然处于保密的状态。

③ Records of U. S. Army Staff Organizations, RG 319, entry 154 "Hot Files" series, particularly P&O 091. 412 T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Record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④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755 Massachusetts Ave NW, Washington DC 20036.

⑤ Center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122 Maryland Ave NE, Washington DC 20002.

⑥ 关于政府秘密使用和散布虚假消息方面精彩详尽的讨论,参见 David Wise, *The Politics of Lying: Government Deception, Secrecy and Power* (New York: Vintage, 1973)。

“心理战”这一术语的定义^①；心理战预算和人员；^②保密状态下的中央情报局对报纸、杂志、出版社和电台的所有权和补助；^③对记者和媒体行政人员的唆使^④；选择性资助或蛊惑美国 and 国外学者；^⑤秘密电台广播，包括自由欧洲电

① Lilly, “Foreign Policy Coordination”; Alfred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Its Origi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William Daugherty and Morris Janowitz (eds.),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for U. S. Army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1958), pp. 12—47. 档案材料包括: Psychological Warfare Study for Guidance in Strategic Planning; State-Army-Navy-Air For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ANACC) case file no. 304,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ncepts and Organization” (May 1946—May 1949) 可以通过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 (SWNCC) 和国家—军队—空军协调委员会 (SANACC) 的学术资源微缩胶片获得解密版本。(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78)。

② 关于美国心理战活动方面的详细预算并无现存记录。然而，中央情报局心理战顾问 James Burnham 估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心理战盛行之时，每年的花费多于 10 亿。参见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p. 188; 另见 Comptrolle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U. S. Government Monies Provided to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Washington, DC: GPO, 1972) 以及 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Dell, 1974), pp. 74—78, 174。关于人事情况，可参见 Daniel Lerner,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D-Day to VE-Day*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48)，其中包括二战期间美英之间详细（虽然不是全部）的人员部署 (pp. 438—49); Larry D. Collins, “The Free Europe Committee: American Weapon of the Cold War,” Ph. D. diss., Carlton University, 1975; James R. Price, *Radio Free Europe: A Survey and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ocument No. JX 1710 U. S. B, March 1972); Joseph Whelan, *Radio Liberty: A Study of Its Origins, Structure, Policy, Programming and Effectiven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72)。

③ John Crewdson and Joseph Treaster, “The CIA’s 3—Decade Effort to Mold the World’s View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6, and 27, 1977; Hous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th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Hearings: The CIA and the Media*, 95th Cong., 1st and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78); Peter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pp. 59—102. 关于东欧的报告，参见 Vitaly Petrusenko, *A Dangerous Game: The CIA and the Mass Media* (Prague: Interpress Prague, n. d. [1978?])。

④ Daniel Schorr, “Are CIA Assets a Press Liability?” [More] 8, no. 2 (February 1978)。一些有用的概括可以参见 Arlene Sanderson, “The CIA Media Connectio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Center Report No. 432*,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1981; Loch Johnson, *America’s Secret Power: The CIA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83—203.

⑤ Robin W.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1961* (New York: Morrow, 1987); Coleman, *The Liberal Conspiracy*, pp. 1—12 (summary), 253—76 (tabular presentation of major activities); David Wise and Thomas Ross, *The Espionage Establishment* (New York: Bantam, 1968)。

台(Radio Free Europe)和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①其他秘密传播手段,例如使用政治宣传气球;^②美国在危地马拉、伊朗和其他地区^③政变时期使用的心理战技术;美国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④选举期间使用的心理战;意图扰乱或鼓动共产主义阵营叛乱的举动,^⑤在美国国内使用的心理战;^⑥研制和使用影响精神的药物,包括迷幻药;^⑦对前苏联以及中国政治宣传的回应;^⑧情报预估方面使用心理战的影响;^⑨对前苏联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

① Marchetti and Marks, *The CIA*, p. 174; Sig Mi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The Story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New York: Praeger, 1983).

② "Company-Made Balloons Aid 'Winds of Freedom' Effort," *The Modern Millwheel* (General Mills employee publication), September 1951.

③ John Ranelagh, *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p. 260—69.

④ James Mi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1940—1950: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Stabiliz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William Blum, *The CIA: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Zed, 1986), pp. 23—31, 130—33, 166—70; Arnold Cortesi and "Observer," "Two Vital Case Histories," in Lester Markel (e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9); Robert Holt and Robert van de Velde,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159—205. 1975年,众议院情报问题委员会准备了一份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操纵意大利和法国选举的非常重要的报告。中央情报局和白宫成功地阻止了这项研究的正式出版,但是一份副本被泄漏到媒体,并于1976年2月15日和22日出版的“乡村之声”补编中出版。参见2月16日报告第86页,“Special Supplement: The CIA Report the President Doesn't Want You to Read,”有关干预意大利大选的讨论,重要的原始记录可以从这里找到:the U. S.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 Italy.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⑤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New York: Morrow, 1986), pp. 40—60. 还可参见 Blum, *The CIA*, 以及 Ranelagh, *The Agency*。

⑥ Jay Peterzell, "How U. S. Propaganda Has Fooled Congress," *First Principles* 8, no. 3 (1983) 1; Christopher Simpson, *Blowback*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7), pp. 125—37, 218—19.

⑦ Martin Lee and Bruce Shlain, *Acid Dreams: The CIA, LSD and the Sixties Rebell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5); Marks,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⑧ Richard F. Staar (ed.), *Public Diplomacy: USA versus USS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Mi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关于苏联在此问题上的评论,可以参见 A. Panfilov, *Broadcasting Pirates: Outline of External Radio Propaganda by the USA, Britain and FRG*, translated by Nicholas Bobrov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1).

⑨ John Prados, *The Soviet Estimate, U. S.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Russian Military Strength* (New York: Dial, 1982), pp. 38—50; Peterzell, *How U. S. Propaganda Has Fooled Congress*; Simpson, *Blowback*; Kurt Glaser, "Psychological Warfare's Policy Feedback," *Ukrainian Quarterly* 9 (1953).

开展的研究；^①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普通情报任务所产生的作用。^②

1945至1960年间,还出版了一套颇有意味的心理战理论丛书,内容和基调与上述提到的后期史料和回忆录不同。冷战早期发表的作品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时会特地提到这些技术,^③或从“正统”角度辩称心理战是对抗前苏联必不可少的武器。^④其他作品中也指出过,《公共舆论季刊》与当时的学术交流刊物中^⑤发表了不少有关心理战的作品。这些作品集成几个珍贵的案例和手册,供作者、顾问和该领域活跃的政治人物概览。^⑥

① Clyde Kluckhohn, Alex Inkeles, and Raymo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Cambridge, MA: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54),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33(038)—12909; Alexander Dallin, Ralph Movrogordato, and Wilhelm Moll, *Partis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Popular Attitudes under the German Occupation* (Washington, DC: U. S. Air Force, 1954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ar Documentation Project, Columbia University]). 也可参见 Tami Davis Biddle, “Handling the Soviet Threat: Arguments for Preventative War and Compellence in the Early Cold War Perio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988。

② Walter Laqueur, *A World of Secrets: The Uses and Limits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Carleton Mabey, “Margaret Mead and Behavioral Scientists in World War II: Problems of Responsibility, Truth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3 (January 1987): 3—13; 还可参见 Winks, *Cloak and Gown*。

③ Lerner, Sykewar; Daniel Lerner (ed.), *Propaganda in War and Crisi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51); Samuel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3—53; 也可参见上文关于 the War Documentation Project 研究的第 33 条引用。

④ Lerner, Sykewar; Kluckhohn, Inkeles, a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⑤ 可参见《公共舆论季刊》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的专刊 (Winter 1952—53)。

⑥ 主要案例文本(以时间顺序)包括: Bruce Lannes Smith, Harold Lasswell, and Ralph Casey, *Propaganda,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aul Linebarg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8; rpt. Washington, DC: Combat Forces Press, 1956); Lerner, *Propaganda*; Wilbur Schramm, *FEC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Baltimore: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2);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Ithiel de Sola Pool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Project], 1963)。更现代的编纂材料包括,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Case Studies of Military Application*, 2 vols., edited by Ronald McLauri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ontract no. 525—7—1, April 1976); 由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勒纳(Daniel Lerner)和斯皮尔(Hans Speier)等人编纂的三卷研究资料: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0); Carnes Lord and Frank Barnett (eds), *Political Warfar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ul A. Smith, *On Political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心理战方面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献资料很多。最早的资料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即“心理战”一词进入英语之前^①。

1951—1952年间,社会科学研究局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②签约,授意齐特拉·史密斯整理出版了心理战资料汇编,这或许是最详尽的汇编。此书后由兰德公司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③稍作修改后出版。

小迈伦·史密斯(Myron Smith Jr.)整理出版了两份较新的心理战文献。^④他的作品包括二战期间这类行动的190条引述,以及一份1945—1980年间668条引述的二手资料集。后一项文献集可以按研究领域和国家分类。“社会文献”电脑数据库包含了大量外文和当代引述。^⑤前国务院历史学家尼尔·皮特森(Neal Peterson)最近出版了一份有关情报议题和冷战问题文集的注释参考书目,大篇幅回顾了近十年来出版的冷战机密。^⑥

较新的一份注释版的商业和学术交流研究参考书目也值得注意,这对未来的心理战行动设计十分有用。书目由国防部副部长授意,由罗纳德·麦克卢林(Ronald McLuarin)、约翰·马丁(L. John Martin)和克里

① Harold Lasswell, Ralph Casey, and Bruce Lannes Smith, *Propaganda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35; r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这个文本很好地超越了“媒体”关于宣传的概念,考虑了暴力、社会管理和情报机构的应用,参见 pp. 43—49, 196—203, 230—34。

②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hitra Smith,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7, project 819,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相关材料还可参考 Vera Rile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Operations Research* (Chevy Chase, MD: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53);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of External Research, *Government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65)。

③ Bruce Lannes Smith and Chitra Sm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Opi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④ Myron J. Smith, *The Secret Wars: A Guide to Sources in English*, 2 vols.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80, 1981)。

⑤ 我检索社会文件数据库后得出有关“心理战”的三条研究引用结果,包括一条将智利政变当作“反革命心理战原型”的研究。参见 Silvia Molina-Vedia, “El Caso Chileno Como un Prototipo de Guerra Psicologica Contrarevolucionaria,”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iticas y Socioles* (October-March 1976—77)。

⑥ Neal Peterson, “Recent Intelligenc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1945—196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of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988。

什纳莫迪 (Sriramesh Krishnamurthy) 为阿伯特公司 (Abbott Associates) 共同完成。^①

由于文献源于 1945—1960 年间, 上述记录并未完整列出心理战所有文献, 但已明确圈定心理战范围和基本趋势。

1945—1960 年间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

近十年来, 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在学界是一个热门话题。当下, 该领域的大部分文献着重关注的是对业内影响深远的观念的发展历程, 而不注重研究该观念诞生的社会背景。于是, 甚少有人钻研大众传播研究机构的由来与资金供应问题, 因此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除了康沃斯 (Converse)^② 和彼得曼 (Bideman) 及克劳福德 (Crawford)^③ 等人在该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外, 学界很少有人关注美国心理战对二战后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此话不假, 当下部分大众传播理论的课本对心理战只一笔带过, 有些甚至根本不提。^④

该领域基于大众传播的历史学研究, 先驱人物有阿尔比格^⑤、巴顿^⑥、

① Ronald McLaurin, L. John Martin, and Sriramesh Krishnamurth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Audience Effects of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s, A Selec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bbott Associates, Springfield, VA, July 1988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contract no. MDA-903-88-C-0048).

②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③ Albert Bide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④ 参见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1987), 缺乏关于心理战的参考文献, 关于宣传也是一笔带过。也可参见 John C. Merrill, *Global Journalism: A Survey of the World's Mass Media*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1983), 既没提心理战也没有提宣传。这个主流以外的例外可参见 Garth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2nd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2).

⑤ William Albig, "Two Decades of Opinion Study: 1936—1956," *POQ* 21, no. 1 (Spring 1957): 14—22. 除非特别提到, 这一章当中所有无归属的文章都曾在《公共舆论季刊》中出现。

⑥ Allen Barton, "Paul Lazarsfeld and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History* (October 1979): 4—44.

班内特^①、贝雷尔森^②、布卢姆勒^③、查菲^④、查菲和霍克海默(Chaffee and Hochheimer)^⑤、康沃斯^⑥、切特罗姆^⑦、迪利亚^⑧、丹尼斯^⑨、尤劳^⑩、吉特林^⑪、豪尔^⑫、哈尔德^⑬、卡茨^⑭、拉扎斯菲尔德^⑮、劳瑞和得福乐尔(Lowery and DeFleur)^⑯、迈克里奥德和布伦勒(McLeod and Blumler)^⑰、罗杰

① Tony Bennett, "Theories of the Media, Theories of Society," in Michael Gurevitch and Tony Bennett(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1982), pp. 30—55.

② Bernard Berelson, "The Present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 no. 2 (Summer 1958): 178, and in more developed form,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no. 1 (Spring 1959): 1—5.

③ Jay Blumler, "European-American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verett Rogers and Francis Balle(eds.), *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in Western Europe* (Norwood, NJ: Ablex, 1985), pp. 185—99.

④ Steven Chaffee(ed.),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to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36(October 1974).

⑤ Steven Chaffee and John Hochheimer, "The Beginning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rigins of the 'Limited Effects' Model," in Michael Gurevitch and Mark Levy(eds.), *Mass Communications Yearbook*, vol. 5(Beverly Hills: Sage, 1985).

⑥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⑦ Daniel 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pp. 122—46.

⑧ Jesse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harles Berger and Steven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pp. 20—98.

⑨ Everette Dennis, "Whence We Came: 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Nancy Weatherly Sharp(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Challeng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20.

⑩ Heinz Eulau, "The Columbia Studies of Personal Influen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 no. 4(May 1980): 207—28.

⑪ Todd Gitlin,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 no. 2 (1978): 205—53.

⑫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Gurevitch and Bennett Cultures,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 56—90.

⑬ Hanno Hardt, "Comparative Media Research: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meric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5(June 1988): 129—46.

⑭ Elihu Katz,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ince Lazarsfeld," 51(1987): 525—45.

⑮ Paul Lazarsfeld,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Action: An Intellectual Odyssey [1958],"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2).

⑯ Shearon Lowery and Melvin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York: Longman, 1983).

⑰ Jack McLeod and Jay Blumler, "The Macrosocial Level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in Charles Berger and Steven Chaffee(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7), pp. 271—322.

斯^①、施拉姆^②、斯普洛尔^③、斯托弗^④和坦卡德^⑤，同时也基于对美国联邦政府和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此领域的先驱包括比尔斯^⑥、比德尔曼和克劳福德(Biderman and Crawford)^⑦，克劳福德和里昂(Crawford and Lyons)^⑧，刚泽尔^⑨、霍特威茨^⑩、霍特威茨和卡茨(Horowitz and Katz)^⑪，国会图书馆^⑫，里昂^⑬，麦克卡特尼^⑭，普尔^⑮等。

① Everett Rogers, "Contributions and Criticisms of Diffusion Research," in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3rd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83).

② Wilbur Schram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no. 3(Summer 1983); 以及 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verett Rogers and Francis Balle(eds.), *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in Western Europe*(Norwood, NJ: Ablex, 1985), pp. 200—211.

③ J. Michael Sproule, "Progressive Propaganda Critics and the Magic Bullet Myth,"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September 1989): 225—46.

④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er*, Vol. 1, pp. 3—54, 借此可以看到斯托弗对美国军队研究领域的高度影响。

⑤ James Tankard, "Wilbur Schramm: Definer of a Field," *Journalism Educator* A3, no. 3 (Autumn 1988): 11—16.

⑥ Ralph Beals, *Politics of Social Research*(Chicago: Aldine, 1969).

⑦ Biderman and Crawfor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Albert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The Basis of Allocation to Social Scientific Work," paper presented to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69, 现存于 BSSR Archives, series V, box 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Albert Biderman and Elisabeth Crawford, "Paper Money: Trends of Research Sponsorship in American Sociology Journals,"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Paris), (February 1970): 51—77.

⑧ Elisabeth Crawford and Gene Lyons, "Foreign Area Research: A Background State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June 1967). 还可参见 Elisabeth Crawford and Albert Biderman,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New York: Wiley, 1969).

⑨ Irene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5).

⑩ Irving Louis Horowitz(ed.), *The Use and Abuse of Social Science*(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71); Irving Louis Horowitz(ed.),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ject Camelot*(Cambridge: MIT Press, 1974).

⑪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James Everett Katz,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Praeger, 1975).

⑫ 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U. S. Ideological Effor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grams*, published as a committee print by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88th Cong., 1st sess. (Washington, DC: GPO, January 1964).

⑬ Gene M. Lyons, *The Uneasy Partnership: Social Science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 更近的一个分析可以参见 Richard Nathan, *Social Science in Government: Uses and Misu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⑭ James McCartney, "On Being Scientific: Changing Styles of Presentat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st* 5(February 1970): 30—35.

⑮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for Governments," *Background* 10, no. 2(August 1966): 111—22.

虽然这些材料在强调重点、细节程度与政治视角上各有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美国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各个阶段”。诚然这种阶段概念有可能会误导人,^①但仍不失为有用的理论框架,业内学科带头人可用此框架探讨该领域的发展历程。

一般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始于对大众传播在宏观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早期探究,通常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至1940年左右。包括涂尔干(Durkeim),托尼斯(Tonnies)和缅因(Maine)在内的思想家都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②“大社会”模型以及其深浅层的引申意义和这一研究关系十分密切;该领域学者基本认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作用,但对传播所处的社会之特征与传播可提供的生活质量却莫衷一是。^③

大约在1945年,美国国内兴起了一种定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极其注重实效,关注的是“中层”传播效果,它很快取代了宏观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研究方法。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方法还是业内无可争议的“主流范式”。^④大部分大众传播史学者认为,1945年后的这股思潮至少体现出了三个特点。首先,领域内受资助的研究致力于揭示和量化传播行为的“影响”。研究所采取的社会科学工具基本上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借鉴来的,包括调查问卷、内容分析和实验或者准实验研究等。

① 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动态似乎是理论的整合和接受,而不是新思想的简单表达或“发现”。这种区分很重要,部分原因是前一种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域内权威的承认。“阶段”概念倾向于淡化在接受理论时所涉及的政治化过程,倾向于设想出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进步和规范化过程。一些明显的例证可以展现“接受”(而不是简单的发现)的重要性:Lowery和De Fleur认为,Lazarsfeld在1955年提出的主要群体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的著名理论,实际上是Rothlisberger和Dixon以及其他人在早些时候就发现但尚未完全整合的工作。Lowery and Defleur, *Milestones*, pp. 180—82。同样,McLeod和Blumler指出,“大众社会”作为一个术语和一个理论类别,从来没有被那些最常被归类为这个理论派别的理论家采用。“大众社会”实际上是1959年的相关研究对早期理论家的分类,这些理论家具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而这个理论标签至少部分地是为了辩论的目的而构建的。(McLeod and Blumler, “The Macrosocial Level,” p. 282),然而,“大众社会”这个理论标签在建构大众传播理论的“阶段”时仍然被广泛使用。

② McLeod and Blumler, “The Macrosocial Level,” p. 282.

③ Ibid.

④ Gitlin, “Media Sociology.”

第二,“两级传播”、“参照群体”和“有限效果”传播行为模型逐步兴起。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众媒体信息对个体行为相对有限且短暂的影响,专员采用具体研究方法将研究结果记录在案,以便进一步促进研究。在处理媒体对于宏观社会或意识形态的作用上,以上方法倾向于将次要可量化的“微观”效应推广到“宏观”层面。第三,1945年以后,传播研究形成了独立特定的学术领域,该领域包括专业人员、机构身份、较为明晰的研究计划,以及一套储量可观的业内常识体系。该领域形成的具体时间尚不明确,通常认为是1949到1955年之间^①。

还有几个问题在一般研究中不太常见,但在杜威(Dewey)^②、卡莉(Carey)^③、豪尔(Hall)^④、比德尔曼(Biderman)和克劳福德(Crawford)^⑤等人的研究与本文中讨论过。那就是,商界、政界和军事团体迫切需要新技术维持和提高现有的社会影响力,这些人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充足资金,促使定量传播研究发展为一个狭小的实证研究领域。^⑥ 美国政府的心理战项目就是大众传播理论的重要资助者,特别是这些年,大众传播成为了独特的研究领域。^⑦ 尽管资助者不能决定大众传播的研究结果,但他们常常可以决定哪些问题需受到关注,继而决定提供或中断大规模研究所需的资源,从而间接影响了对于“领导人”和“权威”的选择。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就是,传播作为一种固定模式或分享行为的概念消失了——顺便一提,这也是杜威(Dewey)思想^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巴洛克式的新奇概念,即认为传播是一个说服和胁迫的高度实用性过程。^⑨

① 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pp. 131—39;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54—73; McLeod and Blumler, “The Macrosocial Level,” p. 284.

② John Dewey cited in James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22.

③ Ibid., pp. 13—68.

④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 pp. 59—65.

⑤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pp. 29—55.

⑥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 pp. 59—62.

⑦ Biderman and Crawford,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pp. 32—38, 45—46;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deral Funds 1953*, pp. 37—40.

⑧ Cited in Carey, *Communication*, p. 22.

⑨ Ibid., an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 pp. 59—62.

主要人物的传记资料

本文将首先介绍 1945 至 1960 年间四位活跃在心理战项目的大众传播学者。他们是哈德利·坎特里尔,哈罗德·拉斯韦尔,丹尼尔·勒纳,以及威尔伯·施拉姆。他们每个人都在大众传播、心理战、政治事务等领域留下了一套蔚然可观的理论著述。

阿尔伯特·哈德利·坎特里尔(通常称作哈德利·坎特里尔)曾以独自或合作的方式,为专业期刊写作或编辑超过 24 部成书篇幅的学术作品^①以及 120 篇学术出版物。^②坎特里尔发表了一部富有哲思的回忆录,^③有关其研究事业的内容可以从许多正规渠道^④搜索到。坎特里尔最为人乐道的功绩是他把心理学应用到了政治和社会事务研究中,以及他在舆论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⑤坎特里尔的长期合作伙伴劳埃德·A·弗利也值得一提,他们二人共同为国际社会研究学会^⑥效力,并创作了多

① 总数来源于坎特里尔的研究: *Who Was Who*, Vol. 5, p. 113, in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55, pp. 211—12, 和马里兰大学 GEAC 电子化参考文献系统。主要涉及心理战、宣传和大众传播理论的参考书籍有: *The Psychology of Radio* (with Gordon Allport, 1935); *The Invasion from Mars* (1940);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1941); *Gauging Public Opinion* (contributing editor, 1944); *Understanding Man's Social Behavior* (1947); *The "Why" of Man's Experience* (1950); *Public Opinion, 1935—1946* (1951); *How Nations See Each Other: A Study in Public Opinion* (with William Buchanan, 1953); *The French Left* (with David Rodnick, 1956); *The Politics of Despair* (1958); *Soviet Leaders and Mastery over Man* (1960); *Human Na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s* (1961); *The Pattern of Human Concerns* (1965);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1967); and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Americans* (with Lloyd Free, 1967)。

② "Cantril, [Albert] Hadley,"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55, p. 212.

③ Hadley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④ *Obituaries on File* (1979), Vol. 1, p. 93; *Who Was Who*, Vol. 5, p. 113;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55, pp. 211—12.

⑤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⑥ *Ibid.* See also Howland Sargean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December 15, 1970,"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部著作。^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是上述作者中最多产的一位。1924至1980年间,他创作或编辑了近47部成书篇幅的学术作品,部分作品甚至有三四个版本^②。应该说,拉斯韦尔最伟大的贡献是把政治事务及媒体变革动力学转化成了标语性公式,为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③的实用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首度印刷后再版了3次)得到广泛认可,成为现代大众传播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④

丹尼尔·勒纳是拉斯韦尔忠实的合作伙伴,他们二人创作或共同编

① Free and Cantril,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Americans*. 劳埃德·弗利(Lloyd Free)是一个共同作者,被坎特里尔认为是一名对许多国际社会研究机构做出过主要贡献的人,他的作品包括 *Attitudes, Hopes and Fears of Nigeri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Six Allies and a Neutral*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还有坎特里尔自己写的 *The French Left* (1956), *The Politics of Despair* (1958), 和 *Soviet Leaders and Mastery over Man* (1960)。

② 这里汇集的论著来源于拉斯韦尔的研究列表: *Current Biography* (1947), pp. 75—77, *Who's Who* (1976—77), pp. 1833—34, 和马里兰大学 GEAC 电子化参考文献系统。这些文献主要涉及心理战、宣传和大众传播理论: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1927);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 *Propaganda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ith Bruce Lannes Smith and Ralph Casey, 1935);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1936); *Propaganda,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with Bruce Lannes Smith and Ralph Casey, 1946); *Study of Power* (1950); *World Revolution in Our Time* (1951);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1951);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lites* (1952);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ymbols* (with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Daniel Lerner, 1952); *The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 (with Daniel Lerner, 1951);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Studies in Coercive Ideological Movements* (with Daniel Lerner, 1966); *Worl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1970);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3 vols. (edited, with Daniel Lerner and Hans Speier, 1980)。以不同版本呈现的书籍包括: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1927, 1938, 1971, 1972);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 1934, 1960, 1969); 以及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1936, 1950, 1958)。

③ 例如:“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和“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the study of who says what through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至少直到1980年拉斯韦尔都一直赞同这个公式)。也包括拉斯韦尔有关“工作”(tasks)的描述对经典结构功能主义所做的贡献,还有他关于媒体功能的论述可以在下述文献中找到: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70, 191。拉斯韦尔式传播理论的简要版本可参见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Vol. I, “Introduction”。

④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70, 191; Roger Wimmer and Joseph Dominick, *Mass Media Research* (Belmont, CA: Wadsworth, 1987), pp. 6, 16; *Current Biography* (1947), pp. 375—77。

辑了不下 4 部作品，^①每一部均以巧妙的方式阐述了宣传与心理战的关系。勒纳一生出版了不下 18 部成书篇幅的学术作品^②，还是大量的期刊论文^③。相比坎特里尔、拉斯韦尔，勒纳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更加关注心理战、政治宣传，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④ 1945 至 1980 年间出版的有关心理战的主要文献集，勒纳几乎均参与创作、编写或有所贡献。^⑤

威尔伯·施拉姆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研究的关键人物。^⑥ 然而，施拉姆作为心理战的承办者、执行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却并不广为人知。上世纪 50 年代，施拉姆主要服务于美国空军、情报局、国防部，也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宣传组织自由欧洲电台服务，以此维持生计与学术名望。^⑦

① 勒纳和拉斯韦尔合作的作品包括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ymbols* (with Ithiel de Sola Pool, 1952); *The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 (1951);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Studies in Coercive Ideological Movements* (1966); and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3 vols. (edited, with Hans Speier, 1980)。

② 数据来源于 *Contemporary Authors* (New Revision Series), Vol. 6, p. 292, and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s GEAC computerized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system。

③ *Contemporary Authors*. Vol. 6, p. 292.

④ *Ibid.*

⑤ 例子包括 *Sykewa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Germany* (1949, reissued 1971); *Propaganda in War and Crisis* (editor, 1951);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with Lucille Pevsner, 1958)。

⑥ Tankard, "Wilbur Schramm," pp. 11—16; Chaffe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⑦ 有关美国空军的研究资料参见: John W. Riley and Wilbur Schramm, *The Reds Take a City: The Communist Occupation of Seou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1); John Riley, Wilbur Schramm, and Frederick Williams, "Flight from Communism: A Report on Korean Refugees," 15, no. 2 (Summer 1951): 274—86; Wilbur Schramm and John Riley, "Communication in the Sovietized State, as Demonstrated in Kore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951): 757—66。《公共舆论季刊》(p. 274) 上的文献证明了这些研究受美国空军大学的人力资源研究机构资助。关于美国新闻署的情况参见: Wilbur Schramm, "The Soviet Concept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Hideya Kumata and Wilbur Schramm, *Four Working Papers on Propaganda Theory* (Urbana, IL: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55)。可以看到封面文章上关于得到 USIA contract 1 A-W-362 资助的致谢; Wilbur Schramm (chair), *U. S. Information Agency: A Program of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USIA, 1953); Wilbur Schramm (ed.),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4); 参见 USIA 资助本文的致谢前言。本文影响力使得麦克劳德 (Jack McLeod) 和布鲁姆勒 (Jay G. Blumler), 也包括其他人, 将 1954 年的施拉姆作品 ("The Macrosocial Level," p. 284) 的出版界定为传播研究形 (转下页注)

此处谈及的四位作家——坎特里尔、拉斯韦尔、勒纳以及施拉姆(Schramm)——当然不能代表冷战早期心理战项目的所有优秀社会科学家与大众传播学者。其他杰出人才虽然对项目的参与度不同,但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包括库特·巴克^①、爱德华·巴雷特^②、雷蒙德·鲍尔^③、罗伯特·鲍尔^④、阿尔伯特·彼得曼^⑤、斯坦利·比格曼^⑥、伦纳德·

(接上页注)成自主学科的标志。Wilbur Schramm,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Voice of America lecture series); 还可参见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34。

有关国防部资助的情况参见: Schramm, *FE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see also Chaffee, "The Contributions of Wilbur Schramm," p. 31。

有关自由欧洲电台资助的情况参见: Robert Holt, *Radio Free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8), p. 236; Whelan, *Radio Liberty*, pp. 299—301。

①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Kurt Back),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echnical Report No. 1,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AF 18(600)1797; now in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project 32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② Edward Barrett, *Truth Is Our Weapon*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53). 巴雷特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老兵、美国国外宣传部助理秘书,《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创立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院长;参见 "Edward W. Barrett Dies; Starte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6, 1989。

③ Kluckhohn, Inkeles, a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U. S. Air Force. 合同编号: 33(038)42909。这个文本最终以 Raymond Bauer, Alex Inkeles, and Clyde Kluckhohn, *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Themes* (New York: Vintage, 1956) 得以出版,并作为大学教材广泛使用。

④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Robert Bower), "Kazakhstan and the Kazakhs: Target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 working paper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ffice, December 1954,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5, project 649,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⑤ Albert Biderman, "Social-Psychological Needs and 'Involuntary' Behavior as Illustrated by Compliance in Interrogation," *Sociometry* (June 1960); 120—47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AF 18 [600]1797)。在人类生态学调查方面,比德曼承认这项研究也得到了人类生态调查学会的部分支持。据后来的报道,这个学会是中央情报局用以资助研究项目的一个通道;参见 Marks,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pp. 133n, 137, 139n, 147—67; 关于比德曼的情况,也可参见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Albert Biderman et al.),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Captivity Behavior*, BSSR Research Report 339—1 (U. S. Air Force contract no. AF 49 [638] 727), now at BSSR Archives, Notes 187 series II, box 14, project 339,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⑥ 社会科学研究局为美国新闻署研究与评估办公室准备的材料(项目负责人:斯坦利·比格曼)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1953年11月, BSSR Archives, series II, box 4, project no. 64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pecial Collections, College Park。

科特雷尔^①、利奥·克雷斯皮^②、威廉·多尔蒂(William Daugherty)^③、W·菲利普·戴维森^④、伦纳德·杜伯^⑤、穆雷·戴尔^⑥、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⑦、劳埃德·弗利^⑧、乔治·盖洛普^⑨、亚历山大·乔治^⑩、罗伯特·霍尔特^⑪、

① 伦纳德·科特雷尔曾于1952—1953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心理和非常规战争顾问委员会主席(参见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 xi)。另可参见 John Riley and Leonard Cottrell, "Research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27, no. 1(Spring 1957): 147—58; 以及 Leonard Cottrell, "Social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Sociometry* 23, no. 2 (June 1960): 103—19。

② Leo Crespi, "Som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USIA (Unclassified Abstract)," in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ymposium proceedings, March 1962), pp. 317—18; 克雷斯皮曾任美国新闻署调查研究分部主任。

③ Daugherty and Janowitz, *Casebook*。有关多尔蒂在心理战方面更加全面的记叙, 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 xi。

④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xvi, 157ff。另见 W. Phillips Davison, "Alliances," in Ithiel de Sola Pool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 26—44;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contract no. 1354(08)。戴维森20世纪50年代受雇于兰德公司; 参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Research in Political Warfare" (RAND P—226);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Foreign Policy" (with Hans Speier, P—615); "The Role of Mass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Berlin Blockade" (P—665); "A Note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Mass Meetings in a Mass Communications Society" (P—812); and "Power—The Idea and Its Communication" (P—1869)。另见 author's interview with W. Phillips Davison, November 14, 1990。

⑤ Leonard Doob,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 no. 4 (August 1947): 649—67; Leonard Doob, "The Strategies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POQ* 13, no. 4 (Winter 1949): 635—44。

⑥ Murray Dyer, *The Weapon on the Wall: Rethinking Psychological Warfa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戴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运营研究办公室的雇员。

⑦ Harry Eckstein, "The Internal War: Problem of Anticipation," in Ithiel de Sola Pool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 102—47。埃克斯坦受雇于 MIT 国际研究中心, 是多个暴动战争研究的专家委员。

⑧ Lloyd Free "General Premises for VOA," in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p. 364—68。参见 p. xiii for biographical details concerning Free's work。

⑨ George Gallup, "The Challenge of Ideological Warfare," in John Boardman Whitton (ed.),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3), pp. 54—56。

⑩ Alexander George, *Propaganda Analysis: A Study of the Inferences Made from Nazi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1959)。

⑪ Holt, *Radio Free Europe*; Holt and van de Velde,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Robert Holt, "A New Approach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John Boardman Whitton (ed.),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3), pp. 41—53。

卡尔·霍夫兰^①、亚历克斯·英克尔斯^②、欧文·詹尼斯^③、莫里斯·简诺维兹^④、约瑟夫·克拉珀^⑤、克莱德·克拉克洪^⑥、克劳斯·诺尔^⑦、熊田英哉(Hideya Kumata)^⑧、保罗·拉扎斯菲尔德^⑨、亚历山大·雷顿^⑩、

① 有关霍夫兰在军事心理战承包方面的负责情况,可参见“Psychological News and Notes,”*American Psychologist* 3, no. 12(December 1948): 559;详情参见 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see Lyle Lanier,“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 4, no. 5(May 1949): 127ff, 131—33。

② Alex Inkeles, *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Russia: A Study in Mass Persua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也可参见 Kluckhohn, Inkeles, a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 xii。

③ Irving Janis,“Persuasion,” in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p. 609—24。See p. xvi for biographical details。

④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⑤ Joseph Klapper and Leo Lowenthal,“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Evaluation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15, no. 4(Winter 1951—52): 651—62。克拉珀受雇于美国新闻署研究与评估局,是洛文塔尔的下属。

⑥ Kluckhohn, Inkeles, and Bauer,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rengths*。有关克拉克洪领导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在心理战中角色的讨论可参见 Biddle,“Handling the Soviet Threat”。

⑦ Klaus Knorr,“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in Ithiel de Sola Pool(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 75—101, 诺尔是 MIT 国际研究中心中的核武器专家。

⑧ Kumata and Schramm, *Four Working Papers on Propaganda Theory*。See cover statement for acknowledgment of USIA contract 1A-W-362 as sponsor。熊田英哉也是格林·贝雷茨设在布莱格心理战学校的导师。参见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 xiii。

⑨ 拉斯菲尔德在美国新闻署和海军研究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p. 290; Bruce Lannes Smith,“Trends in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Opinion,” 20, no. 1(Spring 1956): 191;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Stanley Bigman),“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Robert Merton and Paul Lazarsfeld,“Studies in Radio and Film Propaganda,” in Robert Merton(ed.),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7), pp. 509—28; Paul Lazarsfeld,“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70ff; Paul Lazarsfeld,“The Policy Science Movement(An Outsiders View),” *Policy Sciences* 6(September 1975): 211—22; Paul Lazarsfeld Oral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recorded November 1961—August 1962。另见 Inkeles, *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Russia*, p. xiii。

⑩ Alexander Leighton, *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utton, 1949)。

纳森·莱特斯^①、保罗·M·莱因巴格(Paul M. Linebarger)^②、利奥·洛文塔尔^③、L·约翰·马丁^④、玛格丽特·米德^⑤、杰西·奥兰斯基(Jesse Orlansky)^⑥、扫罗·帕多佛(Saul Padover)^⑦、伊锡尔·德·索

① Nathan Leit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on Its Change of Policy", 以及 Nathan Leites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Respons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to Frustration," both in Harold Lasswell and Nathan Leite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49); Nathan Leites and Ernst Kris, "Trends in Twentieth Century Propaganda," in Lerner, *Propaganda in War*, pp. 39—54; and Nathan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3)。莱特斯是兰德公司的社会科学雇员。

② Paul Linebarg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2nd ed. (Washington, DC: Combat Forces Press, 1954); Paul Linebarger, "Warfare Psychologically Waged" in Lerner, *Propaganda in War*, pp. 267—73;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xvi, 79。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 是国际高级研究院的教授。参见 Lerner, *Propaganda in War*, p. viii。有关莱因巴格负责的中央情报局探员心理战培训项目, 可以参见 Joseph B. Smith, *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 (New York: Ballentine, 1976), pp. 74—103。

③ Leo Lowenthal (guest editor), "Special Issue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16, no. 4 (Winter 1952—53); Joseph Klapper and Leo Lowenthal, "Contributions of Opinion Research to Evaluation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15, no. 4 (Winter 1951—52): 651—62。For Lowenthal's own version, see Leo Lowenthal, *An Unmastered Past: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edited by Martin J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81—110。

④ L. John Marti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L. John Martin (ed.), "Propagand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special issue) 398 (1971); L. John Martin, Ronald D. McLaurin, and Sriramesh Krishnamurthy,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rogram Evaluation*; Ronald D. McLaurin, L. John Martin, Sriramesh Krishnamurthy, et a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Audience Effects of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s: A Selec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both prepared for the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Policy), contract no. MDA—903—88—C—0048, 1988。另见 Martin's contributions to Lasswell, Lerner, and Speier, *Propaganda*, Vol. 3 pp. 249—94。马丁曾在 USIA 担任数个职位, 包括海外研究协调员和项目分期部主任; 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 xix, for biographical data。

⑤ Mabee, "Margaret Mead," pp. 3—13。

⑥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 xvi。

⑦ Saul Padover and Harold Lasswell,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Strategy of Soviet Propaganda*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51); Saul K. Padov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an Age of World Revolu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 (1951): 3—12。帕多佛曾供职于战略情报局, 二战期间被派往欧洲负责心理战, 随后成为纽约新学院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和院长; 参见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 xiii。

勒·普尔^①、德威特·普尔^②、白鲁恂^③、约翰·W·赖利^④、卡罗兰·沙特尔^⑤、奇特拉·史密斯^⑥、汉斯·斯皮尔^⑦、塞缪尔·斯托夫^⑧、拉尔夫·

① Nathan Lienes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Respons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to Frustration," in Harold Lasswell and Nathan Leites (eds.), *Language of Politics* (New York: George Stewart, 1949), p. 334;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xvi, 199ff; Ithiel de Sola Pool, "Social Science in the Nuclear Age," in Ithiel de Sola Pool (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 1—25;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Changing Soviet Union," in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p. 1043—50, (see p. xxi for biographic data);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② Mi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pp. 24, 41, 60, 259; see also "Poole, Dewitt Clinton," *Current Biography* 1950, pp. 461—63.

③ Lucian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白鲁恂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教授,经常担任有关亚洲心理战的政府部门顾问,也受益于一些政府情报合同,合同主要涉及共产主义在马来西亚、缅甸和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活动情况。详情可参见白鲁恂的自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Report of a Country Team Seminar, June 11—July 13, 1962 (Washington, DC: 1962)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④ Riley and Schramm, *Reds*; John Riley, Wilbur Schramm, and Frederick Williams, "Flight from Communism: A Report on Korean Refugees," *POQ* (Summer 1951): 274; Schramm and Riley, "Communication in the Sovietized State"; Riley and Cottrell, "Research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赖利也曾是国防特别行动顾问委员会秘书局副局长;参见 *Who's Who* (1974—75), p. 2589.

⑤ 曾任美国空军大学人力资源研究院研究负责人(1952—53)、军队服务顾问和承包商(1954—59)、国防部防卫和工程研究负责人办公室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部主任(1961—64)和其他职位;参见 *Who's Who* (1974—75), p. 2792。也可参见 Carroll Shartle, "Selected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ograms in Social Science," in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p. xvi, 322ff.

⑥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hitra M. Smith,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⑦ Hans Speier and Ernst Kris, *German Radio Propagan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Hans Speier, "The Future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12, no. 1 12(1948): 5—18; Hans Speier, "Morale and Propaganda," "War Aims in Political Warfare,"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Reconsidered" in Lerner, *Propaganda in War* pp. 3—25, 69—89, 463—91; Hans Speier,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Global Conflict* (Industrial College of the Armed Forces, 1955); Lasswell, Lerner, and Speier,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斯皮尔为兰德公司所做的有关国际冲突中的心理问题的内容有:"Psychological Warfare Reconsidered"(1951, P—196);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lite vs. Mass"(1951, P—270);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Foreign Policy"(with W. Phillips Davison, 1954, P615)。斯皮尔成立并最终领导了二战期间美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公司,随后又成为战争信息办公室的高级主任;他于1948—1960年间,任兰德公司社会科学负责人,并于1960到1969年间任其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参见 *Contemporary Authors*, New Revision Series, Vol. 9, pp. 463—64; Vol. 2, p. 530.

⑧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Stouffer, "A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Cumulative Scales," Samuel Stouffer, "1665 and 1954," 18, no. 3 (Fall 1954): 233—38.

K·怀特^①以及威廉姆·R·杨^②。

机构史料

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的组织机构和美国心理战的操作运行经历了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发展过程。因此,有必要弄清这两大机制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让·康沃斯^③为应用社会研究所、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撰写的机构历史,文笔俱佳,也不难找。这些机构均是大众传播资助金发放中心,也是1945年至1960年心理战相关各类研究的主导机构。另外,有关兰德公司^④、BASR^⑤、NORC^⑥、ISR^⑦、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

① Ralph K. White, "The New Resistance to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16, no. 4 (Winter 1952) 539—50. 怀特后来在USIA特殊项目分部任职;参见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The U. S. Army's Limited-War Mission*, p. 338。

② U. S. Army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psychological warfare research team in Korea (1951—52); William R. Young, "GULAG Slavery Inc.: The Use of an Illustrated Map in Printed Propaganda," in Daugherty and Janowitz,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p. xiv, 597—602。

③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pp. 162—415 passim。

④ RAND Corporation, *RAND: 25th Anniversary Volum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 n. d. [1974?]); Bruce L. R. Smith, *The RAND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RAND Corporation, *Index of Selected Publications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Vol. 1 (Santa Monica, CA: author, 1962); and RAND's quarterly periodical, *Selected Abstracts*。

⑤ Barton, "Paul Lazarsfeld"; Eulau, "The Columbia Studies"; Merton and Lazarsfeld, "Studies in Radio and Film Propaganda"; Judith Barton (ed.), *Guide to 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Clearwater, 1984)。

⑥ Charles Fritz and Eli Marks, "The NORC Studies of Human Behavior in Disaste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0, no. 3 (1954): 26—41. Charles Mack,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1941—1960 and Supplement 1961—1971* (Chicago: NORC, 1961 and 1972, respectively); Paul Sheatsley, "NORC; The First Forty Years"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987); *NORC Report 1985—1986*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987)。

⑦ Charles Cannell and Robert Kahn, "Some Factors i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8034*, January 1984。

ies)^①,以及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s Russian Research Center)^②等机构的历史研究也在进行中。社会科学研究所(BSSR)是大众传播学和心理战在50年代重要的研究中心,该局档案如今藏于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专藏文库及美利坚大学内。并没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史文献,但档案员为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有声文件制作了详细的索引,这些索引有助于重现研究所的许多历史活动。^③

有关心理战项目运作机构的史料比较难找,因此大部分传播研究学者对这一领域比较陌生。上文所述“心理战”章节的一手资料对于这点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自由欧洲电台^④的两份史料,以及近期关于美国陆军特种部队^⑤的一些研究。

前苏联与欧洲的心理战项目

本文着重探讨了美国在心理战方面的经验,而未全面提及美国的对

① 参见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Description* (Cambridge: MIT, July 1955)。另见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Plan of Re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Report,” *World Politics* 6, no. 3 (April 1954): 358—77。

② Biddle, “Handling the Soviet Threat”; Charles O’Connell,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ce: Soviet Studies at Harvard,”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90; Harvard University,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The Harvard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Survey of Research Objectives* (Cambridge, MA: Russian Research Project, 1951);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Five Year Report and Current Projects and Ten Year Report and Current Projects 1948—1958* (Cambridge, MA: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1953 and 1958, respectively)。

③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Libraries, Historical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epartment, *Guide to the Archives of the Bureau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n. d. [1987?])。

④ Mikelson, *America's Other Voice*; Holt, *Radio Free Europe*。

⑤ Paddock, U. S. Army Special Warfare, 这份材料或许最好地复原了有关美国心理战、特殊战、隐蔽战发展的历史。另见 Aaron Bank, *From OSS to Green Berets: The Birth of the Special Forces*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1986); Charles Simpson, *Inside the Green Berets: The First Thirty Years*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1983)。还有一份很好的包含大量史料的近期文献: Michael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New York: Pantheon, 1992)。相关材料还可参见 Edward Herman and Gerry O’Sullivan, *The “Terrorism” Industry: The Experts and Institutions that Shape Our View of Terror* (New York: Pantheon, 1989)。

手或是盟国的相关经验。不过，一些比较数据较有价值，能为美国所做的工作提供社会背景。

尽管有前苏东集团变节者的相关证言，^①甚至有传言称苏联的档案将在十年以后公诸于世，^②但本文并没有苏联及其盟国的心理战策略发展历程的内部文件。不过，我们也从西方专家手中得到了前苏联在心理战领域的部分二手文献。^③大部分文献反映了对待冷战的一种“正统”观念，同时还担忧前苏联的政治宣传是否对宣传对象有效。^④

美国在欧洲的盟国的心理战活动，相关原始文件不太多，不过却有不少二手文献。^⑤这些资料多为描述性文件，理论性不强，不过从中可以得知，西欧各政府对政治宣传及心理战的观点的发展历程可能与美国差不多。^⑥

① “Testimony of Ladislav Bittman, former Deputy Chief of the Dis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zechoslovak Intelligence Service” 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oviet Covert Action and Propaganda,” both in Hous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th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Hearings: Soviet Covert Action, 96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GPO, 1980).

② 有关苏联档案使用权限的总结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pring 1992).

③ 选取的例子包括: Leites and Pool, “Respons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Lendvai, *Bureaucracy of Truth*; Roger Beaumont, “Soviet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Propaganda,” *Signal* 42, no. 3 (1987): 75—84.

④ Harold Lasswell, “The Strategy of Soviet Propaganda,” *Headline Series Pamphlet* 86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51); Brutus Coste, “Propaganda in Eastern Europe,” 14 (Winter 1950): 639—66; Evron Kirkpatrick, *Target—The World: Communist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1955* (New York: Macmillan, 1956); John C. Clews, *Communist Propaganda Techniques* (New York: Praeger, 1964); Lawrence Eagleburger, “Unacceptable Intervention: Soviet Active Measures,” *NATO Review* (April 1983).

⑤ Cyril Barclay, *The New Warfare* (London: Clowes, 1953); Peter Watson, *The War on the Mind: The Military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Penguin, 1980);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⑥ Michael McClintock, “Emulating the Europeans: American Counterinsurgency and Unconventional Warfare” (unpublished paper, written in May 1990, in author’s possession); Jacques Ellul, *Propaganda* (New York: Knopf, 1971); Bennett Clark, “The BBC’s Extern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35 (April 1959): 170—80; Carey McWilliams, “Knights in Shining Buicks,” *Nation* 172 (January 6, 1951).